中外巨人传

孙思邈





张雅晶 著

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是著名的医师与道士。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 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允。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孙思邈出生于541年的话，此时的他应该已经80多岁高龄了。据推算应该是生于570年左右，死于740年左右。

辽海出版社



定价:31.00元

中外巨人传

孙 思 邈

张雅晶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思邈 / 张雅晶 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12
（中外巨人传）
ISBN 978-7-5451-1168-2

Ⅰ．①孙…　Ⅱ．①张…　Ⅲ．①孙思邈（581～682）—传记
Ⅳ．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4143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　季
装帧设计：马寄萍

出 版 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 刷 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 行 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印　　张：15.75
字　　数：172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1.00 元



前 言

孙思邈是中国唐代名医，为中国医学和药物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宋·林亿称：“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在中国中医界，孙思邈可谓是罕见的传奇式人物。他具有“三省四箴的高尚品德，白云苍狗的鄙视荣华，乐天知命的安于贫贱，鸥闲鹤静的善于养生，五车三箧的博学多能，横锦散珠的写作能力，换心移树的医学水平，折短剖圆的数术天才，妙理玄机的卜易绝技。加上天悟神聪的禀质独厚，难老长生的期颐高寿”。“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一生三拒入仕：拒绝隋文帝杨坚在登极前“征为国子博士”；拒绝唐太宗“召诣京师”授以爵位；拒绝唐高宗召见授予“谏议大夫”。他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他以奇特神异、名医名儒、似僧似道的姿态而驰名中外。

孙思邈精通诸子百家，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勤求古训，又不泥古；兼容并蓄，以法类证。他竭毕生之精力，撰著《千金方》（《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承唐前《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甲乙经》、《肘后方》、《本草药对》、



《小品》、《诸病源候论》等诸家之学说，参同代名医甄权、甄立言兄弟，谢季卿、孟诜等之著述；在对唐前医药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整理基础上，博采众方，又吸收西域医学和民间验方，传承和发展了中医药学，为中国医药事业作出了承上启下的巨大贡献。

孙思邈是中国医学史上，首开系统地论述道德观和医学伦理思想之医家，他提倡“大医精诚”，“他的医德学说为中国后世医生的奉行准则，可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相媲美”。他被推崇为一代医德宗师，他的医德思想在医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的《千金方》是孙思邈医药学术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千金要方》中包含了内外科、妇儿科、五官科、皮肤科、急救、食疗、养生、气功、按摩等丰富的医学内容，涉及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千金翼方》，是孙思邈晚年对《千金方》的补充之作，其内容与现代医学中的药物学、传染病学、食疗养生学、老年医学等诸多领域相关，这充分反映出孙思邈丰富的医疗经验和深邃的医学哲学思想。

孙思邈的《千金方》，不仅对中国医药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特别是对日本医学也颇有影响，日本曾以此作为彼邦学习汉医的课本。同时《千金方》对丹波康濑撰写《医心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医学家多纪元坚等说：“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孙思邈《千金方》者焉。”



孙思邈这位古代医药科学家，自唐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民众的爱戴，并尊奉他为“药王”。历代文人墨客用以诗文歌颂赞美，帝王官宦也都代有封谥。孙思邈生前活动的地方，仍留有皇帝的褒崇和封赐，以及文人学士、社会贤达歌颂其医德医术的各类纪念石碑。其为医家立碑祭祀的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是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可见，世人对这位“名魁大医，百代之师”的虔诚崇敬。孙思邈“医济当时，方传万世”!

◉目　录◉

001 前　言

001 一、孙思邈生卒墓地考

001 1．生于何年史载纷纭

004 2．生于隋·开皇元年之说

008 3．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

018 4．卒于唐·永淳元年

018 5．墓葬何处史书无记

021 二、孙思邈所处的时代

021 1．社会和思想背景

022 2．隋唐朝廷重医学

024 3．前人医药学遗产



026 4．中外医药学交流

034 三、孙思邈的生平事迹
035 1．立志问医行济于民
038 2．结交医药家和文人
042 3．颇得帝王臣将赏识
044 4．撰写巨著两《千金》

046 四、千古流传的《千金方》
046 1．《千金方》的主要内容
049 2．《千金方》版本和流传
053 3．两序文采鸿儒气势
056 4．据典渊博史家风范

062 五、对前代医家的继承发展
062 1．渊源仲景医德思想
063 2．继承扁鹊学派思想
064 3．汇集经方学派大成
065 4．发展仲景学之贡献
066 5．编纂两书的《伤寒》



072 6．研究方法唐后典范

075 六、儒家《周易》的影响和运用

076 1．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

078 2．渊源《周易》的思想

082 七、印度佛教和医学的接受

084 1．佛教对孙思邈的影响

085 2．与道宣“林下之交”

087 3．《千金方》中的佛学思想

091 4．对印度医药学的吸收

096 八、中国道教及医术的吸收

098 1．道教对孙思邈的影响

103 2．“医道同源”的体现

105 3．《千金方》中的道教思想

110 4．对道教各派之吸收

118 九、对后世各派学说的影响

118 1．河间学派的药方



119 2．易水学派脏腑说

120 3．丹溪学派养精气

121 4．伤寒学派之中坚

122 十、《千金方》与日本医药学

122 1．鉴真携书东渡之说

123 2．对汉方学和习俗影响

125 3．日本医书所引《千金方》

126 4．日本研究人员和机构

127 5．现藏版本和日本翻刻本

134 十一、医学贡献和医文献史地位

134 1. 医德——伦理学的贡献

138 2. 医药科学的贡献

143 3. 医文献中崇高地位

145 十二、中外历代评价和海外影响

145 1. 中国历代医家之论

156 2. 日本书序跋之推崇

159 3. 生前逝后身份之说



164 4. 海内外之影响

167 十三、孙思邈手迹诗文和炼丹四言诗
168 1．《淳熙秘阁续帖》中手迹
169 2．《全唐诗》中炼丹四言诗
170 3．耀县故里孙家塬碑刻
172 4．药王山隐地南庵北洞碑刻
190 5．山西稷山蔡村药方碑记
190 6．河南茱萸峰石像记碑
191 7．历代诗词颂扬碑刻

195 十四、孙思邈研究机构和成果
195 1. 国内外研究机构
196 2. 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200 十五、孙思邈后人与医学
201 1. 孙用和编撰传家秘方
202 2. 孙奇、孙兆校正医书

207 附录



207 附 1 《备急千金要方·序》全文

208 附 2 《千金翼方·序》全文

210 附 3 《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全文

一、孙思邈生卒墓地考

1．生于何年史载纷纭

关于孙思邈的生卒年时间，各种史料所载说法不同，纷繁杂陈、相互矛盾、疑点重重。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前后混乱大有破绽；医学文献又出错误引导；清两碑所刻内容紊乱；稗官小说和文学札记多有故弄玄虚，等等。自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考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对孙思邈生卒的质疑后，就引起了医学界和史学界研究考证。两百余年间，学者各据史料，或依同样史料，各说各话，观点相异，医史界至今观点相异，有各种考辨。“尽管现在似乎以隋·开皇元年（581）诞生，享年 101 岁作为‘定论’，但内中破绽，还是俯拾即是，仍无真正的定论。”①

除 581 年为其生年外，还有从史载、碑铭、推算、考证出来的诸多说法。如据《旧唐书》，约为梁·天监十年（511）；据黄竹斋《医仙妙应孙真人传》，约为梁·天监十四年（515）；《四部总

① 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1–2 页。



录医药编》转载清·刘毓松的《通义堂文集·千金方考》，约为梁·天监十七八年（518—519）；据《大唐新语》推算，为梁·大同三年（537）；据《旧唐书》，为梁·大同七年（541）即西魏大统七年[①]；据“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约为周宣帝时（578—579）；据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约为560年以前；据《旧唐书》，约为隋·仁寿元年（601）等等说法，真可谓是见仁见智。

各种考辨中，以隋·开皇元年（581）和梁·大同七年（541）为两大主流之说。笔者非医史专业研究人员，谨从历史出发，在查阅大量资料后，认为梁大同七年（541）之说，似乎更接近事实。

考证孙思邈生年者，历来多以旧新两《唐书》中的孙思邈传为依据，从正统的史料出发，对两《唐书》本传史料的矛盾失误之处，则以各种推测以圆其说。学者主要依据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关于孙思邈的记载而展开研究，记载如下：

1. “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②]

2. “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

3. “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曾为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

4. “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

---

①当时中原有三国并立，即：梁·大同七年时，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二年和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后为北周）。孙思邈出生在西魏境内、书史习惯以陈为正统。

②西魏大将军独孤信“美容仪，善骑射”，年轻时有美称“独孤郎”，曾任大都督、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等职，在关中等地活动了许多年。孙思邈因聪颖过人，在乡里颇有影响，独孤信将军借机会见孙思邈。通过问答，独孤信见其见解独特，才思敏捷，敢于批评朝政，深为其天资和才华而感慨，赞叹道：“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

有道者诚可尊矣，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固辞不受。”

5. “初，魏徵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6.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

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孙思邈传》，几乎从《旧唐书》搬抄而来，有些小变动，主要是在某些时间概念上模糊其义。如针对上列第四条，《新唐书》谓：“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

学者借助的另一重要文献，即初唐四杰之首的卢照邻，在《病梨树赋序》中所言：“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矣。”（卢照邻此时说的癸酉岁是673年。该文在《旧唐书》中被采用，改“九十二”为“九十三”，《新唐书》不载）

从上列史料可得知：独孤信赞孙思邈为“圣童”，最晚在557年，孙思邈应为十四五岁为宜，那么“永淳元年（682）卒”，孙思邈应是141岁。但是，曾于长安对孙思邈执礼甚恭的卢照邻说得明白，673年，孙思邈自己说是92岁（后被改为93岁），那么，到682年去世，孙思邈应是102岁。对此，隋·开皇元年（581）和梁·大同七年（541）两大主流之说，各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现摘各家观点之要如下：

2. 生于隋·开皇元年之说

持隋·开皇元年（581）之说的学者认为，孙思邈生于隋文帝代周建隋的开皇元年。享年102岁。那么，就要否定独孤信见孙思邈、孙思邈周时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其为国子博士诸事，因为那时候孙思邈还没出世。

首先提出疑义的是距今已两百多年、于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翰林。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唐书·隐逸传》称其少时，周洛州刺史独孤信称为圣童；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征，不起。则思邈生于周朝；入隋已长；然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癸酉岁生，今年九十二"，则孙思邈生于隋朝。照邻乃思邈之弟子，记其师言，必不妄。惟以《隋书》考之，开皇纪号凡二十年，止于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寿，与史殊不相符。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为开皇二年壬寅，实非辛酉，干支亦不相应。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盖照邻集传写伪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史又称思邈卒于永淳元年，年百余岁，自是年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亦相合，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

"……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近代古文献学家余嘉锡（1883—1955）力挺此说。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考《周书》及《北史》独孤信本传，惟云'大统三年起为大都督……不云为洛州总管。是两唐书纪事已不免有误'。则其谓思邈及见独孤信，及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者，恐皆不足信也。提要驳之是矣。"四库馆臣认为孙思邈出生于开皇辛丑，

有力证据就是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序》，那年孙思邈93岁。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照邻集，传写讹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余嘉锡也说："……然考《旧唐书》方伎传孙思邈本传、《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孙思邈'条，并载《病梨树赋序》，皆作'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四亦同。然则'九十三'本不误，但误以辛丑为辛酉耳。既三书同作辛酉，当是照邻记忆偶疏，未必由于传写讹异也。"

当代，持隋·开皇元年之说的学者，仍以《病梨树赋序》为据。他们认为，在众多史料中，记写的年代离所记写的人和事的年代越近，越可靠，传主的自述或朋友的记述又比其他人所记述的可靠。卢照邻是文人，初唐四杰之首，与孙思邈是忘年交，对孙思邈"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又曾与孙思邈同住过一段时间，他的《病梨树赋序》正写于此期间，其"信史"的可采信程度远优于其他史料。

但是，《病梨树赋序》关于孙思邈年龄的文字也是有矛盾的："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首先有个小错误，把九十三作了九十二。这个小错误好像易于纠正，《旧唐书》在录用此文时就改为九十三岁，以后的文献在征引时也都依九十三之说。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于，卢照邻作序记"癸酉岁（673）于长安见思邈"时孙思邈93岁，按照辛酉（601）推算，那孙思邈当时只有73岁；若按照辛丑（581）推算，就恰好是93岁。大致可以肯定：或是卢照邻记错了干支，或是他笔下误写或传抄者笔误将"辛丑"误写成"辛酉"，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四库馆臣能轻易就指责"盖照邻集，传写讹异，以辛丑为辛



西”，但七十三错成九十三就不容易了。何况辛酉本身就有错，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年，二十一年是辛酉之岁，但是年号已由开皇改为仁寿了。

当代，持隋·开皇元年之说的学者中，李经纬①最为代表。他和孙思邈是同乡，就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据他本人文章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华医学会转给他陕西耀县文教卫生局的一封信，为建孙思邈纪念馆之用，希望就孙思邈生卒年代问题提供意见。按此要求，李经纬作了一些考证，他的观点是孙思邈生于581年为最可靠。并撰文寄耀县供作参考，后又整理发表于《中医杂志》。李经纬是当代考据孙思邈生年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专家和学者之一，其影响之大，正如他文章所言：“1961年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史学会根据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的意见，举办孙思邈诞辰1380周年纪念。由我作了题为《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专题报告，并有部分有关文物展示。同年12月邮电部为纪念孙思邈1380周年诞辰，发行孙思邈像与医药邮票各一枚。”②还有，196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讲义》、197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1979年新版《辞海》及同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198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任应秋编著《中医各家学说》等，均持此说。

为了进一步求得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李经纬的学生胡乃长与他合作，再用史原学方法撰写了《孙思邈生年考辨》。该文首

①李经纬，陕西咸阳人，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

②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页。

先就做出了对两《唐书》孙思邈本传，材料不足尽信的详细考证。其次，认为考证孙思邈生年，将孙思邈自述作为依据更确切。特别对孙思邈生于541年之说和509年之说的依据进行了考辨并指出其不足，认为难以成立。然后，对生于581年之说，引孙思邈自述为论据，并从《千金方》中找到大量旁证以充实该说之可靠性。

文章中也说明是对一般常见的资料做了较详细的勘校审核工作，希望和医界史界同道一起，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讨论，对孙思邈生年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现在所有的辞书、教材、医史等都是采用隋·开皇元年之说，但仍不能让人信服。1960年12月7日，北京市中医学会、医史学会举办"纪念孙思邈诞生1380年系统报告会"中使用了"诞生"一词，同时，会上提出"不涉及于孙思邈生卒岁月的争论"[①]。这说明主办方对581年之说也没有足以让人认同的考据和信心，才不得以给大会"注射预防针"。胡昭衡认为，会上肯定有人对"诞生"年代持反对意见。解放后，各种纪念孙思邈的活动，皆用"纪念孙思邈逝世××××周年"的提法，唯有这次是使用"诞生"而弃用"逝世"。孙思邈辞世年，是被历代学术界所公认，而出生年却史辨两百年，至今学术界没有达到共识。"纪念孙思邈诞生1380年系统报告会"使用的"诞生"，仅从学术考证而论，似乎就不够严谨。舍"逝世"取"诞生"又"不涉及于孙思邈生卒岁月的争论"，其必要性和意义都不大。

而对孙思邈生年的研究考证中，生于梁·大同七年（541），享

---

①胡昭衡："纪念孙思邈、开拓新局面"，《中华医史杂志》第13卷，1983年第1期。

年141岁之说，也被很多学者认同和坚持。

3．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

持生于梁·大同七年（541）之说的学者首先认为，史书中诸如见独孤信、避周世乱、辞杨氏官等关于孙思邈生平事迹的记载，皆字迹昭昭，不能以“误审矣”轻轻地就给否了。独孤信“大统三年（537）起为大都督，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即为“洛州总管”之本。独孤信卒于557年，见孙思邈最晚也应在当年，既然赞孙“圣童”，孙的年龄应以十四五岁为宜。周宣帝（578）时避世乱隐居太白山、杨坚辅政时（580）征之为国子博士，孙思邈的年龄为三四十岁，这很顺情合理。

同样，《病梨树赋序》也是主张“享年141岁”的学者们一个重要文献依据。那么，怎么解释孙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这段话呢？

学者认为，“辛酉”并非是“辛丑”之误，因为并不存在“开皇辛酉”，而隐士、方士又好打隐语，这是以隐士自居的孙思邈对卢照邻打的隐语，整整隐瞒了一个甲子，孙思邈实际是“开皇辛酉”的上一个“辛酉”，即541年（时为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出生的。在卢照邻作序记“癸酉岁（673）于长安见思邈”那年，孙思邈不是93岁，而是132岁。虽然卢照邻记述了孙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这段话，但是，连卢照邻自己都不相信（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然则思邈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所以“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矣”。卢照邻当时不相信孙思

邈只有九十二岁，于是去乡里调查，被调查的人都说孙思邈是数百岁（可作百数岁解）的人，他讲起周、齐等前朝旧事，就如眼见的一样。卢照邻于是感叹，一个一百多岁的人仍然耳聪目明，神采奕奕，真可谓是古之聪明博达不死的人。关于孙思邈对卢照邻打隐语瞒年龄之说，早在二百多年前，我国乾嘉时期著名考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在《十七史商榷》中就已指出："思邈盖不欲以长生不死惊骇世人，故自隐其年，而诡云开皇辛酉岁生。故云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也。非自相矛盾也。"

这样，梁·大同七年之说在解释其他相关史料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起来，而不像102岁说那样勉为其难。比如唐·贞观元年(627)："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矣，羡门、广成岂虚言哉!'"按141岁说，贞观元年时孙思邈86岁，太宗召见他，惊叹其容色显得年轻，并尊为"有道者"，并说上古的长寿仙人羡门子、广成子可不是虚传等话，就顺情合理了。否则，按102岁说，太宗召孙思邈诣京师时，孙思邈才46岁，年纪本来就不大，怎会"嗟其容色甚少"呢？以唐太宗之尊贵和雄才大略，赞一个46岁的人为"有道者诚可尊矣"，与羡门子、广成子并提，解释起来，就觉得勉强了。

同样道理，"初，魏徵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魏徵等一班人，个个是饱学之士，又是唐初重臣，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本应胜任愉快，若非孙思邈是一个积古的老人，这班人完全用不着一遍一遍地去拜访孙思邈，听他"口以传授"，讲谈齐梁诸朝旧事。



持梁·大同七年之说的干祖望[①]、马伯英、方春阳和曹永斌等[②]，大致归纳为：孙思邈出生于541年（西魏·文帝大统七年）；14岁（西魏·恭帝二年，555）见到独孤信；37岁时（北周·宣政元年，579）隐居太白山；39岁时（北周·大象二年，580）征之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86岁时（唐·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召谒京师，嗟其容色甚少；120岁时（唐·显庆四年，659）唐高宗拜谏议大夫不受；133岁（唐·咸亨四年，673）从幸九成宫，卢照邻住其宅作《病梨树赋序》；134岁（唐·上元元年，674）辞疾请归；142岁（唐·永淳元年，682）辞世。年龄事迹与史料记载一一吻合，矛盾释然。142岁与141岁相差一岁，无非虚岁与实龄之别。

当代，持梁·大同七年之说的学者中，干祖望最为代表。他在所撰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孙思邈评传》中，对隋·开皇元年之说的不足和梁·大同七年之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转引干祖望的考证观点，如下：

皇元年诞生者，最大的破绽是"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和"独孤信见而叹曰"三大事的年代，都在孙思邈出生之前，又作何解释。这一点张路玉[③]在《千金方衍义》中提出过"如果生于隋，周宣帝时便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

①干祖望，（1929—），男，上海金山人（1987年《中医年鉴》作松江），为中医耳鼻喉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厦门国际培训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兼任中华全国中医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中医耳鼻喉科学会及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学名誉主任等职。

②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伯英："孙思邈生年及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4期；方春阳：《浙江中医杂志》2002年9月，第369页。

③张路玉，（1617—1698），名璐，号顽石老人，清·吴江人。著有《千金方衍义》30卷。

那”。孙思邈亲笔写的“治蚊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其人病发似癫痫，面色青黄。……”（《千金要方·肝脏·坚症积聚》）假定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孙思邈此时仅五岁，怎能临床治病？这样天大的漏洞，即使用再多的细纱细丝去织补，也无济于事。

干祖望对诞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史据旁证，作了一番客观的分析：

考隋文帝杨坚出生于梁·大同七年（541）六月癸丑夜间，恰为辛酉，与《旧唐书》引证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的“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完全符合。陈·永定元年（557年）之前，为孙思邈十五六岁，正是这个时期。此时也正值独孤信位极人间、权倾朝野的黄金时代。以一个大人物而遇到聪明的孩子，当然脱口而出地“叹曰，此圣童也”。时间如果提早些，则孙思邈仅仅为黄发垂髫，天资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如果退后一些，则独孤信也逝去。值得特别注意，独孤信又谓“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一语。考自《老子·四十一》①的“大方无偶，大器晚成”，《吕氏春秋·乐成》②也有“大智不形，大器晚成”的记载，直到三百年后的王充《论衡·状留》还在说“大器晚成，宝货难售也”。古人文章有一个惯例，对某人说的每一句预言，都要在以后配上后果来证实其灵验。《旧唐书》此言，也正是为孙思邈 86 岁奉诏入京、百岁以后写成两部《千金方》的鸿运与才能脱颖而出作的伏笔。

---

①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战国时期，苦县万乡曲仁里人。所著之书也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上下两篇，为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②《吕氏春秋》，又称《吕览》，26 卷，战国时吕不韦使门客各著所闻，集论而成。



《新唐书》载："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考隋文帝辅政，是指杨坚仕于北周位至相国，袭封隋国公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废静帝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581）的前一年。此时孙思邈在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出仕的适当年龄。"不拜"，是描写孙思邈的傲慢骨气，不屑为官。《旧唐书》写作"称疾不起"的"起"乃"赴"字之讹。当时孙思邈正隐居太白山，即陕西省终南山，为秦岭主峰，故称"不赴"。此时年未四十，无法言老，所以只能称疾。"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也和"但为其器大而难为用也"一 样，是为五十年之后孙思邈86岁时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入京作伏笔。

《旧唐书》："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新唐书》："及长，居太白山。"其实，当时有陈、北周、北齐三国并存，而且书史习惯应以陈为正统，为何独言周宣帝？因为孙思邈为北周子民，属北周人，家乡在华原，隐居之处在太白山，都在北周京畿长安附近，所以，唯有北周对孙思邈有直接的影响。考周宣帝宇文赟在位仅半年，恰为孙思邈三十七八岁。在此前后数年中，周家王朝社会不安，战争不断。如其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根本不可能遇到。

根据思邈自称93岁那年与卢照邻会晤于鄱阳公主废宅的癸酉之岁，似乎铁笔铸案无疑了。但是，如其生于隋·开皇元年的话，那么93岁与卢照邻会晤，当在贞观七年（633），但岁次不是癸酉而是癸巳。既然可以怀疑《旧唐书》的辛酉为辛丑之误，那么更有理由来认为癸酉为癸巳之误。而且这两个"误"，是无法避免去



其中之一的，如其是“辛酉为辛丑”之误，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无法吻合。只有“癸酉为癸巳之误”，才能完全符合。

但又有问题，这位“约”生于635年的卢照邻，尚未出世，作何讲?

其实卢氏的生卒时日，至今还没有考证出来，635年出生难以可靠。考卢照邻和王勃（648—675）、杨炯（650—?）、骆宾王（640—?）初唐四杰生年，有人认为贞观七年（633）王、杨、骆三人都没有出生，卢氏当然也未必入世。其实，这个简单的想法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汉末竹林七贤年龄相距近30岁，明代吴门四家也距40余年。所以，卢照邻出生日，可上移 30年。如此，则在鄱阳公主废宅晤孙思邈时，为年30多岁。与三杰年龄相差最大的杨炯也仅45岁。

对于孙思邈寓鄱阳公主生前官邸，是在上元元年（674）特赐，可是，早在40年前，就在此会晤卢照邻之事，干祖望的解释是：“赐”与“住”根本是两回事，《旧唐书》不云乎“有孙思邈处士居之”。“居之”是寄寓，所以，孙思邈早就居住在此，上元元年，疾辞请归之际，唐高宗李治才明确地追赐于他。

干祖望还以孙思邈在76岁之前，处在隋王朝时代进行论证，他隐居修道、炼丹、读书、行医、著书，其中，包括疏注《老子》、《庄子》①在内的许多道家著作，都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77岁之后步入唐朝，从此，即活跃于临床医务。《千金要方》中注明日期的医事活动，都在武德、贞观时代，只有一例为“开皇

---

①庄子，即庄周，战国蒙人，曾为漆园吏。其所著之书也称《庄子》，唐代天宝元年，诏号其书为《南华真经》，凡33篇，与《道德经》同列为道家经典。

六年”（见《千金要方·肝脏·坚疮积聚》）在隋朝为铁证，论证是梁·大同七年诞生而非隋·开皇元年。

《旧唐书》：“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考太宗即位于贞观元年（627），当时孙思邈为86岁，如诞生于隋·开皇元年，则仅四十六岁，理应“容色甚少”而何“嗟”之有。《新唐书》：“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当时为46岁的话，则怎能说“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只有86岁的老者，才是应该耳不听聪而目不视瞭。

《旧唐书》：“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新唐书》：“魏徵等修齐、梁、陈、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考魏徵修的是《隋书》，并非南北朝的五家史。参与共事撰写者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考贞观三年（629）魏徵等奉诏修史，于当年开馆动笔，历八年而成书，至贞观十年完稿杀青。所以“屡访之”、“屡咨所遗”，当在贞观三年到八年间（629—634）的事。如以贞观十年（636）而论，孙思邈当年95岁，魏徵56岁、颜师古55岁、孔颖达62岁、许敬宗44岁。这般年龄的高水平写作班子，对前朝的遗闻佚事而“屡访”、“屡咨”一位95岁老人，合情合理。如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此时孙思邈年龄比许敬宗大11岁，与颜师古同龄，比魏徵反而小1岁，比孔颖达小7岁。如咨询医学专业尚有可能，而这一批高水平的文史专业者，向年龄小的医家咨询文史，似乎可信度不高。

《千金要方》于永徽三年（652）脱稿完成，孙思邈很少谈到《伤寒杂病论》，即使引用几处“张仲景曰”，也不为仲景精神。第九卷、第十两卷《伤寒论》（上、下）里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



要方不传”十一个无实质性的字（见《千金要方·伤寒上·发汗吐下后》）。有人提出两篇“伤寒”中不是有桂枝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等方吗？其实，这许多方剂并非张仲景亲定，而是当时或以前临床上使用的常用处方。故李梃[①]在《医学入门》中直言“孙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脉经一卷，独于伤寒不及”。为什么？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取孔穴法》篇中，引李袭兴转述甄权[②]论医“甄权曰，‘非有圣智，孰能辨之者乎’”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孙思邈谓“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推研孔穴，所疑更多矣”。即孙思邈研究仲景学说，是在100岁以后才开始的。在写成《千金要方》后的110岁之后。如生于隋·开皇元年，则此时不过71岁，怎能自称“今年过百岁”？退一步讲，生于开皇元年，则到永淳元年（682年）恰巧也是“今年过百岁”，但他101岁即羽化，如何有时间来研究经文？如何有时间来撰写研究经文之后的《千金翼方》？《避暑录话》说得很清楚，谓：“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因此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旧唐书》：“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郑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考开皇中无辛酉，惟在它之前的梁·大同七年（541）和在它之后一年的仁寿元年

---

①李梃，明·江右南丰人，字文清，号健斋，因病而致力于医。撰有《医学入门》，9卷。体裁仿刘纯的《医经小学》，以韵语写成，加以注解，成书于1575年。

②甄权，（约540—643），唐代大名医，许州扶沟人。与弟甄立言，齐名于世。



(601)。所以孙思邈应生于梁·大同七年。

在梁·大同七年时，中原、西魏、东魏三国并存，孙思邈出生之处为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后为北周）。在卢照邻面前，很可能孙思邈是说“文帝辛酉”，而纪史执笔者把西魏的文帝误为隋杨坚的文帝，所以未写“大统辛酉”而写“开皇辛酉”。那么，当时三国并立，孙思邈为什么不言梁武帝或东魏孝静帝而独独言西魏文帝？理由也很简单，梁建都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东郊、江宁县西部）、东魏建都于邺（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西魏建都于长安，所以孙思邈故乡属于西魏，系西魏子民。而且长安与华原近在咫尺，孙思邈心中当然只有西魏，也应该是西魏。孙思邈既然诞生于西魏大统辛酉，则 92 岁的那年适在唐·贞观七年(633)。孙思邈之所谓“九十三”者，古人习惯上取用虚龄计算的剪刀差。至于该年岁次应为“癸巳”而《旧唐书》书“癸酉”者，当然为“癸巳”之误。总之，孙思邈诞生，以梁·大同七年，即西魏大统七年（541）最为合情入理，所以享年为 141 岁（虚龄 142 岁）。

对于有学者（如李经纬）认为，隋唐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在二三十岁的问题，干祖望列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汉书·甘始东郭延年传》、《后汉书·冷寿光传》、《后汉书·郡国志·注》、《魏书·明帝纪·注》、《辽史·圣宗本纪》，以及正史之外的《论衡》、《偃曝谈余》[1]、《洞微志》[2]中，超百岁老人的实证。另外，从《千金要方》中，也找出两位百岁以上老人的例子：其一，

①明·陈继儒：《偃曝谈余》12 卷。
②明·钱希白：《洞微志》6 卷。



“魏武与皇甫隆令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其二，“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壮”（《千金要方·养性·养性序》）。干祖望还提出了“有趣而无人注意的旁证”，即凡人言语写作，往往在无意中把自己的内心毫无遮盖地反映出来。那么，《千金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中的“恣一时之浮意，为百年之瘤疾”，以一般而论，寿都不及百年，哪有病缠百年之理；又“神鞠丸，主明目，百岁可读注书方”，一般常人早就一如韩文正公的“年未四十，而视茫茫”了。从以上两个“百年”、“百岁”来体会，作者定已是百岁以上的人。况且孙思邈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懂得修道养生之人，享年 141 岁，事在情理之中，无足奇怪。

综上所述，二百多年来，孙思邈生于何年史载纷纭，后辈学人也莫衷一是，各有破绽。笔者不想也无能力去探究考证孙思邈生年这个千古之谜。然而，这部《孙思邈传》后的年谱不能缺少，年谱开篇诞生年又无法回避。因而，只好选择一个考证比较充分，本人认为更合理的西魏·大统七年（541）之说，即梁·大同七年，来定本书的框架。这一点，和干祖望先生当年的心境相同。欲说还休，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①]中，为考证者铺垫了一个很好的台阶“思邈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后人亦惟付之存疑，无庸考辨矣”。

---

①《四库提要辨证》，24 卷，为近人余嘉锡（1883—1955）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语文研究所专门委员等。



4．卒于唐永淳元年

相对生年众说纷纭而言，卒年比较简单。其一，《旧唐书》载孙思邈“永淳元年（682）卒”之说；其二，明·熊宗立《名医类证医书大全》[①]和明·陈嘉谟《本草蒙筌》[②]均记载“药上真人孙思邈，永徽三年（652）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俨其衣冠，端坐而化”之说；其三，“永淳二年”（683）之说，但那年改元为“弘道”，正史并无永淳二年；其四，元·张天雨辑《玄品录·道品》“永淳九年卒”之说，因“永淳”仅有一年，历史上并无九年，很可能是“九”为“元”字之误。

四种说法中，第一种“永淳元年（682）卒”，被史学家、医药学家及有关研究者所认同，学术界没有异议。然而，墓葬何处又给后人留下疑团。

5．墓葬何处史书无记

孙思邈墓葬何处？《旧唐书》和《新唐书》皆无交代。现今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河南济源县说。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孙真人坟在河南济源县。”另外，清·乾隆《怀庆府志》记载：“孙真人洞，在太行山中，相传孙思邈尝居洞中，有五色石丸，人取服

①明·熊宗立：《名医类证医书大全》24卷，1565年成书。
②明·陈嘉谟：《本草蒙筌》12卷，1565年成书。



之。”可见，孙思邈生前在河南茱萸峰石洞，炼丹施医。洞内有金·泰和七年（1207）塑的孙真人石像等。还有，《中华医史杂志》1991年第2期还曾刊有该墓考察记，提示孙真人墓在济源王屋山。

其二，陕西耀县孙家塬说。孙塬村尚存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孙塬合社弟子所立之石碑一通，镌有“敕封妙应真人圣神之先茔碑”大字，碑文中记载故茔“占地十七亩五分六厘”。李经纬实地调研考察，孙家塬原有墓冢两座，孙思邈父母之墓和孙思邈之墓。墓前石碑、石几俱全，“文革”被毁，1992年恢复整修原有冢丘，建有孙思邈陵园。

介于史籍失载，李经纬以《千金翼方·退居》中，孙思邈所期求的三个条件为依据，提出陕西耀县北五台山正合乎孙思邈的理想归隐处。因为这里符合“山林深远固是佳境”，“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活，泉水清美”和“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北五台山位于孙塬村与耀县城之间，背依将军、宝鉴、锦屏诸山，又有漆、沮二水映带，五峰有五台回绕，松柏常青，药草遍野，鸟语花香，洞壑风雅。南北朝始就有佛教、道教活动，确是背山临水，土地良活，人野相近，岗阜形胜之所在。又符合“所营退居，去家百里、五十里，但时知平安而已，应缘居所要，并令子弟支料顿送，勿令数数往来愦闹”的社会环境条件。隐居于此，距家百十里，既能和家人随时互知平安，子弟定时后勤供给没有困难，也可避免人多喧嚣的干扰。更符合退居处的地形向背、房屋设计建造精心便于养性的需要，有利于从事诊疗、研究、著述需要的工作环境条件。这里地形优越，特别是他设计的“缔创”蓝图，设有接

诊室、会客室、寝室、药房、药库及曝晾药物间、厨房、食物储藏室、家人弟子住处、安放药炉的炼丹室、念诵经文之室等，还开辟有荷塘及药圃。“缔创”蓝图风格高雅，布局合理、功能齐全，采光、御湿和防污染等达到卫生保健要求，也适合工作需要。“问我居止处，大宅总林村”（《要方养性》）。



二、孙思邈所处的时代

1．社会和思想背景

西魏时期，正值南北朝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之际。陕西长安始终处于战乱中心，这一时期长安和关中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隋唐两代奠定了基础。

孙思邈青壮年时期正值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重建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思想领域正处在儒、释、道三家并立而又相互渗透“三教归一”的状态。隋统一南北，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评论隋文帝时，肯定他：统一全国，采取多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得国安民息，社会繁荣，创定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隋炀帝创“进士科”，南北士人凭文才竞高低。唐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科举制度。唐代是我国继汉以后的一个伟大时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空前的进展。太宗、高宗统治了五十多年，从“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是唐代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唐代三百年的基础。唐太宗制订和贯彻“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使得国内民族关系增强。对外关系采取开放政策，以西北陆路与东南水道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路，与印

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阿拉伯、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来频繁，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隋唐统一中国后，思想意识还须大统一，儒、佛、道三者的理论，自南北朝以来逐渐交相渗透。隋·王通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释、道两教，共同维护封建统治”[①]。隋王朝没能完成“三教归一”的思想就灭亡了，但“三教归一”的思想对后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唐·柳宗元提出“三教调和论”，他认为儒、佛、道各家学说其目标相同，而根本上又都有可取，也都有缺点，主张“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衰，要之与孔子同道”[②]。唐王朝建立后，把“三教归一”视为国策，唐高祖下诏兴学，也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唐太宗继位尊孔丘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又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令人学习。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的依据[③]。孙思邈的思想融会道、儒、佛于一身，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思潮中孕育产生的。

2. 隋唐朝廷重医学

隋唐两代朝廷对医学发展十分重视，制定了促进医学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一，设置了太医署教授学生，开始医学分科，待

①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539 页。
②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联书店，1955 年第 414 页。
③陆肇基：“孙思邈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思想背景”，第 1012 页。

规定了考试登用医生的方法，太医署还设有行政官员，管理行政事务；其二，政府主持编修医书，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两书，二千六百卷。“隋大业中（605—617）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在大业六年（610）成书。该书“记载了1720个证候，归纳为67门。其中对于内科病记载特详，共39门，占本书的一大半，其余是五官科、外科，妇科和小儿科的病”。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策动主持撰写医学巨著，恐怕是事无先例。在《隋·经籍志》中记有翻译自印度的医书：药方八种、治鬼方二种、香方三种。[①]

唐代延续和发展了隋的医学政策和措施，唐代医药科学事业受到朝廷和皇帝的重视。唐高宗显庆年间，进一步调整施政政策，其中，包括着对文化卫生事业的重视,由政府机构组织力量，编撰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宗诏魏徵等修史，诏甄立言等校订《明堂经图》，也曾亲自到医学家甄权家中询问药性。[②]甄权撰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唐太宗、高宗还曾多次把孙思邈“召诣京师”[③]，设置专门管理医药的行政机构太医署，建立了医科学校，还设立了药园以及病房。医学分科精细和药物分类及制造技术等也都取得了卓越成果并达到了空前水平。

---

①李涛：“隋唐时代我国医学的成就”，《中国医史杂志》，1953年第1期；陆肇基：“孙思邈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思想背景”，第1010–1011页。

②后晋·刘□等：《旧唐书·甄权传》，中华书局排印版1975年，第5089页。

③后晋·刘□等：《旧唐书·孙思邈传》，中华书局排印版1975年，第5094页。

3. 前人医药学遗产

唐以前，各种医药学著作已出现，时为手抄，流传有限，保存更难。根据有案可稽者百余部：

秦汉之前有七部，分别是：《黄帝内经》、《黄帝素问》、《黄帝虾蟆经》、《万物》、《山海经》、《神农本草经》、《桐君药对》。

汉代有二十二部，分别是：张机《伤寒杂病论》、《脉经》、《疗妇人方》；稽康《养生篇》；蔡邕《本草》七卷；张道龄《辨灵药经》；吕博《玉匮针经》；公孙阳庆《黄帝扁鹊脉书》；淳于意《仑公决生死要诀》、《太仓公方》；史岑《说疾》；李八百《李八百方》；华陀《中藏经》、《青囊经》；郭玉《经文颂说》；葛元《葛氏杂方》；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脉经》、《导引图》；甘肃武威旱堆汉墓出土《汉代医简》。

魏代有五部，分别是：李修《诸药方》；吴普《吴普本草》；李当之《李当之本草》、崔氏《崔氏方》、王显《医方》。

晋代有十六部，分别是：范王《范东阳方》；殷浩《殷浩方书》；殷仲堪《殷荆要方》；阮侃《摄生论》；王叔和《论病》；《脉经》；葛洪《时后备急方》；《抱朴子养生论》；于法开《议论备予方》；佚名《救饥辟谷诸方》；皇甫谧《甲乙经》；番僧·佛陀耶舍《羌籍药方》；王珉《伤寒身验方》；孔汪《孔中郎杂药方》；陈延之《小品方》；阮炳《阮河南药方》。

南北朝有二十四部，分别是：李密《药录》；褚澄《褚氏遗书》、《杂病方》；周弘让《玉衡隐书》；徐叔响《四家体疗杂病本



草要钞》、《杂疗方》、《解寒食方》；徐嗣伯《药方》、《杂病论》；徐文伯《辨伤寒》、《疗妇人瘕》；徐之才《雷公药对》、《徐王八世传效验方》；羊欣《羊中散药方》；王星《王世荣单方》；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陶弘景《名医别录》、《补阙肘后百一方》；梁·简文帝《如意方》；姚僧坦《集验方》；龚宣庆《刘涓子的鬼遗方》；范晔《杂香膏方》；徐玉《小儿方》；姚法卫《集验方》。

隋代有十一种，分别是：杨玄《黄帝明堂经注》；刘祐《产乳志》；姚最《本草音义》；（孔志约《医籍考》，疑唐时成书）；全元起《注黄帝素问》；徐粜《要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佚名的有《四海类聚要方》、《四海类聚方》、《淮南王食经》、《玉房秘诀》。

唐初有十一部，分别是：甄权《明堂经图》；杨玄操《注黄帝八十一难经》；甄立言《本草音义》、《本草药性》、《古今录验方》；苏敬　李勣《新修本草》；李勣《脉经》；攘那拔陀罗同阇那那舍译《五明经》；崔知悌《纂要方》、《骨蒸病灸方》、《产图》。

除以上所列①，还有未知未列出者。对于这些前人丰富的医学文献遗产，孙思邈受益匪浅，对他的影响也不言可喻。

4．中外医药学交流

隋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是开放的时代，尤其是在两个“贞观之治”之际，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都得到极大发展，民族大融合和科学文化大交流已为当时的时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331-335 页。

代特征。以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为主要交通的陆上“丝绸之路”[①]和“海上丝绸之路”[②]，把中国同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及地区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的交流。

长安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使节、商贾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增多。英国李约瑟博士描述说：“在以迎外和仇外两种态度反复交替为特色的中国（欧洲如此）历史中，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印度支那的东京人相会……”[③]

经陆上“丝绸之路”，特别是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到中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西北丝绸之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相连。东汉后期航船使用风帆，古罗马帝国商人第一次乘船达广州，中国官商人也达罗马，船舶横贯亚、

---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②19世纪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③李成文主编：《中医发展史》，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非、欧三大洲，标志着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非常繁盛，隋统一后，加强对南海的经营，南海、交趾成为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和合浦成为重要对外港口。唐朝经济发达，政治理念开放兼容，外贸管理体系较完善，法令规则配套，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往、文化交流重要的便利通道。唐代医药交流比以往的朝代更加频繁，中医药学成就在海外影响增大。与此同时，他国的医学著作、药材和经验技术也传入中国。这些不仅丰富了中国医学内容，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

(1) 经“海上丝绸之路”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有东、南两条线路：东线可通往日本、朝鲜；南线可通往越南、东南亚各国、印度、波斯等。

中国医药学输出日本、朝鲜、越南，对这三个国家的医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遣隋、遣唐使节，留学人员以及后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将仲景伤寒学说传入。550 年，神代天皇即位之际，中国第一次把针灸传入日本。552 年，中国又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针经》一套。562 年，中国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他医药书籍 164 卷渡日，其子善那使主于孝德年代（645—654）又献方书 130 卷，药臼一等。607 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 卷以归；次年，日本又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经 15 年，于 623 年学成回国，直接带回隋唐医学和医药典籍如《诸病源候论》等。623 年，日本僧惠济、惠光来唐留学。655 年，惠日药师又作遣唐附使来中国学习医学。这些人的频繁活动，使



得唐代医学和医籍大量流传到日本。日本人对唐以前医家如葛洪、陶弘景等都深为了解和景仰。“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著作皆已传入，《诸病病源论》亦经采用”。这样一来，致使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唐医方取代了先前从朝鲜传入日本的韩医方，在日本形成了所谓的“汉方医学”①。

朝鲜，古称高丽、新罗。隋唐时期，中朝医药学交流更加频繁，高丽、新罗学生来中国留学，学习汉医之人渐多，使节互访也颇繁，中国医学借以传入朝鲜，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应用。“唐药”、“汉方药”在朝鲜医药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对朝鲜医药有着直接影响。同时，朝鲜医药传入中国，朝鲜药材如人参、牛黄、昆布、芝草、鱼牙油等也随之进入中国。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有关于高句丽、百济所产的人参、金屑、细辛、五味子、款冬花、茵茹、白附子、蜈蚣、昆布、银屑等药材的形状、药性和使用方法的详细记载。医药书中还记载有朝鲜输入的药物，如海松子、延胡索、海藻、腽肭脐、担罗、蓝茝等。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越南，古称交州、安南。中越医药交流在隋唐时期，虽远不如日本、朝鲜、印度之繁盛，但越医受中医的影响也很大。越南史书记载，早在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去越南治愈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他著有《公余集记》一书在越南流传，故崔伟成为中医传入越南的鼻祖。汉时越南接受中国文化，绝大部分也是中医药学。中国医学对越医影响颇大，以至于使越医学自此分化为越南派和中国派。隋唐名人到越南也将医学更多地传入越南。而

①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75-176页。



中国方面也接受来自越南的药物，草本学史籍中记有沉香、诃黎勒、苏方木、苏合香、白茅香、槆木等药。越南医药大多是通过贸易通商和互赠礼品传入中国的。今属越南的古林邑国，还曾多次遣使来中国。

隋唐时期，东南亚各古国如诃陵国、堕婆登国、狮子国等，也有同中国进行医药往来。

诃陵，即闹婆国，今印尼之爪哇；堕婆登国，地处诃陵西；昆仑，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656 年，“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唐使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等国，采求异药——木香、益智仁等。据唐人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槟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枋木、白檀香等。647 年，堕婆登国，“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等”。隋唐期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活动增多，其中，中国医生在那里行医者也有增多，他们对当地传播中医和推广应用，都作出了贡献。

印度，古代文献中有身毒、贤豆、天竺、摩伽佗、婆罗门等不同译名，唐代自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及《三藏圣教序》始译作印度。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佛门要学习和精通“五明”[①]，其中，三医方明，就是要求每位僧侣都要懂得和精明医学知识，所以，当时的印度医术就领先于全世界。

隋唐时期，中国大量吸收借鉴印度医药精华，丰富了中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中印两国佛教僧侣往返于长安与天竺间，大量印度医学理论书籍随着佛经书传入中国，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佛经

---

① “五明”：一声明、二工巧明、三医方明、四因明、五内明。



中，也包含许多医学内容。隋时，天竺三藏□那崛多译《不空绢咒经》，其中有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料制成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此外如唐天竺三藏宝思惟静译《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神咒经》等，也有医药内容。

这一时期，古印度吠陀医学理论，也被中国医学吸收或借鉴。印度医籍翻译后在中国流行。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录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干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干陀利治鬼方》四卷[①]。同时，不少中医药著作中，论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医学理论的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四大"学说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医家所运用。印度的名医龙树（或龙木）的眼科著作，对中医眼科影响较大。556年、605年，《五明论》和《龙树眼论》先后传入唐，618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印度医学大量传入中国，尤其是眼科。白居易诗句："案上漫铺龙树论，盆中虚贮决明丸"，描写出决明丸和《龙树论》的广泛传播。唐·王焘《外台秘要》中也引"天竺经论眼"，说明当时印度眼科是颇有影响。另外，在中国行医的印度医生，也以眼科医为最多，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诗"。除此以外，印度

①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方士”，在中国多为兼识医药者，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寐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古天竺医方、医法也有输入：摩揭陀服菖蒲方、西州续命汤、蛮夷酒、匈奴露宿酒等；此外，还有药物是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医药，对中国医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印医学交流中，玄奘法师和唐僧义净都有所贡献。645 年正月，玄奘法师由天竺学成回国，带回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经书 657 部。[①]647 年，又遣使至天竺，学取熬糖新制法。唐僧义净，671—695 年间，在印度习佛生活。他凭借自己的中医知识治愈己患，同时也向印度人介绍中国本草学、针灸学、脉学等内容丰富的中医药和医疗技术特点。

古代波斯，即今伊朗。波斯商人在唐经商十分活跃。波斯多次派遣唐使，携带之物多有药物也有香料、药物等。波斯商人传入的医方药方有悖散汤，此外，药物还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治痢药）、无石子、阿魏等。可见波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本草学内容。[②]

（2）经陆上“丝绸之路”交流

隋唐时期，“西北丝绸之路”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通过“西北丝绸之路”，阿拉伯帝国、阿富汗、尼泊尔、古罗马帝国等国可以到达中国。

阿拉伯帝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

①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第 187 页。
②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第 179 页。

国家，又称大食国、萨拉森帝国、伊斯兰教国家。穆罕默德语录《哈狄特》中："要寻求学问，即使它远在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大。大食国多次派遣隋唐使，携带之物多有药物。中国脉学、本草在隋唐传入阿拉伯，另外，还有炼丹术，炼丹术为大食后来的化学制药及实验方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医药交流中，中国也向阿拉伯国家输出药物，如肉桂、生姜、芦荟、樟脑等。另外，中国汉代的麻醉法也曾传入阿拉伯医学界，美国拉瓦尔（Lawall）在《药学四千年》（Four Thousand years of pharmacy）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人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

罽宾，今阿富汗东北、克什米尔一带；泥婆罗国，今尼泊尔。两国都地处丝绸之路中段，隋唐时期与中国贸易和医药往来颇多。文献记载两国都曾向中国派使节进贡药材。罽宾遣使"献褥特鼠、献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古罗马帝国（唐也称拂菻、拂临、即汉之大秦）含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地域跨亚欧两洲。《旧唐书》载，拂林国"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类似鸦片类的药物。据《新唐书》记载，拂林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这是穿颅术传入中国的记载。

此外，唐《新修本草》还记载从阿伽陀国（在古天竺东北，可能是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的引进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药。泥婆罗国"献波棱菜、浑提葱二药物"。

除上述与外国的交流外，还有国内各地的医药交流：641 年，李道忠送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弄赞，所赠医书由哈祥哈德娃和德田马郭吉两人译成藏文。643 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得到龙脑、沉

香、丁香、白豆蔻等药品。又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各地进贡的药物竟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如西州即今在吐鲁番东、凉州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夷州即今贵州省石阡县、黔州即今四川省彭水县等地区。①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337-338 页。

三、孙思邈的生平事迹

孙思邈，无字无号，生于541年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即梁·大同七年。当时中国并列着三个偏安的政权：梁，武帝萧衍，建都金陵，年号大同，当年为七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建都邺，年号兴和，当年为三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建都长安，大统七年。长安与华原近在咫尺，所以孙思邈属于西魏子民。为记载方便，书史习惯以梁纪年为正统。这就有了把生于西魏国的孙思邈，说是梁武帝大同七年的说法。

据刘文韬《耀县建置沿革考》：明朝嘉靖年间，乔世宁编纂《耀州志》记载，孙思邈出生地是离耀县城约15里的孙家塬村。耀县，秦时为内史地（即京都咸阳的直辖地），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建置，随朝代或辖属更替，先后曾七易其名。两汉曰役诩，魏晋置泥阳，隋唐称华原，则天帝时曾改名永安，唐哀帝时曾兼设耀州，五代时先为崇州，后复改耀州。宋初为感德军，后复为耀州，金仍华原，元为耀州，明、清复改为耀州，自民国二年（1913）改称耀县（即今陕西省耀县），沿用至今。孙思邈百年生涯中，经历了西魏、北周、隋文帝、炀帝、恭帝及唐高祖、太宗、高宗，两朝六帝的历史时期。上继魏晋南北朝之战乱分裂，



下接隋唐统一，享晚年于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先纷难而后承平，身经国家分裂、民族大融合、盛唐繁荣三个时期。

孙思邈卒于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享年141岁。《续仙传·隐化·孙思邈》曾记载："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严其衣冠，端然而坐。"临终嘱令薄葬，不要陪葬品，祭祀不要牲畜。据《旧唐书》记载，他死后"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这可能是他长期练气功并服用某些药物，使其机体代谢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所致。

1．立志问医行济于民

孙思邈幼年时体弱多病，"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医药费用几乎耗尽家产，但是他资质聪明，自幼好学。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七岁就学，诵千余言"。是说他七岁开始识字读书，儿童时代能诵千余言。十几岁时，"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十八岁开始习医，"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他幼年曾患寒疾，在亲身经历疾病的痛苦，感受社会疫病流行、缺医少药的苦难之后，他立志学医普救百姓。二十岁，崇尚老子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大有"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①] 的气概。故《旧唐书·孙思邈传》谓之："弱冠善谈庄老。"他那时开始研究道教。孙思邈自谓："青之岁，高尚兹典。"（《要方·序》）

他刻苦钻研医学经典，中年行医，非常重视民间经验，求知

① 《文选·左思咏史诗》。



若渴勤于思考，“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往往因一方一药，不远千里去虚心请教。为切脉、诊病、处方、锴药拜访求教；“驰百金而徇经方”，为一秘方不惜重金而购得。三十七岁，“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旧唐书·孙思邈传》），采集药材，进行加工制做。

581年，即隋·开皇元年。二十二岁时，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体会，能领悟和掌握医学知识及技能，开始在亲邻内外行医治病，因疗效好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声望日著。

他不仅研究医书，对诸子百家以及佛道典籍，也有所涉猎，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博览经史，知识渊博。《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载“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要方·胆腑·万病丸散》载“太乙神丹，余以大业中，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鸟、玄武大获曾青”，《续仙传·隐化，孙思邈》载“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综合上述史料可知，孙思邈有进行修道炼丹之事。

他研制医治恶疾（麻风）、癫痫温疟、癫狂、尸疰（类似结核）等疑难重症的丹药，只因雄黄（二硫化砷）和曾青（碱式硫酸铜）难得，量剂不足，几次实验都未能成功。之后他隐居青华山深研医理，继续探究，终于在蜀县魏家研制成有名的太一神精丹。孙思邈三十岁时为丰富自己的才学长途跋涉，四处拜师。据《酉阳杂俎》卷二：“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来往，互参宗旨”和《湘山野录》卷下：“有处士孙思邈，常隐终南山，与宣律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经久”所载，他曾和住在太白山下西铭寺的唐代精通医术的高僧宣律（即道宣法师，系佛教南山律创始人）常相往来，虚心探求医学奥秘。交流学术



心得，他还治愈了高尼净明吐呕久病以及令当朝太医无策的“霍乱”。

孙思邈设计由 15 味药材组成的人参汤，治愈因五劳七伤而久病卧床者。孙思邈一生曾“二遭热痢”。629 年，他忽患热毒痢，三日后“命将欲绝”，他自处一方煎服，“入口即定”，并告诫此病应“大须慎口味”热痢要“多益黄连”。630 年，他自用有效的苍耳根茎泥膏救治疗肿患者。633 年，孙思邈突“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痈，不得手近，几致殒毙”，左额丹毒，且致全身热痛，县令以种种药方治疗无效，几乎毙命，七天后孙思邈自处“治丹神验方”治疗，结果“其验如神”。635 年，汉阳王李元昌患腹水，孙思邈以“治大腹水肿气息不通命在旦夕方”治疗了几日就转危为安，还指出李元昌“差后有他犯因尔殂矣”，果然此人后因谋反罪敕令自尽。636 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因久服石药，导致其消渴病（糖尿病）加剧而死，曾为其服用枸杞汤病有好转。以孙思邈对防治消渴病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他指出“但不能长愈”，并认为该病如能在饮食、房室、咸食及面三项事情上谨慎从事，“虽不服药也自无他”，否则难以救治。多年来他在秦岭、巴山之间不辞劳苦采药治病，解救重危病患，曾治疗 600 余名麻风病人，其中有士大夫和其他民族的名人，而且“亲自抚养”，治愈 60 多人。655 年，孙思邈研制火硫黄并撰写了《丹经》，记载伏火硫黄法，他是我国火药发明的先驱者。

孙思邈对药物学的见解更有独到之处。他注重采药季节，否则，药草和普通花草很难区分，会徒劳无功；他列出 233 种药品，注明几月采，甚至注清哪时节采根、哪时节采花和茎。他列出 680 种常见药，建议随时采集以备不时之需。此外，他还强调产地要

清楚，列出基本囊括所有地方的133个州，共计有519种道地药物。这样具体、详细、全面的见解论述，在药物学上孙思邈是首创，后人因此称誉他为“药王”。

孙思邈对营养缺乏病的治疗也超过前人。唐代以前的医家对因缺碘所引起的甲状腺肿大，主张用海藻、昆布一类含碘的植物去治疗，孙思邈创新了用口服动物（鹿或羊）的甲状腺去治疗。而且，对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B而导致的脚气病，孙思邈最擅长。他用含有大量维生素B_1的多种药物来煮汤服用，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孙思邈在七世纪对这种病做了详细描述，并掌握了正确的治疗和预防方法。欧洲医生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十七世纪（1642），比孙思藐晚了一千多年。

孙思邈虚心学习和研究总结前代名医如秦越人、张仲景、华佗、葛洪、支法存的理论和经验，经过个人的实践摸索，在吸收继承中又有发展和创新。孙思邈在各科疾病的防治、针灸、药物、方剂、食疗、养生以及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治法则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独特的风格。

2. 结交医药家和文人

盛唐时期，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的中心，也是世界性大都市，当然是人才济济，俊杰辈出，孙思邈精通医术而且医德高尚，在此享有盛名。他问学会友，博览群书，经常和朝廷官员、社会名流还有医学专家结识来往。他和名相魏徵及当时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都交往频繁：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权、甄立言两兄弟；专长药性的韦慈藏等人都是好友，他们相互学习，探讨医学理论和技术经验。

孙思邈学识渊博，《旧唐书·孙思邈列传》记载他和当时以书法诗文闻名的宋令文、药学家孟诜和文学家卢照邻等知名人士常有往来，他们“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宋令文，汾阳人，生卒年无从考查。富文辞，工书，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其长子宋之问，以诗闻名。宋令文作为晚辈，对孙思邈非常尊重。孟诜（621—713），梁人，进士出身，武后时为台州司马，为当时知名之士，撰有《食疗本草》。故孟诜编撰《食物本草》，或向孙思邈拜请指导医药学、食疗知识。卢照邻(约635—约 689)，字升之，号幽忧子，祖籍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县一带），为四川新都县尉，也是“初唐四杰”之一，著有《病梨树赋》。他染麻风病多年，孙思邈本擅长治疗麻风病，并且，无论是医家之著名还是文华之非凡，卢照邻非常敬重孙思邈，故他和孙思邈交往甚多。

史书中记载了孙思邈与卢照邻的深厚友情。

卢照邻因事进京，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此官舍原为鄱阳公主的邑司，昔日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当时，孙思邈受唐高宗之诏也住在这里，孙思邈“辞疾请归”，唐高宗“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就是这样，他们在此有缘相遇相处。卢照邻对孙的医术和博学十分敬佩，时常与孙思邈讨论医病和医术的问题。

卢照邻患有麻风病，医治不好，消极悲观，常与孙思邈谈医论道，请教愈疾之理。《旧唐书·孙思邈列传》中，有孙思邈与卢照邻的一段对话：“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答道：‘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

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奔而为喘乏，竭而为憔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良医导之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孙思邈在和卢照邻谈话的过程中，表现了先秦古籍中的哲学思想，即主客观一致的唯物主义思想。孙思邈阐述“天人相应”的论点，说明天（自然界）与人是有着一定的本质联系，自然界与人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他认为了解天道变化的人，必可参政于人事；了解人体疾病的人，也必须源于天道变化规律。天候有四季五行，寒暑更替轮转。天道之气和顺为雨，怒为风，凝结为霜雾，张散为彩虹，这是天道规律。自然界有四时和五行的变化，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风雨霜雪虹蜕的出现，都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如果失衡便有灾难。人体和自然界一样，人相对应有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气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荣行脉内，卫行脉外，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生理活动也有其正常代谢规律。人的气色的好坏，声音的强弱，也是由于人体内部五脏运行的结果，同样有着它固有的常数即规律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导致疾病。人与自然界相同，如果违背了这种规律性，对人来说就是要发生各种疾病，对自然界来说就是出现各种不同的灾害。解决病疼就要对症下药，用针灸和药物治疗，对自然灾害要采取正确的对策和措施，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人们如果能认识并顺应客观规律善于

调理养生，就可能防止疾病的发生，善于运用药物，砭石、针灸进行防治，人体疾病可获治愈。

这反映了他的疾病观、治疗观和生死观，他反对听天由命，“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无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一气也，斯乃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孙思邈认为：人虽然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废除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但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各种有益方法以防治之。他还指出预防的重要性：“善于摄生，能知樽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迫于既逝之后”。孙思邈精辟地向卢照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养生治病的道理，“形体有天地有”。孙思邈的理论论述博大精深，足以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都有启迪作用。

卢照邻赞扬孙思邈“道合古今，学有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今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之妙，则其甘公洛下闳，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卢升之文集·病梨树赋序》）他钦敬孙思邈学问渊博，通晓古今，就如同中国古代的蒙庄子和天竺国的维摩诘一样，并称赞他像扁鹊一样医术高超。

卢照邻安心接受孙思邈的治疗，且疗效显著。恰逢此时，唐高宗要到甘泉避暑，命孙思邈同行，这样一来，卢照邻的治疗无法继续，他就回四川新都了。不久，孙思邈也还乡，两人再没有机会见面，只是书信来往。几年后，卢照邻以病辞官，到孙思邈

曾说的太白山养病。他听信道士的蛊惑，服用“仙丹”，非但没有治好旧病，反而添出新病，他痛苦地写下《五悲》、《释疾文》等文，叙述自己的不幸。恩师孙思邈逝世，他精神上备受打击，加之病情恶化、全身溃烂，他绝望地自杀了。虽然，孙思邈未医好卢照邻的病，但他们之间的故事，传为佳话，永载史册。

3．颇得帝王臣将赏识

孙思邈学问渊博，侃谈老子、庄子学说，精通佛家经典，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不仅在平民中享有声望，唐两朝帝王将相对他也是敬重有加。史上有三御请之说：

其一，隋文帝杨坚在登基前，曾征召孙思邈为国子博士，而孙思邈却托疾不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旧唐书·孙思邈列传》)，“起”是“赴”字的误笔。

其二，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召孙思邈至长安，“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旧唐书·孙思邈列传》)。称赞他年老气壮，听视聪敏，才能道德好，拟授他官职爵位，而孙思邈又是固辞不受，于是“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矣”。

其三，659年，唐高宗召见孙思邈，并拜为谏议大夫，孙思邈仍是辞而不受。

关于唐高宗之赐官谏议大夫之事，史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孙思邈列传》：“显庆四年，高宗召见孙思邈，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另有，《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至……至四年，思邈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按《唐会要》的记载，孙思邈应是接受了谏议大夫一职。

按《唐会要》的记载，孙思邈是留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在

京城长安居住十多年，除诊疗工作外，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孙思邈在此还阅读了皇室的医学藏书和医家珍存的贵重资料。同时，他也有机会吸收外国流传来的医学理论和经验。

盛唐时期医学教育十分繁荣，唐中央政府于长安设立医学最高学府太医署，建立医科学校和药园，各府、州也相继设置地方医疗机构。医学部针灸科是四大专业之一，中央和地方都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教学人员。

朝廷敕命修定《明堂》，《明堂》是指脏腑经络之书，把人身经脉俞穴绘为图像。孙思邈对旧明堂图的不足十分明了，他认为：旧明堂图年代久远，多有传写错误，“出没往来，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孙思邈查阅文献研究复杂经络，以甄权的明堂图为准，经甄权指导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定了《明堂经图》，并亲手创绘成世界第一部仰人、背人、侧人彩色《明堂三人图》。孙思邈又以晋代皇甫谧的《甲乙经》校核南北朝刘宋秦承祖的明堂图，指出秦图缺误，于是，鸠集古今名医明堂，著述《针灸经》。

唐·贞观三年，名臣魏徵等奉诏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魏征唯恐有误差遗漏，曾多次访问孙思邈并向他请教，孙思邈随口讲述有如目睹。“(唐)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传授，有如目睹。”（《旧唐书·孙思邈列传》）同年，朝廷又诏魏徵、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隋书》，至贞观十年书成。这期间，孙思邈发挥了顾问的作用。

唐·永徽元年 (650)，“贞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脂上，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内，不妨行

坐而常有脓出不止。永徽元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奇病下·金疮》）。将军背部中箭，孙思邈奉命诊治，只从冬季到翌年春，箭簇就不拔自落。这是两部《千金方》中最后记载的一个病例。658年以后，孙思邈在京城长安居住十多年，除诊疗工作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674年，他以疾请辞，唐高宗挽留并特赐给良马和长安光德坛，就是原来鄱阳公主的宅园，让他居住。675年孙思邈告老还乡。

4．撰写巨著两《千金》

孙思邈一生酷爱读书、勤于实践，凭借丰富的阅历和不懈地努力，成就了千古巨著《千金方》。“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少年时就喜读典，到须发皆白时还是手不释卷，坚持进行医药研究。他在秦岭、巴山、峨嵋、太行采药考察，在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甘肃诊疗著作。他重视古人积累下的宝贵遗产，注意从民间或其他朝野人士以及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外侨中收集验方和秘方，吸取各个方面的营养，积累了丰富知识和经验。他博通经书又精通导引针灸，擅用古方又自创新方，无论自己的或收集的处方，凡经临床验证有效，就收纳到他的书中使其广泛流传。

孙思邈居住京城长安时，有机会参阅皇室的医学藏书及许多医家保存的贵重资料。这些都使他的知识领域更加宽广，学识经验更为丰富，医学理论更趋完善[①]。加之，唐朝长安交通发达，和

①方志：“唐代医学与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83页。



印度等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较频繁的交流，印度的医药也随着传到我国。孙思邈不以信道教而抱成见，积极地学习并吸收了印度医药医方中的精髓。

鉴于汉晋以后数百年间，医药诸方，部帙浩博，求检至难，他潜心进行整理。从中国有文献记录起，到隋唐期间的有关医学资料，几乎都曾经他之手加工整理，进而汇总成集。他凭借着几十年的医学实践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精湛的哲学思想，加上他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经过几十年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千古巨著《千金方》。

他定居北五台山后边治病，边着手撰写《备急千金要方》。至650年，他用十年撰写完成《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用”[①]。

653年，他在《要方》脱稿之后又“研综经文”再读《伤寒杂病论》，着手撰写《翼方》。681年，完成了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充《千金要方》之不足。

数百万言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凝聚了孙思邈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是两部不朽的医学财富，这两部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千金方》对中国的医学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两书集唐代以前的医学大成，被誉为中国初唐前的中医临证百科全书。因此，它是唐代医学发展高度的标志，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不仅对中国医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对当时朝鲜和日本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方志：“唐代医学与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83页。



四、千古流传的《千金方》

两部《千金方》是孙思邈医药学术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医药学术和思想是两部《千金方》的灵魂。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自序中明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取名“千金”。由此可见，他崇尚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的医德精神。他著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医学成为人人掌握的技术，他还希望自己这部书成为“家家自学，人人自晓”的课本，“未可传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为贫苦人着想而求其价廉。他的《千金方》具备简、便、博、廉的特点,是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深受国内外医家的重视，手抄传本、私刊本、官刊本在中国和外国历代多有刻印。

1.《千金方》的主要内容

(1)《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此书系参考了大量唐以前医学文献，收载了郭玉、张文仲、范汪等历代名医的理论与经验，结合孙思邈的学术见解而撰写的综合性著作。撰年约七世纪初期，共 30 卷，分为 232 门，含方论 5300 首。内容主



要包括序例、妇人、少小、七窍、诸风、伤寒、脏腑杂病、疔肿痈疽、解毒、备急、食治、养性、平脉、针灸等。卷一为总论，主要论述医生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并阐述了诊断、治疗、处方、用药以及制药服药和药物贮藏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卷二至卷四为妇人方，包括求子、妊娠、分娩、难产到产后各病及妇科各病等，其中有药方540余首。卷五（上、下）为少小婴孺，从新生儿养护到儿科常见病的防治，列方320余首。卷六为七窍，包括眼、鼻、口、舌、唇、齿、喉、耳等疾患，还有面部疾患用药和美容方。卷七到卷21为内科疾患，先述风毒脚气，次为诸风（主要论述脑系病及中风），伤寒；其后按脏腑分类分别论述诸脏腑生理病理和有关疾患；再后为消渴、淋闭、尿血、水肿。这些卷提供各类处方2000余首。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和皮肤科病，卷二十四为解毒及杂治，包括瘿瘤及若干肛门和阴部疾患。卷二十五备急（急救医学）。卷二十六食治，卷二十七养性，卷二十八平脉，卷二十九、三十针灸，内容都很丰富。[①]

《备急千金要方》在卷首医学总论中，提倡崇高医德以济世活人为目的。并把“妇人方”列为首位，其次是“少小婴孺”的小儿科，这在中国医学文献中是罕见的[②]。672年《备急千金要方》手稿被日本留学生抄写带回国去。

① 赵石麟：“伟大的医药学家思想家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3页；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和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3页。

② 赵石麟：“伟大的医药学家思想家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3页。



（2）《千金翼方》

《千金翼方》简称《千金翼》，共30卷，是孙思邈晚年为补充《千金要方》的不足而续撰的综合性医书，撰年约7世纪中末期，在659年《新修本草》撰成以后。《千金翼方》含方论2900余首，主要包括：卷一—四为本草，卷一主要节录《新修本草图经》；卷二—三系《新修本草》本文部分（未录原注），卷五—八妇人（方），卷九—十伤寒，是据《伤寒论》古传本的一种改编，卷十一小儿（方），卷十二养性，卷十三辟谷，卷十四退居，卷十五补益，卷十六—十七中风，卷十八—二十杂病，卷二十一万病，卷二十二飞炼，卷二十三、二十四疮痈，卷二十五色脉，卷二十六—二十八针灸，卷二十九—三十禁经。其显著特点：卷一至卷四全部以及卷十二、十三、十四的相当部分，深入阐述药学问题；创造性地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研究和运用仲景学说；以大量篇幅论述养生学说和老年医学；更深入地论述了针灸的具体应用，对灸法有更多的探讨；二十九、三十两卷为“禁经”，唐时太医署设有禁咒科，这部分内容是孙思邈搜集的禁咒之术，孙思邈说“将恐零落，编为两卷”，并说“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但有的运用起来，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神鬼迷信之术掺入本书，自然是美玉之瑕，但其中涉及心理疗法，并搜集不少“禁咒”文献，可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

书中对历代医学发展和各时期的医学贡献都有评述，集前医家精华，创新医学各科；从医德、防病、治病，到医学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治疗等，都有系统全面论述；本草针灸卫生养生方面卓越贡献；收录失传古代医籍、记录国外传来的医药知识和民间的土、单、秘、验药方，功不可没。



《千金翼方》的书名，是孙思邈受《易传》的启发而定名，“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沿斯义述此方名矣”。“十翼”即《易传》，“翼”有辅翼之意，从《千金翼方》的内容看，也确有对《备急千金要方》做新的补充。

2. 《千金方》版本和流传

《备急千金要方》的版本：早期传本（早期传本的部分佚文、宋代保存的古本、日本保存的古本）；北宋官本系统（南宋初官本、影刻、影印宋本、其他宋刊本、元刊本及其复刊本、建宁本及豫章本）；道藏本系统（道藏本、明代以后的重刊本）；《千金要方》的评注本及节选本（《千金宝要》、《千金方衍义》、《唐千金类方》）。

(1) 《千金要方》早期传本

《千金要方》原本早佚，根据马继兴的研究，北宋以前的早期传本均为手写抄录，早期传本的部分佚文，主要见于唐、宋之际。《外台秘要》共引 1578 条，《医心方》共引 1141 条。宋代民间曾刊行了未经宋臣校改的祖本，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用元版、明版补上所缺 10 卷，由陆心源皕宋楼收藏。此书一定程度保持了的古貌，1907 年被日人购去，现存于东京静嘉堂文库。日本还存有和气嗣成及后裔抄录唐宋之际的《千金要方》并题跋本，后经松本幸彦影摹题跋，由丹波元坚撰序刊行，书名题为《真本千金要方》，但此本只有一卷；1940 年张骥氏据 1831 年丹波赖常手校本，予以集注刊行，书名《唐本千金方第一序例注》。

(2) 《千金要方》北宋官本之系

1066年，北宋校正医书局参考唐以前多种医籍，对《千金要方》重加整理校定后由高保衡、林亿等人撰写序文及凡例并刊刻印行，即北宋治平官版。这种北宋官版早已佚传。

19世纪初日本江户医学馆曾发现宋版《千金要方》一部，丹波元坚等曾据该本的讳字定为北宋本，而马继兴和宫下三郎定为南宋初期官本。此本约在南宋、元之际传入日本，先后被北条显时和上杉氏所藏，1849年江户医学馆根据此本影摹后刊行，并将缺损的卷四部分据元刻予以补足，这就是影宋刻本。1878年由中国独山莫氏购回中国予以重印，1908年的《千金要方》石印本及清末磷端堂重印本，均系其派生的衍化产物。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江户医学馆的影宋刻本，用四合一版面影印，1965年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也据此本影印。1974年日本每日新闻开发公司，更据此本的原大精工影印500部，并附曼殊景嘉氏的《多纪氏本〈千金要方〉据北宋本重校》一书（1册）。宋刊本还有宋代“西蜀经进宫本”。据《经籍访古志》认为尚有北宋元祐刊本及南宋补刻本，尚无确证。

元刊本及其复刊本：现存的元刊《千金要方》在日本有原为多纪聿修堂旧藏，今藏日本宫内厅的一部；又有原为陆心源□宋楼旧藏，今藏静嘉堂文库的一部。中国北京图书馆藏一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残存2卷。根据元刊本的复刊本，有明刊本一种，是明初1521年刘洪慎独斋刊本。又有日本刊本二种，1785年京都后藤敏刊本及1799年的重刊本。此外，还有建宁本及豫章本，今均佚，两种刊本均在南宋后至明代以前。

（3）道藏本之系

早期道藏本，是唐宋之际，道教徒参考《道藏》中的“探道



藏之别录”而作，1066年校正医书局，在《千金要方》序文中言明参考了当时的道藏本；后期道藏本也是现存本，是1449年前后道教徒编的正统本《道藏》，其中继续收入“太平部”，名《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内容基本没变，只是将原书30卷改析为93卷。明代中期以后《千金要方》的30卷本在国内已不多见，刊本主要是以93卷的道藏本为其主要依据。其中有1544年乔世定刊本，1588年祝氏刊本、1604年方中声刊本，1689年张、喻二氏刊本，民国时刊本及1695年日本刊本等。

(4) 《千金要方》的评注本及节选本

《千金宝要》是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郭思氏选录《千金要方》中的单方，并续附有关验方编成，1124年刻石于华州公署。1443年刘整再次在华州刻石，1455年杨胜贤因刻石在冬天不便拓印，改刻木版8卷印行。此后1516年郭勋及1537年张翰均有木刻本，1572年秦靖王朱敬镕，喜方之简便，药之近易，将此书并为6卷，刻成石碑立于太玄洞前并镂版刊行。这是第三次在耀州刻印。自此以后，清代至民国间的各种重刊本（包括石印、铅印本）近十种均系以此为据。《千金方衍义》是1698年张璐根据乔世定刊本重新改编为30卷，并附加详注（即“衍义”部分）而成。其后，此书的各种复刊本（木版、石印等）及钞本十余种，在清代中末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千金要方》的传播。《唐千金类方》是1908年黄思荣将《千金要方》进行分类改编成《唐千金类方》24卷，附加按语并刊行，也是以道藏本为依据的。①

---

①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和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3-1046页。



《千金翼方》的版本：早期传本及宋代刊本、宋以后各种复刊本、影刻与影印元刊本。

根据马继兴的研究，早期传本及宋代刊本《千金翼方》撰成后，其早期传本之一曾为唐代的《外台秘要》所引用，共计249条，但《医心方》未引此书。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后，将《千金翼方》进行校定并刊行，其时间约在1066年（《千金要方》初刊年代）稍后，这是此书最早的刊本。

元代刊本既知有1307年（大德十一年）梅溪书院刊本。明代有正德间（1506—1521年）刊本，万历三十二年（1604）王肯堂刊本及华氏刊本（刊年不详）。清代有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金匮华希闳刊本。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保元堂复刻本（华希闳重刊），1868年（同治七年）扫叶山房刊本，1878（光绪四年）上海印日本文政版。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与《千金要方》合刊石印本。1912年江文书局本，湖南益元书局刊本，1915年江左书林石印本，1920年中原书局石印本及年代不详的鸿宝书局石印本等。日本有1770年（明和七年）望月三英刊本（据王肯堂本）及年代未详的一种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明代，因《千金翼方》的宋刊本早佚，又未被收入《道藏》中，所以元刊本在国内也极罕见。18世纪末，日本聿修堂藏有元梅溪书院本一部（见《经籍访古志》），1829年日人据以影刊行世。1878年（光绪四年）中国灵芬阁据日本影刊本重印。1955年及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日影刊本影印，1965年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即据此影印。至于聿修堂所藏的元刊本，自明治维新后，在19世纪末已下落不详（据《日本访古志》）。

据日本医史学家宫下三郎统计，日中两国现存版本即有16



种。国内外翻刻出版者，据统计由宋本至今，《备急千金要方》30余次，《千金翼方》约20次，两部《千金方》合刻本6次；另外还有许多评注本、节要本以及某卷的单行本10余种累次出版。一千多年来《千金方》已刻印多次，流传甚广泛，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有所收藏，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此外，干祖望认为现存主要的古刻版还有：

《要方》：

1. 宋·治平二年（1065）原版（现存于日本的上杉文库）。2. 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小丘山房乔世定刻本。3. 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刊本。4. 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吴氏重刻本。5. 明·刘氏慎独斋刻本。6.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刊本。7. 《四库全书》本（1799）。8. 日本·天明六年（1786）西宫园藏版皇都西村上勘兵卫等发行。9. 日本·嘉永二年（1849）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翼方》：

1. 元·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梅溪书院刻本。2. 明·万历三十二年乙巳（1605），王肯堂刊本。3. 清·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金匮华希闳刊本。4. 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上海印日本文政版。

3. 两序文采鸿儒气势

孙思邈广悉古典精于文墨，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千金方》充分显示出深厚的文史学养和造诣。两篇序文，文藻华丽、工力淳厚，取词用字引经据典，信手拿来妙笔生花，文采飞扬，雍容大度。孙思邈以文学鸿儒的磅礴气势，使其《千金方》在医史上光腾万丈神采飞扬。干祖望曾称誉：“2000年来医学著



作中文学气息最浓郁之作。”《千金方》两篇序文，文藻华丽，工力淳厚，是其文风特点。干祖望对此有过精辟解析，本书作者至今尚无见如此漂亮的解析，实在感觉没有必要再多做解析，本文在此基本转录与大家分享，并且，本书后附录两序全文，以便参照查阅之用。

“要方自序”开篇“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

下笔第一个字“夫”，用万钧之力揭开全书序幕，接下“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16个字，把六朝文的韵味天籁、华藻丰姿显示得墨酣笔畅。而且入声的“十药”[①]来收尾叶脚，戛然而止，更感神韵。加之声律和谐，格式协调，组织严谨，诵读有铿铮作金石之声。更其是仗对工巧，天衣无缝。“清浊”对“上下”、“剖判”对“攸分”，天地人“三才”对金木水火土“五行”，更是天造地设。唯“肇基”对“俶落”欠缺骈偶而成“羊角对”[②]，美中不足。取用单字，也幽雅朴实。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用来影射天地，隐而不露不晦，使人都能心领神会。更取用动词的“剖”、“判”两字，使本来呆板沉闷的气氛活跃而形象化起来，确可引人入胜。“肇基”引《书·武成》“至于大王，肇基王迹”。“俶落”两字，自有一番工力与技巧。《书·胤征》：“畔官离次，俶扰天纪。”《诗·大雅》：“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前者是开始发轫进展之谓，后者是开拓创造向荣之意，“俶”字含有开始、创造到向荣的意思，也就是事物由茁壮

①十药：诗韵有“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者，“十药”韵为入声中第十位，故称“十药”。

②羊角对：指仗对不工的联，俗称羊角对。

到茂盛的阶段。《礼·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出林。""落"字代表盛极趋衰到凋零的意思。全句"五行俶落"，说五行循环交替，始荣后衰再始再衰循回消长不息。取"俶落"描写，特别烘托出它的规律法则。之后用"夫何荣势之云哉，此之谓也"，慨叹语气，内涵深刻让人回味。正是神龙之尾，绕梁之念。

"翼方自序"是三十年之后完成的，垂暮之年，涉世更深，见闻更广，所以，他行文走笔更形苍劲老练，用词取字，趋于深奥，境界炉火纯青。藏龙化石、顽枝虬根的文章，以致使人更加难懂费解。同时，他的恬澹无为。超尘脱俗的思想，入道家虚无之域，抱一含元、步虚控景道教真理，无意中融贯于全篇序文。

"翼序"开篇："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

"原夫"是因《翼方》是《要方》的续集，唯有"原夫"两字可以将三十年的空间接连。承上又启后来把《翼方》开展。接下"神医秘术，至喷赜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珍"，四句一段落，属典型的骈四俪六体文章。其平仄之叶，仗对之工，四六之体，平稳规矩。

前两句论医，后两句谈药。赜，《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意思是精微深奥；参，《庄子·大宗师》："玄冥闻之参寥"，是比喻高不可攀的意思；道枢，《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意思是关键之处，在于道枢。连贯起来解释，是说一个出神入化的高明医生业务水平，要达到（至）高深而奥妙的医学理论，必须掌握关键。第三句，宝饵凝灵，药食同源，所以古人都称为饵。神医对宝饵，作匹对，前者平平，后者仄仄。"凝灵"是把所有的钟灵毓秀凝聚在一起。"真畛"，



“真”是真正或真实；“畛”是田间的阡陌，意味着纵横贯通。两字连起来，就是在理论上真正像阡陌纵横的连贯通达。宏，《书·盘庚下》“用宏兹责”，广博之意。功，《国语·齐语》“相陈以功”，成效的意思。浃，《荀子·解蔽》“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贯通的意思。“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的意思是：宝贵方药，犹如灵气所宗的神效，也要有赖于广博的知识来融汇贯通于这个像阡陌纵横的知识海洋中。

之后，“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1]增玄翼之说，或徹斯义，述此方名矣。贻厥子孙，永为家训”，是以孔子、陆绩对《易经》整理和阐发，来比喻两部《千金方》。自我评价两部《千金方》，既是对前人遗产“兼收并蓄”，又是自己心得经验的“推陈出新”。在此交代说明《千金翼方》之“翼”字书名，是缘于《易》十翼。“贻阙子孙，永为家训”，是用画龙点睛笔法来突出写书宗旨。

两篇序文，前序用神龙之尾来结束，悬念遐思为后部著作衔接留白；后序用“原夫”承上启下来呼应。整个序文给人留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感觉，孙思邈文学造诣足实让世人惊叹。

4．据典渊博史家风范

在历代医学文献中，《千金方》例喻史乘，洋洋大观创中医古今医学文献中之最多。极为丰富的历史故事增加了《千金方》的文史价值，使其更加鞭辟入里。《要方·序》从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到黄帝创制九针、歧伯、雷公论经脉

①陆绩（187—219），三国吴郡人，字公纪。



究义理，始创医学药学；续春秋医和、医缓；六国扁鹊、汉仓公、仲景；魏华佗的继承发展，几组人名的串联，就把唐前医史一览无遗，简而不漏清晰地勾勒出来。非精通文史的大医家，是不能有此成就的。中国古代医史就是在此基础定说立论，由此可见，其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新唐书》誉孙思邈“通百家说”，信非虚语。《千金方》文章结构精练，特别是取用单字、词目贴切，引经用典句言达其意，取文用字之巧妙，文史典故之众多，曲尽其妙，波澜老成，洋洋大观烘云托月，文史医经内涵神韵具佳，是中国医史仅有的卓尔不群者。以下将《千金方》出现的历史人物和文字典出分别列下。

(1) 历史人物事典有：

《要方·序》中“孔宣系十翼之辞”，指孔子（文宣王追谥）整理及撰述部分《易经》的事。有人把《易》的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封称为十翼。所以十翼与《易经》是同义词。

《翼方·序》中“陆绩增玄翼之说”,指三国时人陆绩，整理《易》经，著《陆氏易解》书。

《翼方·序》中“才非公干”，考唐前，号公干者有两人，其一为汉末刘桢，为“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闻名。其二为晋王祯之，历任大司马长吏，善于辞令。才华而论，此处公干刘胜于王。

《翼方·序》中“德异士安”,考历史号士安者四人，此处为晋东汉至西晋时甘肃平凉西北之皇甫谧。字士安，晚年自号元晏先生，自号皇甫。著有《甲乙经》12 卷。

《翼方·序》中“竟三余而勤药饵”。“三余”两字初见于《陶渊明集·感士不遇赋序》“余尝以三余之日”，即冬为岁之余，夜



为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要方·治病略例》中“扁鹊为秦太医令李所害”，事见《史记·扁鹊传》：“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

《要方·少小婴方上》中“项托颜回”，项托应作项橐，在出智齿时，孔子曾问道于他，但少年早死；颜回为孔子弟子，享年仅31岁。这两人，一为孔子老师，一为孔子弟子，俱为夭折短命者。

《要方·少小婴方上》中“杨修孔融”，杨修，三国时人，为曹操主簿，年44岁，为曹操所杀。孔融也被曹操所害，时年55岁。两人都为短寿者。

《要方·风毒脚气》中“骐骥而不遇伯乐”，典出《楚辞·怀沙》：“伯乐已没，骥马程兮。”

《要方·痔漏·恶疾大风》中“怀颖阳之风”，高士巢父许由隐居于颍河[1]之北[2]，后人称不问世事隐居的高士为颍阳遗风。

《要方·食治》中“亦如枳橘所生土地随变”，战国时齐相晏婴（？—前500）出使楚国，设晏饮酒时，捉来一盗，是齐国人。这时晏相十分难堪，但他用外交词令来解释，说：“生在淮南的橘子，一旦移植到淮北，就可变成枳了。”

《翼方·药录纂要》中“亦犹咎繇创律，但述五刑，岂卒其事”，咎繇一名皋陶，传说为舜之臣，掌管刑狱事务。他为舜订立包括五刑[3]在内的法律。《书·舜典》的“五刑有服”，即指此事。

---

①颍河，在河南省登封县西南。

②山的南称阳、北称阴。江河的南称阴、北称阳。

③五刑，五种不同的刑法：一面上刺字、二割去鼻子、三截去腿、四割去生殖器、五杀头。



现在接受法律制裁者称“服刑”，典出于斯。

《翼方·中风下》中“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华佗治曹操头风，诊脉后谓：“大将军头上虽无伤痕，但必然受过创伤。”曹操回忆，确在讨伐吕布时，为擂木撞击，佗乃为之针灸。

（2）文字巧妙文史典出有：

《要方·序》中“万物淳朴”，典出《晋书·刘弘传》；“大圣神农氏[①]愍黎元之多疾”，愍，典出《左传·昭公二年》；黎元，典出在《诗·大雅·云汉》；“立心不常”，引展于《孝经·开宗明义》；“青衿之岁”，典出《诗·郑风·子衿》；“蒙蒙昧昧”，典出《楚辞·宋玉九辩》与《楚辞·屈原九章》。

《要方·大医习业》中“吉凶拘忌”，典出《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尽善尽美”典出《论语·八佾》。

《要方·大医精诚》中“精诚”，典出《庄子·渔父》；“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含灵，典出《晋书·桓玄传论》；“贼”典出《论语·先进》；“惟当审谛覃思”，审谛，典出《尚书·大传略说》；覃思，典出《汉书·叙传》。

《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中“会通玄冥幽微”，玄冥，典出《庄子·秋水》；幽微，典出《后汉书·崔骃传》。

《要方·求子》中“付母之徒”，典出《公羊传·襄公三十年》；“随情逐物”，典出《国语·晋语》；“染著坚牢”，引汉·王符《潜夫论·务本》；“妄徇虚声”，典出《韩非子·六反》。

《要方·风毒脚气》中“自聘了了”，典出《南史·戴法兴传》。

《要方·七窍病下》中“药入肌肤中淫淫”，典出《楚辞·九

①神农氏，传说中的古帝王，古史又称炎帝、烈山氏。



章》。

《要方·诸风》中“口欹”，典出《荀子·宥坐》；“虽有补天立极之德”，典出《淮南子·览冥训》。

《要方·伤寒下》中“嘿嘿欲眠，目不得闭”，典出《汉书·匡衡传》。

《要方·肝脏》中“役用非宜”，典出《国语·晋语》。

《要方·小肠》中“多言而谩说”，典出《楚辞·九章》；《要方·脾脏上》，“肉极者主脾也”，典出《汉书·王褒传》。

《要方·肺脏下》中“兴言于此”，典出《周礼·夏官》。

《要方·肺脏》中“微使淖”，典出《仪礼·少宰馈食礼》；“剧荏便□”，荏，典出《论语·阳货》，□，典出《战国策·赵》。

《要方·大肠腑》中“吸吸气上欲□”，典出《楚辞·九章》。

《要方·膀胱腑》中“名玉海”，典出《梁书·朱异传》。

《要方·丁肿痈疽》中“忽起如蚊蚋啄”，典出《大戴礼·夏小正》；“堤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典出《管子·度地》。

《要方·痔疮·恶疾大风》中“斯疾”，典出《论语·雍也》。

《要方·解毒并杂治》中“岂非枉横也”，枉，典出《礼·月令》，横，典出《汉书·扬雄传》；“大悬绝不及甘草”，典出《论衡·知宝》；“闲解”，典出《诗·秦风》；“精华消歇”，典出《史记·天官书》。

《要方·食治》中“含气之类”，典出《汉书·贾捐之传》。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中“养性之都契也”，都契，典出《云笈七签》[①]。

---

① 《云笈七签》7部，计122卷，宋·张君房撰。



《翼方·序》中“安假悬衡之验”，悬衡，典出《淮南子·说林》；“检押神秘”，典出《汉书·扬雄传》；“譬锐轪之相济，运转无涯”一语，来于《论语·为政》。

《翼方·叙虚损论》中“凡人不终眉寿”，寿眉，典出《诗·豳风》；“不异举沧波以注爝火，颓华岳而断涓流”，爝火，典出《庄子·逍遥游》，颓，出《礼·檀弓上》，华岳，典出《礼·中庸》。

《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中“七日徹……”，徹，典出《诗·豳风》。

《翼方·禁经·受禁法》中“众人浩浩”，典出《书·尧典》；“而我独嘿”，典出《史记·荆轲传》。

《翼方·退居》中“役役随物”，典出《庄子·齐物》。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深奥的或出典一时没有找到的文字或辞目，如下：

《要方·肾脏》中“夺索”；《要方·妇人方上》中“生视邺脏”；《要方肾脏》中“翻诈”；《要方·备急》中“铋铋”；《翼方·序》中“挂发”；《翼方·禁经上》中“渴饮武都”；《翼方·序》中“营叠”；《翼方·杂病下》中“王相”；《翼方·杂病下》中“趣”。

五、对前代医家的继承发展

1. 渊源仲景医德思想

孙思邈佩服张仲景医术精湛，更敬重他高尚的医德思想，从《伤寒杂病论》原序和《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两书相似序文中，可明见两者继承和发展的渊源关系。

医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书的序中。孙思邈在《序例》中引用张仲景文有五次，可见其影响之深。从其所引内容来看，张仲景对当时医生不学无术、诊疗草率的批评，被孙思邈作为“医之深戒”，而且孙思邈医德思想集中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也是以此借鉴而布局的。孙思邈对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阐述的针砭时弊、启迪后学的观点，十分赞同，多处引用。“如此可为仓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在《序例》的《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中，开章明义地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明医书，精明医道。孙思邈虽然精通百家，但专注于医药，是受张仲景的影响。张仲景的为医之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是孙思邈的座右铭，也是其一生的写照。孙思邈也继承了张仲景的忠孝思想。

孙思邈对张仲景的医德思想又有所发展。张仲景以儒家的忠孝仁爱思想为医德基础，孙思邈在此基础上又受到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故常以慈悲为怀，存普救众生之想。比仲景之说要更广泛感人。强调医生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医生的职业形象，明确了医疗工作中具体的道德行为，改善了医德教育的方法。将张仲景批评为主、推崇上古至汉名医，似有厚古薄今之嫌的方法，改为以正面教育为主，设身处地，谆谆教诲的形式。孙思邈在医德方面堪为万世师表，不能说与其医德教育方法没有关系。①

2．继承扁鹊学派思想

孙思邈对前代医家十分尊重，在《千金要方》中，注明引用以诊断见长的秦越医家“扁鹊”的佚文共121条，字数最长的条文约700字，最短者仅9字，总字数约5950字②。主要涉及病机、诊法、治则、养生、针灸等方面。以“扁鹊曰”或“扁鹊云”的形式出现。《千金要方》中“扁鹊”佚文，有许多可以在《难经》、《脉经》、《中藏经》等医籍中找到相关的内容。《千金要方》中所引扁鹊佚文的作者，当为魏晋六朝时期扁鹊学派的传人。其中包括周秦以前的扁鹊，魏晋六朝以前的扁鹊学派传人，尤其是战国时期秦越人继承的扁鹊的诸多学术观点。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引用扁鹊佚文，不仅是保存了部分有关秦越人关于扁鹊的珍贵学术资料，展现了魏晋六朝及其以前中医诊断学、病理学的

①王三虎：“孙思邈对张仲景医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国医论坛》1989年第5期，第26页。

②苏礼、王怡：“《千金要方》所引扁鹊佚文及其学术价值”，《医古文知识》1997年，第3期，第28页。

水平及某些治法特点，还基本继承和反映了早期扁鹊学派的学术思想，因而，扁鹊佚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①]

3. 汇集经方学派大成

孙思邈汇集经方，化裁经方，精拟良方，广采偏方，成两部集大成之巨著，确为经方学派中集大成的代表之一[②]。经方学派，在宋以前专指从事经验方撰辑、整理的医学流派，而在宋以后则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即用仲景方治病的医学流派。为区别起见，前者称经验方学派；后者则称经论方学派。孙思邈汇集经方，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暗……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他收集仲景方，对于阮河南、张苗、范东阳等人的经验方，也采撷其精要，收载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之中。与王焘的《外台秘要》两相参照，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部巨著当中许多经验方都出于葛洪《肘后方》、姚僧垣的《集验方》、谢士泰的《删繁方》、宋侠的《经心录》等书中。他还化裁经方，对前人之效方，或兼收并蓄，或精心化裁，"弘之惟新"。不仅如此，他还按理法化裁前人已效之经方，并且照组方原则拟定应验之良方。另外，他广采俗说单方。孙思邈的《千金方》，不仅有《伤寒论》以外许多医家的经验方，而且还有他根据理法方药理论所拟定的效方，以及他所收集的俗说单方。孙思邈

---

①苏礼、王怡："《千金要方》所引扁鹊佚文及其学术价值"，《医古文知识》1997年第3期，第28页。

② 任春荣："浅谈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发展上的贡献"，《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7页。



较早地完整保存了由六朝到唐代初期的古经验方书。①

4．发展仲景学之贡献

东汉张仲景，是创立临床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鼻祖，其《伤寒杂病论》18卷是中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在医史上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影响巨大、流芳百世。西晋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首次进行整编，将其中伤寒部分录出，编理成《伤寒论》十卷；之后，唐孙思邈又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编入在《千金翼方》九、十卷；接着，北宋高宝衡、孙奇等校定了《伤寒论》十卷；金皇统（1141—1148）时，成无己首次作注，完成《注解伤寒论》。

孙思邈对仲景治疗伤寒的成就，推崇备至。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评价相当高，他在《千金翼方》中称赞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遂披伤寒大论，鸠其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他认为张仲景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伤寒杂病论》问世后，因遭兵火洗劫，原书散佚不全。西晋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但仍流传不广，以致孙思邈在编写《千金要方》时，在包揽了当时及唐以

①任春荣："浅谈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发展上的贡献"，《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7页。

前的医学成果及许多濒临失传医籍的情况下，只因尚未见到完整的《伤寒杂病论》，故卷九中收录少，因而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勤求博采，收集到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几乎收录宋版《伤寒论》之全。他分别编次在《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伤寒方及有关门下。晚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和补充，对《伤寒论》深入分析研究重新整理，从而奠定了唐代纂集《伤寒论》的初基。孙思邈对于保存整理《伤寒论》这一珍贵典籍，发扬仲景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①]

5．编纂两书的《伤寒》

在唐代，《伤寒论》已被规定为医者必读的医籍，孙思邈对该书相当推崇，他搜求、整理、编纂《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仲景学说的有关医论和思想。孙思邈对张仲景《伤寒论》一书，推崇备至，以“特有神功”，用于临床“未有不验”而予以极高评价。同时也认为该书未能宏扬于天下，主要是旧法方证，其旨高深，意义幽隐，读者莫测其致，造次难悟，医人未能钻仰，中庸之士，绝而不思听致。鉴于一般医生较难掌握，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这和仲景本意相反，虽服汤药，百无一效，遇有急症难以依法救治。他在晚年潜心研究，本“博济”之心，将旧方以“宏之唯新”的愿望，进行了整理工作[②]。“遂批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是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他对《伤寒

①苏礼：“孙思邈对仲景学说研究的贡献”，《陕西中医》1982年第5期，第1页。
②苏礼：“孙思邈对仲景学说研究的贡献”，《陕西中医》1982年第5期，第1页。



论》从理论经过临床体验得出明确结论[1]，孙思邈对伤寒之名，没有限定指某一种病，而是包罗各家之说和各种发热之病。他对伤寒病的见解，即“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实际是说，对此病要重视初起，太阳一经，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与强调得病要早讲，始觉即须救疗，而且汤药不可避晨夜（见《千金要方》）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寻方大意，不过三种”，对后来治伤寒学者，影响很大，如明·方有执、喻嘉言守其说而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成为错简重订派的主要观点之一[2]。“喻嘉言承方有执之意，太阳伤寒立三纲鼎足说，即从此获得门径。”[3]孙思邈研究整理张仲景著作，为后人保存了一部与张仲景原著比较接近的《伤寒论》。对研究仲景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

（1）汇集前贤珍贵资料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后，经历三国纷争、五胡之乱，成书几经流散，因而在隋代就有亡佚的记载。如阮孝绪《七录》中说，“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王叔和编撰的《伤寒论》，孙思邈《千金方》是现存记载《伤寒论》较早的古医籍，也可说是当前最早的版本。它接近于《伤寒论》原文内容，是校勘《伤寒论》的主要参考医籍；汉唐时期对伤寒病的论证治疗可谓议论纵横、方法繁多、内容丰富，《千金方》集前贤伤寒至论，反映此门

①郭谦亨：“论孙思邈编纂《伤寒论》的贡献”，《陕西中医函授》1991年第3期，第5页。
②李成文主编：《中医发展史》，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③丁光迪：“孙思邈对伤寒学的贡献”，《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1页。

学科在当时的学术繁荣状况，这对了解研究唐前伤寒学弥足珍贵。

(2) 开创方证分类先河

孙思邈整理研究《伤寒论》，在编次方法上提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原则。改变比较抽象的六经辨证法，将《伤寒论》所有条文，分别按法、按方比附归类。也就是以法类证，以方类证，方法并重，重新编次。将方剂主治和临床证候密切联系，以便“仓促易知”，读者易得其要旨，提高诊断与治疗水平。他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的比较分析方法，为后世研究《伤寒论》开辟了新的途径，实开后世《伤寒论》注家“辨证派”与“类方派”的先河。①

(3) 确立伤寒三方证治

孙思邈编纂《伤寒论》，目的是古为今用，他遵仲景制方之法，而又不泥于仲景之方，孙思邈说：“方虽是旧，弘之惟新。”他对《伤寒论》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孙思邈对于经方（即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之方）的认识，有其独到的见解，孙思邈特别强调桂枝汤法、麻黄汤法、青龙汤法三法的重要性，他认为伤寒方中最重要者“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并说：“此之三方，乃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伤寒论进行了大胆的整理研究工作，分太阳病为桂枝、麻黄、青龙、柴胡、承气、陷胸等证和杂证；其次顺序叙述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和厥阴；再次综合归纳伤寒治疗的宜忌，列举

---

①陈亦人：“孙思邈编纂《伤寒论》”，《新中医》1982年第10期，第55页。



忌汗、宜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等条以说明之；然后，再叙述汗、吐、下后病状等。使学者易得其要领。”较叔和所编更加全面，孙思邈三法之见解，后世发展为“三纲鼎立”学说，影响深远[①]。孙思邈对经方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他整理创制了不少新方，弥补了宋版《伤寒》、《金匮》某些地方有法无方的不足。[②]

(4) 临床重视太阳阳明

孙思邈编纂《伤寒》，对张仲景《伤寒论》“六经”篇章认真领会，他知道这是张仲景“寻求古训”，精研《素问》、《八十一难》、《阴阳大论》，又结合外感病传变规律的特点所创立。孙思邈探求师意，根据“太阳”“阳明”二经所列证、法，竟达全书二分之一以上，从中启悟到太阳、阳明，是伤寒病病变发展的关键二经。从临床实际看，太阳为伤寒病之主体，守住关口消病可愈安，否则，有“三阴”等重危现象。孙思邈的正对之法是“汗、吐、下”，以太阳为主体的“三纲”正对。“太阳”为伤寒病辨治的主体，发汗是太阳病祛邪外出的第一要法，由于邪之感伤不同，发汗也须随因辨治。孙思邈在太阳病的证治中，特别重视“汗法”的辨证运用。他认为伤寒太阳病治疗方法大体“不外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他的这一观点，成为宋代成无己，明代方有执，清代喻嘉言等人“三纲鼎立”之说的开端源头。

阳明为伤寒传变的关隘。邪聚阳明为里热内实之候，化火化

---

①李经纬：“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324 页。

②苏礼：“孙思邈对仲景学说研究的贡献”，《陕西中医》1982 年第 5 期，第 1 页。



燥，迫津耗气，皆由此起。如能辨治准确可邪退正安。反之，必将久郁正伤而变见三阴。因此说，阳明是伤寒传变的关隘，对临床非常重要。[①]

(5) 增设妇幼伤寒门类

张仲景《伤寒论》论述妇人伤寒仅热人血室一证，幼儿伤寒则全无记载，妇幼伤寒病，以往尚无专门论述。《千金要方》始开创先例，妇人方有伤寒一章，妇人妊娠伤寒共十六方证；少小婴孺有伤寒一门。孙思邈认为：小儿伤寒病，主要指天行非节之气，时行疾疫之年，所伤为病。其治节度如大人法，但用药分剂少异，药小冷耳。他注意到婴、幼儿，药难入口，疗效作用小，为此，他创制了许多适宜于婴幼儿特点的治疗方法，这也是少小伤寒门的特点，如汤剂、淋法、浴法、洗法、粉散、粉身，生药取汁服、滴鼻、吹鼻、药末、火炙等，这些治疗婴幼伤寒的特殊方法，大部分为外治，适合儿科特点、适用于临床，较口服给药方便且疗效快，当今尚很实用。由此可见，孙思邈对妇幼的重视，以及他对伤寒学研究之丰富[②]，都对伤寒学说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6) 预防外感伤寒思想

孙思邈《千金要方·伤寒例第一》中“博采群经”，“广设备拟”是《千金要方》伤寒两卷的主要精神，后人称之为广义伤寒。如开首即提出，天行温疫、瘴疠，继之是《小品》论伤寒与天行温疫之异，华佗的伤寒热毒，王叔和的伤寒起自风寒的次第，陈

---

①郭谦亨：“论孙思邈编纂《伤寒论》的贡献 ”，《陕西中医函授》1991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②丁光迪：“孙思邈对伤寒学的贡献”《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第 1 页。

廪丘的蒸汗，以及温毒，温病阴阳毒等，最后归总，还是称为时气，伤寒和温病。孙思邈对伤寒病看法是“伤寒热病”，可为“冒犯风寒，天行疫疠”[①]。

他认为，“伤寒热病，自古有之”，是瘴疠之气，人总能找到药物来防治它，对伤寒病“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孙思邈对防治外感病持有进步观点，他认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是预防疾病的积极办法。基于这种认识，他十分重视预防外感病。如在《要方·伤寒上》他提出众多的预防伤寒的方药和措施，诸如屠苏酒方，太一流金散、雄黄散以及一些单方等等。在其《翼方·伤寒下》又附四首防治方药[②]。《难经》中说：“伤寒有五。”其中包括温疫，乃广义伤寒。温疫流行历代都有记载，其病来势凶猛，变化迅速，流行一方。孙思邈也十分重视对伤寒温疫的防治，突出表现在辟温疫的思想，即预防外感的思想。孙思邈创制了许多预防方药，如屠苏酒方，服之令人不染温病，此方在历史上很有声望。又如雄黄散、太一流金散、药囊佩带辟疫等药方和方法[③]，强调温病预防为主的思想，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方法尚为今天预防传染病所借鉴，这对祖国医药学的预防医学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7) 孙思邈《伤寒》模式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各编有两卷“伤

---

①丁光迪：“孙思邈对伤寒学的贡献”，《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1页。

②王永谦：“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贡献”，《辽宁中医杂志》1982年第11期，第28页。

③吴润秋：“孙思邈对《伤寒论》的研究和发展”，《河南中医》1984年第2期，第6页。



寒”，《千金要方》两卷是他从“群经”中“博采”自编的，内容包括伤寒及其他外感病、如温病、疫病、黄疸、疟疾等。《千金翼方》两卷是把见到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或为《金匮玉函方》）整理编纂而成。“伤寒”，是以张仲景书为蓝本，受原书限制，孙思邈书中带有前书的模式。如：《千金要方》“伤寒”是“以法类方，以方类证，方证同条”；重视太阳、阳明二经的辨治，强调汗吐下三法攻邪，突出“汗法”的运用。

《千金翼方》“伤寒”编次中，基本保持和发展这一原则：“以太阳为主体，以阳明为关隘”，也重视汗、吐、下法，唯对“桂枝”、“麻黄”、“青龙”三纲鼎立及其它他各法的运用更精。在“忌宜”和“汗吐下后病状”章，《千金翼方》比《千金要方》显然更详细具体。

可见，孙思邈《千金》二方的“伤寒”虽各有特点，但在思路、观点上有一致之处，也可看出《千金翼方》是以《伤寒杂病论》为基础，较之《千金要方》自编“伤寒”不只“六经”体例明确，而且伤寒方证系统、具体，辨证精当。①

6．研究方法唐后典范

孙思邈“三方”之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是强调“三纲鼎立”说的代表者。他说：“予尝深究三者，审于证候，脉息相对，用之无不应手而愈。”明末的方有执、喻昌则更是大倡“三纲鼎立”之说，自成伤寒学派的一家。如喻昌

①郭谦亨：“论孙思邈编纂《伤寒论》的贡献”，《陕西中医函授》1991年第3期，第5页。

《尚论篇》说："鼎兄大纲三法，分治三证……仲景参伍错综，以尽病之变态。其统于桂枝、麻黄、青龙三法，夫复何疑。"在清代，随倡此说者大有人在，且多名家，如张璐、钱潢、黄元御、周扬俊和程应旄等。[①]

孙思邈首创这种"以法方类证，方证同条"的《伤寒论》研究方法，对后世伤寒学派在《伤寒论》的研究、发展中，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唐以后比较著名的伤寒学家中，明、清伤寒学派在《伤寒论》的研究、发展中，喻嘉言影响较深，此外，柯韵伯、徐大椿、钱天来、尤在泾等，尽管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学术思想上，无不直接或间接受来自孙思邈的启示。

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太阳篇》就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等十一类，只不过较孙思邈分类要细而已。清代徐大椿等以方类证、钱璜重视《伤寒论》"八法"的研究、尤在泾从"六经"不同特性，判订不同治法，都有成果，现中医学院《伤寒论》讲义，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更臻完善的。[②]

孙思邈搜集治伤寒的验方，影响后学。从宋朝到现代，经、时方兼收并蓄的医家大有人在，如庞安时、刘完素、陶华、陈尧道等等。他们治伤寒都不限于《伤寒论》方药，被经方派斥为"叛经离道"。这正说明孙思邈治伤寒学的客观态度及其深远影响。徐大椿说："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复。"就是指孙思邈不完全拘泥于

①王永谦："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贡献"，《辽宁中医杂志》1982年第11期，第28页。

①吴润秋："孙思邈对《伤寒论》的研究和发展"，《河南中医》1984年第2期，第6页。



仲景之法而言。徐氏是遵古的清代名医，在其《医学源流论》里说孙思邈“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无不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系择古方，无不兼取后世偏杂之法”。这也恰恰从其反面证明了，孙思邈对古典医学的科学态度，他这种既尊经典而又不受其所拘的学风，正是后世学者学习的典范。[①]

孙思邈对经方的研究，不仅开创了以方剂为中心研究仲景学说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促进作用。正如清代名医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所指：“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处”[②]，他对医药学的贡献，也在于此。

---

①王永谦 ：“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贡献”，《辽宁中医杂志》1982年第11期28页。

②苏礼：“孙思邈对仲景学说研究的贡献”，《陕西中医》1982年第5期，第1页。



六、儒家《周易》的影响和运用

中国古代，最早研究《易》的是文王、武王、周公。第一个整理这部文化典籍的是孔子，《周易》一书，据记载起源于殷周时期，属于儒家的一部著作，《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反映了殷周时期政治、战争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的影响颇大。关于《千金翼方》之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序中对翼方做了解释："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沿斯义述此方名矣。""十翼"即《易传》，"翼"有辅助之意。相传孔子解释《周易》十篇，三国陆绩注《易》、撰《太玄经注》。孙思邈受"十翼"、"玄翼"的启发而定此名。[1]

---

①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4页。

1. 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

孙思邈精于医道，也博通经书，他主张医生学《易》，十分重视《易》对于医药学的作用，这其中的奥妙关系，明代医家张介宾在《类经附翼》一卷“医易”中，作过精辟地论述：“易知，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易》概括和总结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包括医学的最一般规律，《易》对于医理有指导作用“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张介宾所论述的《易》对于医的作用，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周易》中的朴素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对于具体科学（医学）的指导作用。而孙思邈的“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的观点，是对《易》与医关系的高度和精辟的总括。

对于医学，孙思邈认为“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千金翼方·序》中他又解释说：“夫医道之为言，实为意也。”孙思邈的“意”很接近《周易》中的“象”和“易”，而“医道”则接近于“易理”。《周易》与中医等有着类似的对应关系，孙思邈具体地加以运用。对“意”的理解，《千金方》中可以找到佐证。如：“吾门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之于天。”其大意是说，在我们搞医这门行当的人中，对医学理论擅长的人，一定把它用来给人治病；而善于治病的人，也必须依赖这种医学理论。这句话里，“天”字就相当于“天理”、“医学理论”（“医道”）之类，此与“意”相通，“意”即是“天”、“医道”的客体；“天”、“医道”是“意”的反映，与唯物论的



反映论观点相吻合。[①]

孙思邈博览群书，他认为作为大医需读书，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不能认真体运，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达到尽善尽美。孙思邈受八卦启发而妙解“六壬”。《周易》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事物的本源，是观物取象的朴素唯物论观察，又以天地为总纲。孙思邈把天地阴阳相互关系用之于医学，阴阳是总纲，它类似于天地；表里、寒热、虚实是基本纲领，它类似于“六壬”，为临床诊病提供出基本的依据。他以解《易》的形式解医，试图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找出医学上的六种病变基本因素。 孙思邈提出：“人禀天地而生，故有五脏六腑”，“凡五脏，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以此总而成躯”，“流而为荣卫，张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推此及天地，亦如之故”。在对照自然界的危诊时，他解释说：“寒暑不时，天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地之痈疽也”，“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治之灾。”至此不难看出，孙思邈在这些地方可谓是妙解了《周易》中朴素唯物论的观念，亦即妙解了八个基本卦。具体来说，孙思邈认为人与天地山河、日月星辰一样，是客观的存在物，是“常数”，是恒存的，这与东汉时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王充在《论衡·杞义》中相一致，王充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把

---

①张训：“孙思邈：一位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唐代医学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978-979 页。



世界本源视为自然物质体的观点，正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1]

《周易》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变化又可使双方向其对立面转化，根本原因是在其内部，是“阴阳”、“刚柔”和“动静”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立统一具有辩证法思想。孙思邈认为：“人禀天地而生。”即由阴阳两性变化而生，对人生死变化加以朴素唯物论和辩证的解释，与《易·系辞》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孙思邈唯物辩证地看事物，他认为客体是可转化的，他把《周易》中，对立面双方转化观念运用于医学，这是孙思邈对“变在其中”思想的发挥。

2．渊源《周易》的思想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中指出：“凡欲为大医……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焰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提出医生要学《易》的主张。他所说的《易》，大多是指《易传》，而不是《易经》[2]。从《千金方》中，不难看出《千金方》与《周易》的渊源和影响。例如：

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伤寒例第一”：“论日，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此句《易传》原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孙思邈引用这段话作为自己论述“变化之迹无方”的理论根据。

---

①张训：“孙思邈一位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唐代医学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979–980 页。

②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第 4 页。

再如《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药藏第九”：“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此句《易传》原文是“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①]。孙思邈把“大圣之至教”，作为自己论述“可贮药藏，以备不虞”[②]思想的立论根据。

又如《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治病略例第三”：“夫天布五行，以植方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易曰，非天下之至赜……”“天下之至赜”一语，《易传》里是：“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迹而不可恶也……”[③]孙思邈活用转述了《易传》的这一思想，作为自己强调人体脏腑阴阳“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立论根据，并由此得出医生应当下苦工夫钻研医学知识的结论。

除了以《易》作为自己医论的根据和指导思想外，在《千金要方》中，还有些内容是直接以《易经》的卦名来论述医理的，如《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针灸上·用针略例第五”：“凡用针之法，以补泻为先，呼吸应江汉，补泻校升斗。经纬有法则，阴阳不相干，震为阳气始（火生于寅），兑为阴气终（戊为土墓），坎为太玄华（冬至之日夜半一阳爻生），离为太阳精（为中女之象），欲补从卯南（补不足地户至巽为地虚），欲泻从酉北（天门在乾），针入因日明（向寅至午），针出随月光（从申向午，午为日月光之

---

① 《十三经注疏》“易八·系辞下”。
②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药藏第九”。
③ 《十三经注疏》“易七·系辞上”。



位)，如此思五行，气以调荣卫，用以将息之，是日随身宝。”这里的震、兑、坎、离、巽、乾都是卦名。[①]

孙思邈在论述某些医理时，虽无直接引用和转述《易传》原文，却在运用《易传》朴素的辩证思想。如《易传》中提到“象日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其出入以度”，《易传》提出了对立而转化的“度”，孙思邈将此思想运用于分析“养性之术”，针对“十二多”提出“故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②]。这和《易传》所提倡“其出入以度”、“过旬灾也”的思想相一致。

《千金翼方》中，孙思邈对《易传》中辩证法有所发挥，如《千金要方》卷十二“养性·养老食疗第四”：“故日安者非安，能安在于虑亡，乐者非乐，能乐在于虑殃。”就是对《易传》中关于“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思想的发扬。

除此之外，《千金翼方》中，还直接引用《易经》乾卦原文，如卷十三“辟谷·服水第六”：“乾元亨利正九种，吾生日月长吾拜，吾复不饥复不渴，赖得水以自活……”这段话中的“乾元亨利”就是《易传》乾卦开首“乾元亨利贞”句的前四个字。

更妙的是，《千金翼方》的书名，也是由《易传》的启发而命名，这在《千金翼方》序中孙思邈交代的十分清楚：“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沿斯义述此方名矣。”“十翼”即《易传》。相传是孔子解释《周易》的

---

① 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4页。

② 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道林养性第二”。

十篇著作（实际上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作品）。陆绩，三国郁林太守，通天文、历算，作《浑天图》，注《易》，撰《太玄经注》。“陆绩增玄翼之说”是指陆绩注《易》之事。孙思邈就是由“十翼”、“玄翼”的启发而命名《千金翼方》的。[①]

由此可见，《周易》思想对孙思邈的影响十分鲜明。

①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4页。

七、印度佛教和医学的接受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传入中国，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唐朝进入鼎盛阶段。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寺院经济力量雄厚，宗派林立，唐朝较有影响的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各派思想均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体系完整，其中禅宗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佛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也最大，佛医学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唐代中医学处在世界医学前列、有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一套理论系统；印度医学也是相当发达的一种医学，在当时，古印度医学与汉族中医学都是先进的医学。从汉唐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有所往来，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东晋时期僧人法显前往印度各地，还有唐代僧人玄奘前往印度取经等。古印度医学是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学之一，大量佛经包括医学并译成汉文，医学和佛教同时引进到了中国。这些早期的中印文化和贸易交流，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佛学、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僧医治病外，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信佛的医学家接受佛医学的理论，把佛教中四大说、五蕴说、缘起论引入中医理论

中，并试图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虽然不太成功，但在中医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佛教思想在孙思邈思想中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千金方》中佛教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佛教教义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德方面；二是佛教传入所带来的，以印度医学为主的域外医学，诸如四大说、万物是药、万病丸、医方、养生保健等，佛教起到载体的作用；三是医僧在治疗脚气病等方面的成就。佛教对《千金方》的影响远远不及道教。[②]

咒禁是古印度医学中，吠陀医学八支（即八科）中重要的一支，是佛家流派的轨仪之一。魏晋南北朝以来，印度及南亚等地僧人到中国日多，僧人中有善医术者，他们治病多用咒法。咒禁这种形式，在特定情况下有些精神安慰或心理治疗的作用。孙思邈兼收并蓄，把这以唯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列在《千金翼方》最后二卷，为“禁经”，专门论述咒禁治病祛病的方法，有“禁令家和法”、“唾三十六鬼”、“却鬼咒”等梵家咒语。孙思邈也采用咒禁法来治病。如《千金翼方》“却鬼咒法，咒曰：然摩、然摩，波悉谛苏，若摩竭状暗提，若梦若想、若聪明而解，常用此咒法去之”。（卷十三·服水第六）唐代，咒禁在原有的基础上，被唐太医署列为独立的一科。

1．佛教对孙思邈的影响

佛教教义核心是神不灭论，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反对

---

①李成文主编：《中医发展史》，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4 年，第 35 页。

②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第 220 页。



杀生等。研究佛法与信奉佛教者众多，不仅有中国玄装法师去印度取经，在中国也有来自印度、日本的佛徒，翻译佛经多在此时期。佛教的因果轮回、普度众生、修身养性等思想，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孙思邈自幼攻读儒家经典又处在佛教兴盛的时代，佛学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博大精深，义理幽玄，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虽然，孙思邈读佛教典籍远不如道家典籍多，但他研究佛学，毫无奇怪[①]。佛教的行善治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思想，贯串在孙思邈医学思想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佛家的各种清规戒律，也是孙思邈的行动指南。大乘佛教主张兼修布施、守戒、忍辱、精进、坐禅、智慧“六度”；“五戒十善”教义不仅求得自我解脱，而且还要“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誓言以及献身精神，对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影响很大，他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专门论述医德，开宗明义地要求医者“必须有救人的心愿”，“凡人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在《翼方·本草下·虫鱼部》有：“鸟兽虫鱼之类皆是生命，是以须药者，皆须访觅先死者，或市中求之。必不可得，自杀生以救己命。若杀之者，非立方之意也，慎之慎之”。

---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80 页。

从中可见，孙思邈所定医者做“大医”的标准和“普度众生”的医学思想，只有用佛家观点解释才能更合乎逻辑。

2．与道宣“林下之交”

据史料记载，孙思邈唯一的方外之交，就是唐代高僧道宣，他们是忘年之友，两人年龄差距55岁，友情深厚。据《酉阳杂俎》：“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宋高僧传》卷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谓：“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宋高僧传·道宣传》（《大藏经》传记部，清末频伽精舍校刊本）记载，两人过从甚密。“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据《中国人名大辞典》[①]：“道宣，唐高僧，丹徒钱氏子。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居京师西明寺。与处士孙思邈结交。持律坚定，号为南山律。乾封间圆寂。”再据《佛学大辞典》[②]：“十六岁落发，隋大业中，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唐武德中，充西明寺上座。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寂，寿七十二。”

孙思邈隐居终南山，而佛教南山宗创始人道宣，恰好在终南山洋峪口南净业寺宣教。他们“互参宗旨”（《酉阳杂俎》），两人在终南山相识为友，结为“林下之交”，达到“议论终夕”的境界，史书更以“林下之交”来形容，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

---

①陆尔奎等23人编著，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
②《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纂，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到了娴雅、旷逸与超脱的最高境界[1]。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就是崇拜佛教的，而小的个人原因又是孙思邈喜好佛典并愿交结名僧，如此说来，受印度佛学和医学影响就是很正常和自然的。

道宣（596—667），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15岁受业，16岁落发。为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他比孙思邈小55岁。隋·大业八年（612）孙思邈71岁时，结识了道宣和尚。那一年，道宣16岁，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初居于终南山白泉寺，此时，孙思邈正隐居终南山，因而相识结友。《酉阳杂俎》记载："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乞和尚法力加持。宣公辞曰，贫道持牛冲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从道宣夜荐孙思邈可见他们是非常了解和熟知的。

道宣先于孙思邈被召进京，一度主持长安西明寺。玄奘法师从天竺归来后，奉旨参加玄奘译场（专门翻译玄类常用的佛经机构），参与玄奘法师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负责润文部分。

孙思邈在贞观元年（627）进京，居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旧宅，这样一来，两人又在京师相聚，自然，佛学与医学是他们时常研讨的问题，道宣佛学与医学皆精通，孙思邈从高僧道宣律师处接受佛教思想与佛教医学理论。两人一为高僧一为大医，佛学医学相互切磋，无疑，道宣高僧对孙思邈的佛教影响最大。

贞观十六年（642）道宣又回终南山丰德寺，因道宣常住终南山研究、弘传戒律，世称南山律师。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唐·

---

①李经纬："孙思邈生平事迹研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



乾封二年（667）孙思邈126岁时，挚友道宣律师圆寂。鉴真和尚[①]是他一脉嫡传的弟子。传承关系是道宣的弟子文纲[②]——文纲的弟子道岸[③]——道岸的弟子鉴真，鉴真传承了道宣的禅理真谛。

3．《千金方》中的佛学思想

对于孙思邈两部《千金方》中的佛学思想，干祖望教授对《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有精辟分析。在此转引：《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精勤不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就是这个精神。也正是为了这个积极因素的鼓励，孙思邈更奋发图强的学习、读书、行医、著书立说来拯救与普救众生含灵之苦。

"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考"慈悲"为佛教常用术语，意思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喜舍"也是佛家术语，指用钱财或自己身上的活组织来救济他人的灾难，称"喜舍"，又称"净舍"、"净施"。其中"慈悲"一言，人尽皆知，而"喜舍"一词，鲜为人知，今孙思邈信手拿来，可知孙思邈对佛教的研究，已不是一般性的泛泛涉猎而已。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佛学认为凡人做事，必须专心

---

①鉴真（688—763），杨州人，俗姓淳于。14岁出家，天宝元年应日本邀请，东渡至日本，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台，传授戒法，日本律宗始祖，卒于日本。

②文纲（636—727），俗姓孔，会稽（浙江绍兴市）人。12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25岁开始讲经，30 岁登台。弟子有道岸等 50 余人。

③道岸（654—717），俗姓唐，祖籍颍川（河南省许昌市）人。少年好学，后即出家，拜文纲为师，坚修律义，深入禅慧，时称"大和尚"。



注一境而不散乱其神，然后可以取得准确的认识并作出准确的判断。“安”字，在佛学上的定义是“谓心，期待于某一点而安住于此，确乎不动也”。“定”字，为“定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所以他经常和“禅”联在一起而称为“禅定”。孙思邈的“安神定志”，即佛家的“心一境性”。

“不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的思想。古天竺把人民分为四级，称四姓。所以佛教就提出“四姓平等”的口号。孙思邈的“普同一等”十分符合于“四姓平等”的思想。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畜贱人贵……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考佛教有“五戒”、“八戒”、“十戒”，其中第一戒，就是戒杀生。

“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因果学说，也是佛教中主要理论之一。《观无量寿经》：“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佛门认为“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是为果而预设，果是由因而产生。这种报应，是无法逃避的。孙思邈医著中多处强调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这节文章对因果学说再加肯定。

“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里孙思邈又将佛教的善恶观用以释医患养性之理论，也足以证明佛学对孙思邈疾病预后观之深刻影响。如果仔细玩味推敲两部《千金方》的遣词用语，富有佛学思想者更为多见。例如：佛教之十戒，一戒杀生，孙思邈强调：“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四戒妄语，孙思邈严厉批判同行“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五戒饮酒，孙思邈更是多处告戒醉酒“醽醁兼陈，看有若无”；六戒涂香饰鬘，孙思邈反对



进入富室病患之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七戒不视听歌舞，孙思邈强调好的医生“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九戒非时食，孙思邈引申为“珍羞迭荐，食如无味”；十戒不得捉钱金银财物，孙思邈强调医生“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如：佛学有五根、六根之说，五根指眼、耳、鼻、舌、身，六根为五根再加意，所谓根者为罪孽之根源，即六种孽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之序例中强调了“六根不具足人”的佛学思想。孙思邈的六根即直接来自佛学思想意念，不具足就是不完全，意指眼、耳、鼻、舌及四肢七窍与精神思维上有缺陷之人。又如：《千金翼方》的养性篇论及正禅方，指出服用“正禅方”药，“十日觉远智通，初地禅，服二十日到二禅定，百日得三禅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坏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按佛教有三界诸天之说，三界即指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诸天又分为四禅，初禅为大梵天之类，二禅为光音天之类，三禅为遍净天之类，四禅为色窨天之类。考佛学“一心考物为禅，一境静念为定”，故也称之为四禅四定。孙思邈引用春桑耳、夏桑子、秋桑叶组成之正禅方时，论及服用效果时作了如此之叙述，给予桑耳、桑子、桑叶功效以神奇之夸张，与佛教经典修行目的以紧密联系，意欲说明服桑可使人心境归真返璞，必无邪念。这一论述也可看出孙思邈试将佛教思想与中医学对桑之传统认识紧密结合的意图。又如：

《千金翼方·退居·择地》：“……便可构居，若有人功，可至二十亩。更不得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在字面上看，似乎除了“烦”字之外，未感有佛教气息，但孙思邈此段论述其思想根源在实质上完全是佛门语。因为，佛家最忌



“惑”、“业”，惑中之“贪”，更为严重。孙思邈极力主张不贪不惑。如果对身外物一加关心，已经开始不知不觉中坠入惑壑贪欲谷而不能自拔。因为“心境前境，目为之惑”，如无身外之物，心当然不为之迷了。孙思邈这节文章，实实在在包涵着佛教经典《妙华经》“诸苦所困，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的真谛。《备急千金要方·养性》：“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修行”两字，原本指世间人专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意思。最早见《庄子·大宗师》的“修行无有，而外者形骸”。在此之后，儒家也用，如《淮南子·诠言》“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然而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此即称出家当和尚或比丘为修行了，《晋书·鸠摩罗什传》“为性率达，不拘小节，修行者颇共疑之”可证。但实际上两种用意均为做好事不做坏事之说。此外另有一说，即佛门认为从因到果的功德，有“五转”，其“发心”为第一转，第二转即为“修行”。更能说明孙思邈所叙述之“不修一行”与佛学之关系紧密。

李经纬研究员就“以香沾之”也作过如下说明：《千金翼方·退居》的“若知进不知退，知得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于外。其于过份内热（热中之热）之损，胡可胜言。况手身灭覆宗之祸……以香沾之，身数沐浴，务令洁净，则神安道胜也……自然事闲，无物相恼”，就是体现了“一戒、二定、三慧”几个解脱一切束缚来获得涅□的精神思想。“香”可以通过一继缭绕、碧篆青烟，把人的灵性通达到佛的面前，使佛与人灵犀相通，一如使者一样。从这里的焚香以及把前后文章连贯起来细咀，更证实孙思邈与佛学的紧密联系。



4. 对印度医药学的吸收

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同时，古代印度的医药知识也传入中国，它是以“医方明”的形式引进的。医方明是佛教“五明”之一，它主要是吸收古代印度医药（如阿输吠陀）内容而成的。古印度吠陀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由四种元素合成，即所谓“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认为人体有 101 种病，“四大”各有 101 种，则全身有 404 种病。孙思邈《千金方》中对四大学说、万物是药思想、方剂和药物、养生保健等内容都进行了吸收和借鉴。

（1）汇通吠陀医学理论

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就引用了许多印度医学的理论。如印度医学的“四大不调”学说，即地、水、风、火四种原质的不调，曰“地大增，令身沉重；水大积，涕唾乖常；火大盛，头胸壮热；风大动，气息激冲。四大不调，各有一百一，含四百四病”，“四大说”是古代印度医学有关生理病理的一种理论。《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诊候第四》引述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又云：“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千金翼方》卷二十一“耆婆治恶病”载：“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黄、青、白、赤、黑风‘五风’

……其风合五藏，故曰五风。”孙思邈试图在医学理论方面，把印医“四大不调”学说与汉医的五脏、五行学说进行结合，这种尝试在医学史上是首次，显得十分勉强。但这种尝试，实属难能可贵，“堪称我国中外医学汇通之嚆矢”。

（2）接受万物皆药思想

孙思邈十分赞赏佛教《大集经》中，古代印度医圣耆婆的“天下所有，无非是药”名言，耆婆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必须懂得“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一“药名”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耳。”孙思邈接受万物是药的思想，在《翼方·药录纂要》中指出：“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亦犹咎繇创律……且令后学，因事典法，触类长之无穷竭，则神农之意，从可知矣。所以述录药品名，欲令学徒，知无一物之非药耳。”这种“万物皆药”的药物学理论，指导孙思邈的临证实践，他的《千金方》吸收大量民间和外来药物，“所载药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多有680种，丰富和扩大了药物的品种”①。并且，也影响了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卷三十八《服器部》中，就提出天下无一物不可以为药的思想和观点。他说：“敝惟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这也是《本草纲目》内容十分丰富的一个客观因素。②

---

①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第220页。

②蔡景峰：“孙思邈与各国和各族医学交流”，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1页。



(3) 收取古天竺耆婆方

伴随佛教传入的域外药方，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对外来医学吸收得最多的，还要算是方剂和药物。有记载的古印度名医，“耆婆”方就达十余首。如耆婆汤、耆婆丸、耆婆治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等，还记载了耆婆治恶病方，有：阿魏雷丸散方、甘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酒法、浸汤方、矾石酿酒方、盐曲方、补酒方、内酿法方等，另外，还收集了阿伽陀园（也是天竺用药）“阿伽陀丸”、“服菖蒲方”、“耆婆汤”等[①]。孙思邈对它们的主治和临床使用等进行了论述，并将它们完全中医术语化，这些外来方剂的共同特点，是所用药物大多外地所产，这种把古印度药物与中药相结合，共同适用于方剂之中治疗疾病，使外来药物中医药化的尝试，丰富了中国方剂学内容，也为民国时期中西医学汇通派中坚人物张锡纯所借鉴。[②]

外来方剂的组成原则与汉中医固有的理法方药大多不同，所以孙思邈评论说：“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虽然如此，用于救急，则“其验特异”。因中医理论难以解释，故孙思邈以为“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亦犹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在《备急千金要方》卷12中，孙思邈为一方治多病的“通治”方、

①蔡景峰：“孙思邈与各国和各族医学交流”，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9页。

②李正安：“中印医学汇通之尝试者——孙思邈”，《中医药信息》1990年第2期，第13页。

“万病”药方，专辟“万病丸散”一节，共载13方。其中“耆婆万病丸”很有代表性，竟能“治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疰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痛痹……”①

另一主治万病的芫花散，据载也出自释门。隋初，李孝隆得定州山僧惠通道人的秘传。而孙思邈则从静智道人处获得，“治一切风冷痰饮癥癖疟，万医所不治者，皆治之”，“用之大有效验”。由上可以推知，这类万病丸散极可能传自印度等域外国家和地区，为我国中医方剂学增添了一个品类。②

（4）推崇按摩术揩齿法

孙思邈重视印度医学中保健的技术和疗法。推崇古印度的“天竺国按摩术”、“杨枝揩齿法”。“天竺国按摩术”是一套以动功为主的健身方法，据说为古代印度宗教之一的“婆罗门法”。其效用有“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捷，不复疲乏”。《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记载了“天竺国按摩婆罗门法”的“十八势”，如洗手法、拓石法、开胸、抽筋、虎视等法，明确指出这是天竺国的婆罗门养生术，也就是瑜珈术的一个内容；坐禅养生法，须兼服正禅方，长期锻炼，“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壤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翼方·养性·服饵》），这些都是古印度瑜珈术的内容。③

---

①②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第220页。

③蔡景峰：“孙思邈与各国和各族医学交流”，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2006年，第1919–1920页。



杨枝揩齿是古印度清洁口腔、保健牙齿的一种常用方法，在佛僧中十分流行，东汉译入的佛经中就有记载。孙思邈《千金翼方》中载有“口嚼杨枝，去口中秽气”。《备急千金要方》则把佛教揩齿与道教叩齿并提：“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口齿即牢密。”可见，这是一种口腔卫生法[①]。另外，《千金方》还记载了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服菖蒲方、“芪婆汤”、“芪婆酒”养生等。

孙思邈在中印医学汇通中，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和方剂的实用价值，难能可贵，对当今的中西医临床结合起到启示和借鉴作用。

孙思邈所受佛教影响，应该说主要在佛教教义对《千金方》医德和印度医学方面。《千金方》中，若无印度医学的输入，那么佛学是寥寥无几，引自最少的。《千金方》吸收印度医学，而印度医学是建筑在佛学上，如同中国医学是建筑在道教上一样。佛教对孙思邈思想的影响远不及道教，孙思邈对佛学的造诣也远不如道学。可以说孙思邈的思想，还是以道教为主体。

---

①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第 220 页。



八、中国道教及医术的吸收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家由春秋时期老子所创，主要人物还有庄子等；战国中期的稷下学派创立精气学说，使道家学说进一步成熟。道教把老子说的“道”看做是“神异之物”，突出了“道”的超越性、绝对性、神秘性；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思想的离俗超脱精神，形成出世的心性炼养理论[①]。道家的主要思想有恬淡虚无，无为而治；崇尚静柔，柔弱胜强；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对中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庄崇尚静柔的思想，成为中医学以柔顺养阴为主旨的养阴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首（九家之学，即道、儒、阴阳、法、名、墨、纵横家、杂家、农家）[②]。道教创建于东汉，印度佛教传入而促进了道教宗教形式的正式确立。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认为，道教渊源于原始宗教和巫术、春秋战国的“方术”、黄老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后者又是道教内外丹学的重要理论根据[③]。道

①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 2006 年，第 47 页。

②孙广仁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第 132–134 页。

③李成文主编：《中医发展史》，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4 年，第 20 页。



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李经纬考道教五大派：经典派形成最早，鼻祖为老子、庄子，研究经籍典奥，深求哲学玄理。其特点为参研经义哲理，考究典籍奥秘，以穷研道学玄理为目的，驰骋于文坛、哲学领域的道家学说就是这一派，可以说是真正的有水平的道教中一枝独秀的正宗队伍，至于老子也是一个与孔子一样的大学者，被东汉张道陵奉为道教祖师，尊为“太上道德真君”之后，化为一道士。符箓派始祖张道陵，为最早与经典派分庭抗礼分门立户的一个支流，事实上也是借道教的招牌而吸收了古代巫术演化而来，是植符咒箓，禁咒祝由，斋醮祈禳，用以遣神役鬼，驱邪治病。丹鼎派代表人物为葛玄、葛洪，修炼内功，烧炼外丹，特点是习静服气，修性摄生，烧炼丹石，以超凡入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长生不老为目的，是医学药学界能接受，现在全世界奉为化学的开拓者。占验派代表人物为李淳风、袁天呈，行卜筮、星相、阴阳、五行、术数、堪舆、风鉴等，特点是推究五行术数，占卜起卦，星相谶纬，用以预占祸福休咎来趋吉避凶。积善派代表人物为吕洞宾、汉钟离，积善行修桥铺路，积功累德以安民利人，自己也藉此以成仙。

“道”始于老子，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它是标示宇宙本原(或本体)及其过程、规律的哲学范畴。老子认为“道”有三个主要特点：“道”无形无象；“道”无始无终；“道”不可被感知。老子的“道”，有着多种涵义：1.“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的“道”是属于形而上的本体论方面的内容。2.“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的“道”是属于形而上的生成论方面的内容。3. “道”是规范万物的规律、法则，如“道法自然”、“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道”的涵义应属于自然论的内容。

“道教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神仙以济世度人为宗旨。故道教徒既信道德，又拜神仙。”①

唐王朝建立，隋·王通提出的儒、释、道三教归一思想没能得到很好发展，唐高祖于625年亲自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唐太宗即位后仍按道、儒、佛的次序，武则天掌政后才尊佛抑道，改变了儒、佛、道的地位。

1. 道教对孙思邈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诸家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其倡导的“道法自然”、重无轻有、崇阴等思想，对中医学的养生理论和藏象理论的建立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道藏》收录的医药书籍，占《道藏》内容的70%以上②。珍视生命、重人贵生，是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这同中医救死扶伤、

---

①孙广仁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②孙广仁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养生长寿的目标相一致，在儒、释、道诸家中，道家思想对中医学影响最深。

孙思邈的思想是以道教为主体的，其医学思想也是由道教作主导。《要方·序》："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画八卦，立庖厨。"斗极即道教视为星宿中至尊的北斗。《云笈七签》谓："丹元星天之斗君，主命禄籍，上法九天谱□，中统鬼神部目，下领荣真兆民命藉。"《太清玉册》[①]更谓："拜礼北斗七星君，奉为消灾解厄，保命延生也。"至于八卦，更是道教的主要符号，孙思邈用斗极与八卦来作全书的楔引缘起，绝非偶然。说得明白一点，全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在这斗极与八卦学说中展示出来的。[②]

孙思邈《千金方》的序言中："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稽炎农于记篆，资太一而反营魂"，"高密问紫文之术"，"伯阳流玉册之径"，"乃大道之真"，"采葛生之玉函"，"两仪之大德"，"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而存，德合则生成，是生日德曰立，既知生不再于我，人处物为灵"，"矧夫易道深矣"等等，无不说明孙思邈对道家、道教学问之研析运用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其思想已是深深萦系乎道教之思维。[③]

"道法自然"思想。道家不同于儒家重视社会伦理，道家更重

---

①《大清玉册》8卷，全称《天皇至道大清玉册》。记述道门仪制、文物、衣冠、礼乐等事。作者无考。

②千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③李经纬："孙思邈生平事迹研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视对自然的研究，提出“道法自然”，说道是一种“惟恍惟惚”、“湛兮似或存”的东西。孙思邈《翼方·退居》谓：“还须畜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和孙思邈治病要“深究萌芽”的主张有联系。庄子的“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是孙思邈的一条治疗原则。庄子的“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孙思邈也运用在养生中，他认为善养生者不能过度喜哀，否则会损年寿。[①]

无为论，是道家的基本理论之一。“无为”作为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与工具，作为人生追求目标，是道家的最高人生价值理想。老子提出“清静”、“寡欲”、“不争”、“抱朴”等条件。孙思邈《翼方·退居》中，针对“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的生活态度，孙思邈赞同“为无为”的主张。但在医学研究方面，他年过百岁仍“研综经方”，他在《要方·平脉》中称赞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还要求医生“屏弃俗情，凝心于此”。由此看来，孙思邈灵活实践了老庄思想。

炼制丹药。道家历来十分重视修身养性以求健康长寿，不老神仙，为此曾发展创造多种养生术，对中医养生学深有影响。如炼丹技术，炼丹目的是“以期遐年”，历代炼丹之学者，几乎都是道家方士。

孙思邈重视老庄之学，吸收道教思想，炼丹并行医长达40余年，宏扬道教养生养性与医学学理。《诸家神品丹法》记载，

---

①张文、段凤仙、韩中平、朱自贤：“孙思邈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医学成就”，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77页。

孙思邈总结前人经验，于实践中对木炭、硫、硝三种物质性能有了新认识，和采取“伏火”控制反映速度，防止爆炸的措施。

《全唐诗》有孙思邈仅存的四言诗，是一首炼制丹药的诗，孙思邈并用诗歌形式，高度概括了物质运动变化的全过程，形象而生动地论述了炼丹的全部工序，物质运动变化的整个内容。四言诗炼丹诗不是道家迷信的诗作，炼丹术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道家方士从事迷信活动。“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炼丹术，都是和有机化学的起源、合成化学药物的开始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包含着运动变化，分解合成的过程。”[①]他撰著炼丹术著作有《丹经要诀》、《龙虎论》、《烧炼秘诀》等。

著注道教著作的有：疏注《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而且后人对他作品评价很高。撰有《枕中素书》、《龙虎论》、《龟上五兆动摇经诀》、《福寿镜》、《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等10多部道教书。伪作也有但近乎全佚，据干祖望查考以下几种：

《千金丹令》三卷。《宋志》、《齐人月令》三卷；《通志·艺文略》作《千金养生论》。

《三教论》一卷。明·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序》；《旧唐书》作《会三教论》。

《太清真人炼云母诀》二卷。《新唐书·艺文志》。

《枕中书》又名《枕中素书》一卷。

《马阴内传》一卷。《千金要方》，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

①邓剑：“药王孙思邈的哲学思想”，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88页。

本乔序。

《马阴两君内传》一卷。疑即《马阴内传》。以原书告佚，无法查阅。

《幽传福寿论》一卷。《宋史·艺文略》作《九幽福寿论》。

《福寿论》三卷。疑即《幽传福寿论》。

《气诀》一卷。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炼云母诀》二卷。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烧炼秘诀》一卷。《新唐书·艺文志》。

《龙虎论》一卷。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龙虎乱日论》一卷。《新唐书·艺文志》。

《龙虎通元诀》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龙虎"三书是否一书三名难考。

《龟上五兆动摇经诀》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

《龟经》一卷。疑即《龟上五兆动摇经诀》。

《摄养录》二卷。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老子疏注》即《道德真经》。

《庄子疏注》即《南华真经》。

上列19种，也已散佚殆尽，无法准确考核。

2. "医道同源"的体现

英国研究中国文明史、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博士也曾说过



“中国如果没有道教，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①。中医理论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诸家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江幼李认为“道是中医学术之根柢……道家思想是构建中医理论的基石”②。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倡导“道法自然”、重无轻有、崇阴等思想，对中医学的养生理论和藏象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道教的组成部分看，道教吸收和融合了古代民间巫术、儒家和墨家的一些思想以及神仙方术、阴阳五行等等，道教是“杂而多端”，兼收并蓄。道教与古医道渊源深远。

“以医传教”、“借医弘道”是道教的基本创教模式。东汉道教创立之际，社会动乱，战火连绵，灾害频仍，疫病流行，民缺医药，道教从其教义和信仰出发，把医术作为传道济世的工具，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过”等作法，解救危难并以此为传教的手段。符、咒治病源于古代巫医不分时期，虽然战国时期出现职业医生，但是，医学从巫术中脱离出来而自立，还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相当一部分巫还在很长时间内承担着医者的职能。

“从现代医学心理的角度来看，符、咒治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缓解患者潜在的心理困扰，满足其某种心理需要，达到暂时宁其心志的作用，但无实际上的医疗意义。所以，在另一方面，道士并不排斥真正的医药及技术，并且吸收它们。许多道士都是符、

---

①孙广仁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第 132 页。
②江幼李：《道家文化与中医学》，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



咒与医道兼修，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手段。”①

医之与道，互相渗透，道中有医，医中有道。“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习道者大凡兼能明医”，另据有关统计，六朝时期的道医占当时全部医生总数的28.7%。故自古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医道同源”之说，充分反映了道家“尚医”的历史传统②。在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兼修道教和医学者，有“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东晋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葛洪；东晋奉道精通医术陈郡殷氏世家；南朝奉道精通医术会稽孔氏世家；齐梁奉道世家的医药学家陶弘景；孙思邈在《中医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也被称为著名道士、大医学家。③

道教医学家们继承《黄帝内经》关于“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孙思邈更将预防思想贯彻在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他告诫世人，平素居家“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善，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

道教医药学家们都博医通药，这既避免了“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弊病，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历代道教医药家还注意金石药的应用。无论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是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都有不少的记载。

---

①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②孙广仁主编：《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③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道教医学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传染病、急症诸多方面，颇有建树，留下许多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和可供进一步研究提高的资料。道教哲学对中医学产生重大影响，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在哲学上表现出《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此后中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深受道家学术思想的浸染。”①

关于“医道同源”，史有论争，见仁见智，各据理由，至今尚无定论。下文作者多借鉴、引用干祖望教授的观点：“清·李时品《医道还元》中，肯定同源。《素问》定是两者并存。若按同源和并存来看，后世道家、医家，皆把黄帝奉为始祖，都说得过去。道教称黄（帝）老（子）。医家称医术为岐（伯）黄（帝）术。岐黄的医家，说黄帝是医家之祖。黄老的道家，说黄帝是道家之祖。两家都从不同角度吸收、充实自己的学说。”

孙思邈著作带有很深的道教成分，他把道教思想溶解于医学中，在医学文献中是罕见的。唯道家的医书《医道还元》和医家的道书《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可以相伯仲。②

3．《千金方》中的道教思想

对于孙思邈两部《千金方》中的道教思想，李经纬曾作有研究，在此多有借鉴引用。

①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②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任真"的意思是自然的生长与发育。"体运"则是体察领悟宇宙间一切命运之规律。孙思邈更明白地提出：如果欲其身体自然生长、生存、发育，思维洞悉一切，只有依靠庄老学理，也就是孙思邈包括医学在内的一切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的总纲领。

"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于此，乃得为大医。"阴阳禄命，是星相家所指"食禄盛衰兴废，命运富贵贫贱"。相法，是观察人的形貌或面部、手掌，可以预言未来命运；相面者，以面部分为"命"、"田宅"、"福德"等十二个宫；相手者，在掌中分为"景"、"开"、"杜"、"休"等八个区域，然后根据《相书》来判断福禄枯荣。所谓诸家者，因其中还有麻衣、青城、青羊等诸多派别。灼龟是占人焚龟壳来代蓍草。五兆，为古代另一种占卜方法，其方法是"折竹长寸余者三，以手弹子儿，以占吉凶"。周易中八卦的阳爻（—）阴爻(--)凑成六个以占卜。六壬，利用每甲子中有六个"壬"来占卜。这样可以看出孙思邈将道教中经典一派思想与技术吸收到了医学中之外，还旁及占验派一知半识也为医学服务。

"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这篇谈论为医之本的文章，已有道教思想占领一半，也就是说医学的基础，就是依靠道家与医学组合而成。

如再读《要方·大医精诚》中"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一言，更证明孙思邈对道学与医学的并重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强调："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



省疾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刺针药，无得参差。”本文前五句，是道教修养法之一的“坐忘”。能使人遗形忘我，内外清澄，即《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而去，同于大通”。《天隐子》也谓：“何谓坐忘，曰，遗形忘我。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凡人通过坐忘，“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引郭象注《庄子》的“坐忘”原文)。之后可以获得后六句提高医疗质量的结果。

“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共为攻击，变为疾病”创立了道家对人身机体的生理、病理学说。

《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而与魂魄飞扬。”是就其个人身精气而言。那么既称“飞扬”，只有道家所谓的三魂七魄才能这样。属于三魂的爽灵、胎元、幽精，属于七魄的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陈藏、臭肺，它是道教想象中人的精神离开形体的存在。所以在精神状态极度失常时，就能导致魂魄飞扬。

在养生、养性方面，几乎处处可见孙思邈思想源于道家思想的迹象。

《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守内，病安从来。”这是道家“导一”、“守寸”、“守默”的全部思想，“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澹之味，能纵欲快意，得虚无之守”。考无为是道教思想中最高境界之一，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倾，是“有”与“无”的统一，但更以“无”为基本。故而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孙思邈首先谈到恬澹，完全是《庄子·刻意》“夫恬澹寂漠，虚无无为，此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思想。这里的纵欲，并非常谈的对人心身有害的纵欲，乃是解释思想尽情思考之意。这种深奥的思想，太史公司马



迁替我们总结出几句词简意赅的话："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精辟地阐明了这个精神。

"然后真一存焉，三一守焉"，道家指保持本性，自然无为称为真一。至于"三一"，有多种解释：一为天一、地一、太一三位神名；二为《道德真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简称；三为太一、真一与玄一的简称；四为精、气、神三者合一的总称；五为道教修炼方法之一，守虚无空者为大乘，守炼形为中乘，守气含和为小乘。

《备急千金要方·养性·道林养性》："胎息守五脏。"胎息，为道家修炼方法之一。方法是用最最微弱的呼吸来把极小量的空气吸入及呼出。动作过程中必需鼻中没有声音，胸前无起伏。《抱朴子·释滞》的"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道家以服气作为修炼养生手段，胎息守五脏，意思是进行胎息，可以把五脏真气牢牢守住。从该节之题为"道林养性"可见，孙思邈已清清楚楚明示其养生养性源于道家的密切关系。

《千金翼方·养性·养性禁忌》"淡然无为，神气自满"，说的是每个人能做到清静、寂寞、恬淡、虚无，不忧精神不会丰满充沛。也就是《庄子·天道》的"夫虚净恬淡，寂寞无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矣"。

《千金翼方·养性·眼饵》："学道断谷。"断谷即辟谷，为道家修炼成仙的手段。《退居·养性》"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易为《易经》，老为《道德真经》，庄子为《南华经》，三者都是道教重要经典著作。学海搜珊富、文林味蔗甜的孙思邈，在解闷消遣之际的手头书籍，旁的不取，独阅道家，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出他对道教的感情与真

诚了。

关于炼丹与符箓：首先关于炼制丹药与服食、解丹毒，两部《千金方》中有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笔墨，如《翼方·飞炼》等等。所以孙思邈对炼丹一门技术钻研极深，是继葛玄、葛洪、陶弘景之后的又一位精于此道并有名于世的炼丹家。

《要方·养性·养性序》中的“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啄齿二七遍”。《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常以鼻引气，口吐气，小微吐之，不得开口，复欲得出气少、人气多”等等，都是内丹修炼入门基本动作。有关符箓这一道家特色之唯心方法，在孙思邈医学著作中也有一些反映，这也充分说明孙思邈思想源于道教难以摆脱的时代局限特点。

除以上所录可见《千金方》的道教思想外，从《千金方》全书中引用先哲名言上看，其侧重也是道教，据干祖望的统计：儒家只孔子一人；医家十一人，扁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陈延之、卫讯、徐嗣伯、徐之才、陈廪丘、甄权、张笛。

而引用道家人数最多是十四人：

老子：《翼方·养性·养性禁忌》“老子曰”；

庄子：《要方·序例·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

列子：《翼方·养性·养性禁忌》“列子曰”；

天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天老曰”；

淮南子：《翼方·养性·养老大例》“淮南子曰”；

彭祖：《要方·养性·房中补益》“彭祖曰”；

高阳负：《要方·肾脏·补肾论》“高阳负曰……”；

嵇康：《要方·养性·养性序》“嵇康曰……”；
张湛：《要方·序例·大医精诚》“张湛曰……”；
张天师：《翼方·禁经·掌诀》“张天师曰……”；
仲长统：《要方·养性·养性序》“仲长统曰……”；
皇甫隆：《要方·养性·养性序》“隆上疏对曰……”；
张季伯：《要方·伤寒下·溪毒证》“张季伯书之……”；
王良：《要方·伤寒下·溪毒证》的“王良……书之”。
引用亦医亦道者有五人：
黄帝：《要方·膀胱腑·膀光腑脉论》的“黄帝曰……”；
岐伯《要方·诸风·论杂风状》的“岐伯曰……”；
伯高：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伯高曰……”；
雷公：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雷公曰……”；
葛洪：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抱朴子曰……”。①

4. 对道教各派之吸收

(1) 崇尚老子百家经典

经典派，是以信奉某一符箓为特征。晋代三皇派（传三皇经）、灵宝派（传灵宝组经典）、上清派，都是经典派。南朝陆修静总括三洞经典，将三种道派统称为经典派。唐代经典派道教盛兴一时。

孙思邈二十岁时，就崇尚老子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庄老经书指导他的思想方法和行医。《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任真”的意思是听其自然生长与发展。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44–246 页。



“体运”则是体察领悟宇宙间一切命运之规律。“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于此，乃得为大医。”阴阳禄命，是星相家指“食禄盛衰兴废，命运富贵贫贱”。这里，他把经典派思想与技术及占验派的技术兼收入医学。

“至于五行休旺，七暇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医之根本道教思想占有一半，也就是说医学的基础，是依靠道家与医学组合而成。再如《要方·大医精诚》“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一言，更证明了他道学与医学并重的思想。

“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竞逐荣势，企踵权豪……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其思想就是道家核心的“无为”与“知足寡欲”两条要旨。

《要方·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也是道家炼法之一，即“收摄精神，使之凝聚”，“宁可不服其药，以任天真”。《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又是道家“听任自然”的修炼方法之一。又“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共为攻击，变为疾病”一节，创立了道家对人身肌体的生理、病理学说。“及与德合，并本命……”，典出《庄子·德充符》的“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孙思邈《千金要方》目次排列第一、二篇为“妇人”、“少小婴孺”，是受《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易称积小以成大”（《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的思想而定。

《要方·脾脏·脾脏脉论》：“土有一子，名之曰金。环挟抱之，不离其身。金乃畏火，恐热来薰，遂弃其母，逃于水中。水为金子，而藏火神，闭门塞户，内外不通。”为方士炼外丹的秘诀术



语，出于《周易·参同契》。

《要方·养性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守内，病安从来”。这是道家“导一”、“守寸”、“守默”的全部思想。“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味，能纵欲快意，得虚无之守”。无为是道教思想中最高境界之一，故《淮南子·精神》总结一句话“虚无者，道之所居也”。孙思邈首先谈到恬淡，完全是《庄子·刻意》“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思想。纵欲，是解释思想尽情思考之意。太史公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精辟地阐明了这个精神。

“然后真一存焉，三一守焉”。道家指保持本性，自然无为称为真一。《鬼谷子·本经·阴符》[1]：“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三一”为道教修炼方法之一，守虚无空者为大乘，守炼形为中乘，守气含和为小乘。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胎息守五脏。”胎息，道家修炼方法之一。《抱朴子·释滞》的“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胎息守五脏，意思是进行胎息，可以把五脏真气牢牢守住。

《翼方·序文》，最能突出道教思想。起首二句“原夫神医秘术，至箓参于道枢”，道枢是《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的道枢，所以作为道教学说的轴心来解释，是无可非议的。孙思邈把道教学说作为医术的基础是十分明确的。

①鬼谷子，战国时楚人，传说为苏秦、张仪之师。籍贯姓名不详，因其所居鬼谷，即称鬼谷子。著有《鬼谷子》3卷，21篇。

“知关南玄牝，驻历之效已深”，玄牝为道家衍生万物的本源，典出《老子》的“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意思是“道”像微妙的母亲一样，孕育和生化宇宙的一切。《南齐书·顾欢传·正一论》① 作过如此的解释：“空玄绝于有景，神化瞻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为实相，在道曰玄牝。”

“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天机指造化的奥秘，道家认为在宇宙间有一种天然的机神，一般人所难以知道的，称为“天机”。《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道家斗宿学说中，有天机星。

“稽炎农于纪箓，资太一而反营魂”，“箓”字写有竹头而不写“录”，是道教手法。“箓”是道家对上至天书策命、下至道学著作的专用名词。太一，道家认为就是大道，《庄子·天地》：“主之以大一。”营魂，道家在医学方面的专用词。营是容纳或接受别人来寄宿的意思。肝藏魂，故肝有营魂的功能。《老子》认为“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此营魂泛指五脏六腑。

“乃大道之真”。道家对“道”与“真”的看法，是“虚极静至，精自然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还虚”（引《真诠》②原文），而这个“虚”又恰恰是《道德指归论》③“静为虚户，虚为道门”的以真合道辩证法。

“两仪之大德”，道家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为生化之源，故而称大德。“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

① 《南齐书》59卷，南朝·梁·萧子显撰。
② 《真诠》3卷。丘处机五传弟子阳道生传，彭定求校刻，全书讨论内丹修炼之道。
③ 《道德指归论》15 卷，唐·杜光庭撰。



而存。德合则生成，是生曰德曰立。既知生不再于我，人处物为灵”。道家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的东西。而道的成形，更是气之化。加上（合）道德恩施，即可得到大德之“生”。这里虽然不过三言两语，但言简意赅的道破了道教思想基本信仰和教义。

“矧夫易道深矣”。易、道两字，可作《易经》和道教又可解《易经》中道理。

《翼方·养性·养性禁忌》“淡然无为，神气自满”。说的是每个人能做到清静、寂寞、恬淡、虚无，不忧精神不会丰满充沛。也就是《庄子·天道》的“夫虚净恬淡，寂寞无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矣”。

《翼方·退居·养性》“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易，《易经》，老，《道德真经》，庄子，《南华经》，三者都是道教重要经典著作。孙思邈解闷消遣之际也是阅览道家典经，可见对道教之信服。

“‘我所以有大患者，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何患’，由此观之，形质既著，则痾瘵兴焉。静言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此文本身就是引用老子的话，而孙思邈则加以发挥。这是“无己”、“无生”、“无我”，也就是“无”与“有”的辩证。证实道中有医、医中有道，以及孙思邈以道学思想来指导医学的实质。

(2) 精于修炼技术丹鼎

“丹鼎派”，又称“金丹道教”，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古代神仙家、方仙道的影响最大。魏晋至唐代，丹鼎派道士主要是烧炼外丹，宋代以来鉴于服食外丹的弊端，转向修炼内



丹，即所谓“钟（离权）吕（纯阳）金丹道”。追求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意识最为强烈，也有使用符咒等方术。

孙思邈著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等道教著作，书中系统研究论述了烧炼丹石之术，两部《千金方》中，也有大量直接或间接的炼丹笔墨，如《翼方·飞炼》等等。

《要方·养性·养性序》中的“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啄齿二七遍”，《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常以鼻引气，口吐气，小微吐之，不得开口，复欲得出 气少、入气多”……都是最低级的内丹修炼入门的基本动作。

还有《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调气法”、“养性·服食法”与《千金翼方》卷十三“辟谷”等，都是丹鼎派的内丹系；《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太一神丹”与《千金翼方》卷二十二“飞炼”等，都是丹鼎派的外丹系。孙思邈是自继葛玄、葛洪、陶弘景之后，又一位精于炼丹技术的医家。

(3) 撰写禁经造诣符箓

“符箓派”是以符咒等方术治病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受古代巫术和鬼神崇拜影响最深，擅长符咒祈禳，役神驱鬼，消灾占口祸，治病除瘟，济生度死等，多活动于民间。符箓派道士也有的修炼金丹（外丹、内丹）。

孙思邈的《翼方·禁经》上下两篇，是从《上清修行经决》、《上清众经诸真 圣秘》、《大上赤文洞神三箓》、《黄帝太一入门入式秘诀》、《太上洞神玄妙白猿真经》、《太上六王明鉴符阴经》……数十部唐前文献中撷取筛拣、精选整理而成。甚至符箓的走笔招式，也有据可依。《翼方·禁经·论曰》：“……其文零叠，不成卷轴，纵令有者，不过三章二章，既不专精， 探其至赜，终



为难备。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能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辑，将恐零落。今编为二卷（即《翼方》卷二十九、卷三十），凡二十二篇，名曰禁经。”可以看出，孙思邈所费精力和符箓派的造诣，是不折不扣的符箓派。这也说明孙思邈思想源于道教难以摆脱之时代特点，孙思邈对此也深信不疑。[①]

（4）测算吉凶洞晓占验

占验派是以传习占验术数为主的道派。汉代周易象数学发展到高峰，逐步衍生出各类占验术数，称为术数学，传习占验术数的道士组成道教占验派。这些占验术数有奇门遁甲、六壬课、太乙神数、六爻易占、文王课、推命术、相术、堪舆、图谶、望云、省气等，用以预言社会人事的的吉凶祸福。占验派多系神仙道教或民间道教所为。

据医书《名医类证医书大全·医学源流》所载：“孙思邈，洞晓天文推步”。《医学入门·历代医学姓氏》[②]所载“洞晓天文”说明了孙思邈对星相占卜有相当研究。两部《千金方》中，孙思邈把占验运用到医学，可见其精通此道。

《翼方·受禁法》的“圣人闭口……闭口藏身之禁法”一节，全部照录于《神仙经》[③]，也是道教趋吉避凶的预卜之言。

《翼方·辟谷·服水》“六甲之精”，《翼方·禁经上·禁鬼客忤

①李经纬：“孙思邈生平事迹研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35 页。

②《医学入门》9 卷，明·李梴编著，是一部较有影响的习医启蒙书。

③《神仙经》，为《神仙传》的另一个名称。计 9 卷，晋·葛洪辑撰，记载 94 名神仙事迹。

气》“六甲、六丁、六丙……”《翼方·禁经上·禁温疫时行》“六甲六乙鬼　疫自出，六丙六丁知鬼始名，六戊六己疫鬼自死，六庚六辛知鬼东西，六壬六癸疫鬼自死”。这是占验派最实用的计算法，俗称“六丁六甲”。占验派认为六丁是女神，属阴。六甲是男神，属阳。至于它的作用，《云笈七签》解答为“若辟除恶鬼神者，书六甲六乙符持行，并呼甲寅，神鬼皆散走。六庚六辛，皆符消九虫”。

还有《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的“又须妙解阴阳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和《千金翼方》卷十四“退居、择地”、“退居缔沏”等，都是典型的占验派。

（5）流芳百世千金积善

积善派信奉《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等善书，认为修仙必须积阴德，立善功。积善派道士以儒家伦理道德、佛教因果报应、道教积善立功的思想，在社会上劝善，延揽信徒。孙思邈是否吸收积善派的成分很难说清，可能积善派的形成在孙思邈逝世之后，行善积德又是儒、释、道的共同教义。然而，孙思邈所积最大的医德，就是为世人留下了两部《千金方》。



九、对后世各派学说的影响

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上承汉魏，下接宋元，不仅对整个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桥梁作用，而且，对中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金、元、明、清医家的影响更为突出。金元之际出现了易水学派、河间学派、丹溪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脏腑说成就卓著；以刘完素为主要代表的河间学派，力倡六气皆能化火，用药多主寒凉；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朱丹溪学派，虽承河间之学，但其重视葆养精气、滋肾阴、泻火，以饮食色欲为箴。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对这三派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此外，孙思邈的研究整编张仲景《伤寒论》，承前启后成为伤寒学派之中坚，为伤寒学派的产生、形成、发展卓有贡献。

1．河间学派的药方

金元之际，学派蜂起，河间学派其主要代表刘完素，力倡六气皆能化火，用药多主寒凉，刘完素所创制的一系列名方，如防风通圣散、双解散、凉膈散、黄连解毒汤等颇为后世所常用。然其制方之法度，往往也借鉴于《千金要方》。如治五脏温病阴阳毒之方，不难发现其主治与选药，与通圣散、双解散相当接近。

又如治发黄之丸方，与《千金要方》黄连解毒汤、凉膈散类同。这一事实充分显示了《千金要方》对刘氏用药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由叶天士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施治，无疑是继河间热病论治之后的重大发展，他的有关新方，与《千金要方》用药不无联系。[①]

2. 易水学派脏腑说

易水学派是以脏腑病机及其治疗为研究中心的医学流派。这个学派以金代河北易水县张元素为开山鼻祖。易水学派是继河间学派产生之后出现的新的流派，自元至明，师承授受，亲炙私淑，代有薪传，逐渐形成以探讨脏腑病机为核心，精气虚损为重点，温补脾肾为特色的医学流派[②]。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成就卓著，张元素的主要贡献在于根据脏腑的虚实寒热辨证及药物的气味归经，制定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对中医脏腑病机和证治多有发挥。而脏腑辨证，直接沿袭《中藏经》及钱乙的学术思想、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在易水学派形成之前，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对于脏腑的病机、精气亏损的治疗，对脏腑生理、病理、诊断、辨证分型及治疗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和总结，从探讨脏腑病机及治疗这一角度来说，孙思邈应为易水学派形成之前导[③]。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对张元素影响更为具体和明显，张元素的脏腑说，虽然自成体系，但是他在孙思邈肝脏辨

---

①刘宁、李文刚：“孙思邈学术思想对金元医家的影响”，《北京中医杂志》2003年第3期，第50页。

②③任春荣：“浅谈论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发展上的贡献”，《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7页。



证的分证论治、肝虚实、肝胆虚实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而得；在用药上，张元素补肝的3类（补母、补血、补气）药物，大多与《备急千金要方》中治肝虚寒的补肝汤、补肝方的用药相同，尤与胆腑证治中，填髓虚的数方用药相合。可见张元素“药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千金要方》的用药经验。

李东垣承继张元素学术，对脾之阳的升发有独到之见，擅用补中升阳之法。他治内伤用补土生金、升降阴阳之法，即多遵孙思邈《千金方》的脾土论述，特别是脾脏用药，也有受孙思邈“由益气与升阳诸品组成”的影响。可见，孙思邈学术思想对李东垣组方和主治的影响之大，《千金方》为其创制新方提供了思路。其观点，尤其是所载的方剂，肯定对易水学派诸医家有影响。

3．丹溪学派养精气

朱丹溪派虽是承河间之学，但独重滋阴降火，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这一观点，实与《千金要方》重视葆养精气的学术思想相合。孙思邈所强调纵欲之害和葆精之法，对朱丹溪滋肾阴、泻火的治法，在学术理论上是有一定影响的。更晚的张介宾对命门的精义和阴阳互根、精气相生有着深刻的理解发挥，他所创制的左归右归，具体体现了阴阳互求的奥旨。这一主张，似也与孙思邈之论说及组方有所关联。

孙思邈在《千金方》的“养性”、“食治”、“退居”、“辟谷”等篇，汇集前代医、道、儒、佛众家养生思想，对朱丹溪的养生、养老论述影响很大。朱丹溪的《格致余论》论述养生养老

内容与孙思邈非常相似。[①]

4．伤寒学派之中坚

伤寒学派是指研究《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的医学流派。这个学派经历了整理、研究、争鸣三个阶段。自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之后，又分成错简重订、维护旧论、辨证论治三个大的分支。孙思邈是继张仲景著书、王叔和整编次之后，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的又一大家。

孙思邈的整理研究，不仅对于保存张仲景著作，应用张仲景的学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对后世深入研究《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有着承前启后的影响。所以孙思邈又是伤寒学派中的一位中坚人物，他把见到的《伤寒论》根据"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原则，移整归纳，收录在《千金翼方》之中，成为继王叔和之后又一研究大家，为伤寒学派的产生、形成做出了贡献。[②]

①刘宁、李文刚："孙思邈学术思想对金元医家的影响"，《北京中医杂志》2003年第3期，第50页。

②任春荣："浅谈论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发展上的贡献"，《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7页。

十、《千金方》与日本医药学

672年《备急千金要方》手稿被日本留学生抄写并带回国，在日本奉为“圭臬”，如公元10世纪日本的丹波康赖氏所撰《医心方》就以孙思邈的医学著作为重要的参考。据日本医史学家宫下三郎统计，仅中日两国现存版本即有16种。国内外翻刻出版者，据统计由宋本至今，《备急千金要方》30余次，《千金翼方》约20次，两部《千金方》合刻本6次；另外还有许多评注本、节要本以及某卷的单行本等十余种累次出版。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日本对孙思邈及其著作的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其中《千金方》的研究最为活跃且富有成果。医学家多纪元坚等说：“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孙思邈《千金方》者焉。”几年前，日本还成立了《千金要方》研究所，研究所顾问景嘉赞称此书是“人类的至宝”。

1．鉴真携书东渡之说

672年《备急千金要方》手稿被日本留学生抄写并带回国，作为医药教科书。《千金方》传到日本的时间，史不经见。江户医

学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言中，多纪元坚等人道：“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若孙思邈《千金方》者焉。是书皇国向传唐代真本，惜仅存第一卷，其余寂无闻焉。若今所传，系明人传刻道藏本。”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日本流传的《千金方》最古老本子是“唐代真本”。那么，“唐代真本”《千金方》东传日本的时间及方式又是怎样的呢？王旭认为：时间是唐代，首次将《千金方》携往日本的人，是唐高僧鉴真和尚[①]。其理由主要有：

一、据文献记载，鉴真的祖师爷道玄律师，医学造诣颇深；鉴真的师父弘景，也精通医学，道玄——弘景——鉴真之间的医学薪传，远远超过当时佛门师徒“五明学”传授的范围。道玄和孙思邈是好友，《酉阳杂俎》记载，他们“每往来互参宗旨”；《高僧传》记载，他们“每一往来，议论终夕”，道玄精医，孙思邈精佛，彼此互为影响。由于，两人关系密切，孙思邈写成《千金方》，道玄处有抄存是可能的。道玄得到《千金方》，下传弘景再传鉴真也是顺理成章的。

二、鉴真精医，并写有《鉴上人秘方》，每次出海赴日前都置办药材，搜罗医书也自然的。而《千金方》成书时间近，有论、有方、有药、又易得，是最可选的。

以上两种情况都可看出鉴真和尚于唐朝就将《千金方》东渡到了日本。

①王旭：“《千金方》何时传到日本”，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2. 对汉方学和习俗影响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曾说："中国医学传到日本，即形成了所谓汉方医学。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的一个世纪期间，虽然也获得高度评价，但若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只是昌盛一时；就其影响的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①]

701年，日本仿效唐制，制定大宝律令，疾医令等医药职令，规定医生必修医籍，《千金方》是其一科，后又被定为培养和考试教材，影响颇大。984年，日本丹波康赖（汉裔），编成《医心方》三十卷，书中直接和间接引用《千金方》条文达1273条，480余处，是日本汉医学的奠基著作。日本根本幸夫说："《医心方》的序文，则以《千金方》第一卷的'大医习业'作为中心内容，使立志行医者把医德放在首位。而在《医心方》的各个篇章里引用《千金方》原文的非常之多。"[②]《医心方》为代表的医书，如果不引用《千金方》，可以说就没有汉方医书。孙思邈的著作和《诸病源候论》，成为汉方医学的主要依据。

日本民间多有受《千金方》影响而形成的习俗，如孙思邈著作中有用苍术、白芷消毒来防止传染病，至今，日本民间仍用苍术投入火中焚烧或煎煮消毒住所，已成为元旦前夕与旦日的习俗，

---

①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6页。

②张世英："试述孙思邈对日本医药文化的影响"，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3页。

用以除恶防疫保平安。

孙思邈著作记有唐代民间喝屠苏酒、端午饮雄黄酒和涂身等卫生习俗，他认为屠苏酒内服与置井水中可“辟疫气，令人不染瘟疫及伤寒”。此法传到日本至今，元旦之日，民间还有饮屠苏酒的风俗，也有在年末将“屠苏散”袋浸入井中，饮用其水以防恶疫染身；用辟瘟气雄黄散，涂抹五心、鼻孔、人中，防止病毒侵入呼吸道。

孙思邈《千金方》中的紫园（丸）、内托散、瓜蒌汤、半夏汤、当归汤、鸡鸣散等方，在日本，方前都冠以“千金”二字，为常用方；《千金方》中的“温脾汤”、“续命汤”、“独活寄生汤”等方剂，作为常规使用方而广泛流传。

3．日本医书所引《千金方》

日本的很多医书，差不多都引用了孙思邈的著作，关于日本医书中对《千金方》的引用情况，宫下三郎在“孙思邈在日本”一文中，作有论说：

《千金方》在日本的最早记载，宫下三郎认为：目前可信记录是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书中医方家目下第166部载“千金方三十一，孙思邈撰。千金方抄一”，可见当时已经有抄本《千金方》了”；又据幸岛宗意《倭版书籍考》卷五“医书之部”的《千金方》中载“据说，医书之泊来于日本，以《千金方》最早。卷首为医学诸论，是后世医门的规范等”。

深江辅仁氏《本草和名》，引用《千金方》为书中所引29种书目之一。

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4年），引用《千金方》内容计



481条，其引用的条数，是继《诸病源候论》后的第二位[①]。丹波雅忠《医略抄》，把《千金方》列为23种书目之一。丹波行长《卫生秘要抄》，主要是以《养生要集》和《千金方》为论据论述的。宗时俊《医家千字文注》是从《太平广记》中引用的《孙思邈传》。

镰仓时代，重要医书是释性全《顿医抄》，引用《千金方》196方，继《圣惠方》《和剂局方》，书中所引数量居第三位；释性全《万安方》，引用《千金方》84方，继《圣剂总方》、《圣惠方》、《和剂局方》，居第四位。[②]

室町时代，字典出现，饭尾永祥《撮壤集》，在30部医方中，最先列举《千金方》、《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康赖本草》有"《千金翼方》本草并诸方注以写之"的记载。

另外，张世英还记载：《官库御书籍目录》书中，收录宋代林亿等校勘的《备急千金要方》。

由此可见，孙思邈《千金方》对日本汉方学之重要和影响之深远。

4. 日本研究人员和机构

日本对中国汉方、《千金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日本江户时代，以有丰富藏书的多纪元胤氏《医籍考》作为基础，开创了中国医学史和《千金方》研究的先河。日本汉方医家相当推崇《千金方》，对其研究也十分重视。近代研究《千金方》的人员有多纪

---

①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第3期，第4页。

②服部敏良：《镰仓时代医学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4年。



元坚、多纪元昕、小岛尚质等；当代研究《千金方》成就斐然的学者有宫下三郎、薮内清、大家塬恭男、小曾户洋、冈西为人、筱原寿世、大塬敬节、武内议郎、矢数道明、蔡宗杰氏等，发表了各类考证、研究、版本、文字、药品、读纪、索引等论著。[①]

日本《千金要方》研究所：1974年，日本关西大学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家专门研究孙思邈的机构，也是国外研究孙思邈学术的重要组织。该所保存有《备急千金要方》珍本，校勘并影印此书是该所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之一。1989年还将孙思邈多种版本和著作收入东洋医学善本丛书Ⅱ期印行，以便更多人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日本东洋医学研究所编：《千金方研究资料集》，1989年日文版。

5．现藏版本和日本翻刻本

孙思邈著作的版本几乎全部流传到日本，现藏有宋校本、原刊本、道藏本、真本千金方等历代十多种版本；还刊印了清代张璐于1698年写的《千金方衍义》。

在日本现存孙思邈著作，是以南宋版，14世纪初金泽文库收藏者为最古；元版与版者是在江户时代出现。多纪氏的江户医学馆中收集大量的中国版本，目前存于内阁文库，现藏中国版本的孙思邈著作有20余种。孙思邈著作在日本翻刻是始于17世纪中叶，《千金要方》刊行单行本，先是翻刻新引进的版本，后逐渐倾向刊刻古版本；江户医学者，继元版《千金翼方》之后，发现宋版《备急千金要方》，又刊行正确的复制本；景宋版《千金要

①名单根据张世英和宫下三郎文章资料而列。



方》和《千金翼方》，是1829年于上海刊刻并发行的。日本的翻刻版总计有12种之多。①以下（1）日本现存版本和（2）日本的翻刻版，是利用宫下三郎的研究成果，在此引用并特别说明。

（1）日本现存版本

《千金方》残一卷：室町抄本。室町抄本因卷首盖有“吉氏家藏”的朱印，所以它是室町时代御医吉田意安的旧藏本。根据近藤重藏氏《好书故事》所言：吉田家谱于1610年由“长男”改名为“意安”，意为皇帝服务，此间，在骏府赐给他一块住地，并命令献出其父法印宋恂的遗物，其中就有《千金方》一部的记载。

江户松本幸彦景刊本（1832）。据景刊本多纪元坚的序言中说，从书商英遵处买到的《千金方》与《医心方》相比较，颇相吻合，无疑是孙真人的真本。特别是“用药篇”的药名顺序，是以苏敬《新修本草》为校本而改正的。所以本书得以原貌流传下来。1930年从帝室博物馆移到宫内厅，现藏于图书陵。

《新刻孙真人千金方》残二十卷：存卷第一至第五，第十一到十五，第二十一至三十，宋刊本。原书藏于清代陆心源的皕宋楼，1907年传到日本，并为静嘉堂所藏。据黄丕烈、陆心源等认为是未经林亿等校勘的版本，在篇目及文字上和真本极其接近。真本和新刻本的第一卷分为八篇，校正本则把“用药”第六“藏药贮拟法”作为药藏第九而另立一篇。现在我们具备了唐抄本——古本形式的《备急千金要方》的三分之二，第一卷是重复的。

《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宋代医书局官定本，1147年刊。光

①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32页。



宗时补充刊本。从执印者北绦贞显所搜集的版本，便可推断：该书早在14世纪初便保存在日本金泽文库。后来，移到上杉氏米泽（文库），并为1699年《官库御书籍目录》所收录。其复制本约成于江户时代的1848年，藏存于蓟文化厅里。它一直被日本政府视为“国宝”，曾刊印多次。主要是以1849年江户医学馆影摹校勘本为本，主要包括：元刊本，多纪氏旧藏宫内厅书陵部所藏；1521年建阳刘洪慎独斋重刊本，多纪氏旧城内阁文库藏10册、杏雨书屋藏12册；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耀州乔世定小丘山房刊本，多纪氏旧藏内阁文库所藏21册。杏雨书屋所藏22册；1588年祝氏刊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石崎文库所藏20册，浅田宋伯旧藏，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所藏残14册；1603年江西巡抚署再刊本，杏雨书屋所藏19册；1689年张喻二氏刊本和1868年王培桢刊本。

《千金翼方》三十卷：其一，元版，1307年梅溪书院刊本。多纪氏旧藏宫内厅书陵部所藏，12册。初由江户城东的医生白贞庵处，移到多纪氏“江户医学”，后为宫内厅所收藏；其二，1605年王肯堂刊本，枫山文库旧藏内阁文库藏24册；其三，1763年金匮华希闳保元堂刊本。多纪氏旧藏内阁文库藏16册，杏雨书屋16册，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15册，浅田宋伯旧藏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残15册，10行，每行20字。前面有金匮华希闳及王肯堂的序文。每卷卷首写书名之后载有“宋·林亿等校正”、“明·王肯堂重校”以及“内阁撰文中书舍人加四级金匮华希闳校刻”等三行文字；其四，1868年扫叶山房刊竹纸本；其五，1915年江左书林石印本，杏雨书屋藏。

《千金宝要》六卷，宋·郭思撰。1124年，宋·郭思把《要方》中的医方选刻于石上。其一，1807年（嘉庆十二年）阳湖孙思邈

平津馆校勘本，平津馆丛书之一，杏雨书屋藏 2 册；其二，1824 年（道光四年）河南开归道署藏版本，平津馆丛书之一，杏雨书屋藏，1 册。

《千金宝要》补三卷，《附录》三卷。明·张学懋撰，是对郭思《千金宝要》增补。1620 年序刊本，枫山文库藏 2 册。《商舶载来书目》中所收载的“《千金宝要》一部一套”是指这一版本。

孙真人《千金方衍义》三十卷。清·张璐撰。其一，1801 年南沙席世臣扫叶山房刊本，多纪氏旧藏内阁文库藏 64 册，杏雨书屋藏 32 册。此书和 1840 年、1847 年、1848 年及 1850 年的各《书籍元帐》，1845 年《落札帐》中记载的都是同一版本；其二，1876 年南沙席世臣扫叶山房刊，步月山房藏版，杏雨书屋藏 24 册。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衍义》三十卷。其一，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上海久敬斋书庄铅印本，杏雨书屋藏。其二，1915 年上海江左书林石印本，杏雨书屋藏。这二书都题有《千金要方·附衍义》，卷首则录有“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几”的字样，容易和录有“长洲张璐路玉衍义”的《要方》弄错。

(2) 日本的翻刻版

日本首次翻刻孙思邈著作始于 17 世纪，以后又复刻中国古版。因新版本错误较多，所以又求刻印善本。嘉永版《备急千金要方》和文政版《千金翼方》，就是拿到中国印刷的。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九十三卷：江户阙名氏，训读注音标点，1659 年敦贺屋久兵卫再刊本 16 册，10 行，每行 24 字。此书虽无日本人的序文，但有万历癸卯年方中声的校跋，因系万历三十一年翻刻版，有训读注音标点，题字《千金方》，里面载有“万治二己亥年仲冬吉日敦贺屋久兵卫开板”。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后藤敏（慕庵）[①]校订。其一，1785年（天明五年）皇都书肆西宫园再刊本；其二，1799年（宽政十一年）京都书肆林喜兵卫藏板本，共30册。前面有后藤敏刻的序言，据称是据浪速·木村蒹葭堂所藏的元刊本翻刻而成的。在书题和封面上，虽有"元版刻"字样，但是10行，每行24字的格式与元版不符，所以不是元版翻刻。除训读标点外，眉栏处尚有校注。天明版，在封面和书里有"天明六丙午孟春皇都书林"的字样。此外宽政版无封面，在衬纸上有："含章斋藏"、"宽政十一年己未九月京都书林林喜兵卫发行"的字样

《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附考异》一卷：其一，1848年江户医学景刊本，34册；其二，1878年苏州崇德书业堂印本，唐本装订，12册。前面有多纪元坚、多纪元昕、小岛尚质三人共著的影宋本序言，卷尾载有"嘉永纪元江户医学北宋椠本景摹开雕"刊行记。在卷后的序言中记有三人总阅，并附有经奈须信得、森堂壁、伊泽信重、堀川济、森立之五人校对的影印本《千金方考异》。校本有《千金方》真本、元本、正德本、嘉靖本、万历方中声本等五种版本。[②]

《千金翼方》三十卷：其一，1770年东都书肆植村藤三郎再刊本，30册；前面有阿波藩医，汤浅兼道和望月三英的两篇序言。据称是以仙台、小野隆庵和望月氏所藏本进行校定的，由稻田氏援助资金而完成，其底本是万历版。其二，1829年（文政十二年）

---

①后藤敏（慕庵）（1734—1787），京都医生，是艮山的孙子。

②这些版本在1878年（光绪四年、明治十一年）与文政景元版《千金翼方》，由长洲黄学熙带回中国而流传。光绪版里附有扉页，内中记有"光绪戊寅夏五购自京瀛"并盖有"苏州崇德书业堂所印行"的朱印。现两刊本均有复制本并刊行。



江户医学景刊本，12册。尾刊有“文政十二季重雕元大德刊本”，其后有杉本良敬的后序，据此认为：载有“城东市医白贞—庵秘藏，后为多纪桂山先生之有”的版本，是源于元·大德本，是由舟桥经中、野间任夫、小岛学古三人担当校刻的。其三，1878年（光绪四年）上海莫绳孙印本，8册。唐装订本。光绪版，删除杉本良敬的后序，以校正后序和大德刊行记而结束，在扉页上刊有“光绪戊寅印行独山莫绳孙补署检”。

《千金方药注》四卷：松冈定庵著，1778年平安书林，佐佐木四郎，竹苞楼等刊本，4册，是记载《千金方》药物的注释书。

《少小婴孺方》一卷：1830年冈氏偷闲书屋刊本，1册，每行18字。眉栏上有注解。前有冈了允的刻序，并云：“《千金方》九篇合为此卷。”大概是根据1785年翻刻本的《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第五卷，并经冈了允填加标点而成。

《大医习业》一卷、《孙真人大医习业讲义》一卷、《附录》一卷：其一，1844年江户喜多村直宽学训堂刊讲义，1849年活字刊本，1册，7行，每行16字。是据《要方》第一卷“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二篇翻刻而成。《讲义》是喜多村直宽所著，10行，每行20字，大活字。《附录》有《太平圣惠方》“叙为医”和《三因方》“大医习业”二篇。其二，1860年江户喜多村氏活字刊本，1册。同《讲义》一样都是10行，每行20字，小活字《讲义》的末尾有“右大医习业一编，旧版为祝融所夺，因以家藏活字，补印施与同人。万延庚申腊月直宽又志”的字样。

由于采用翻刻本，使《千金方》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支柱而被固定下来，这无疑对提高日本医家的汉方学和向民众传播医药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一、医学贡献和医文献史地位

孙思邈为中国医学和药物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宋·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他学识渊博，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他品德高尚，提倡"大医精诚"。在医药方面精于内科妇科、小儿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深有研究。

孙思邈辨证施治，不拘古法，兼采众家，验单通用，灵活多变。他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

1. 医德——伦理学的贡献

"诚一代之良医"是林亿对孙思邈的赞誉，孙思邈在把《千金方》留存于世的同时，也把他的医德思想馈赠于后人。讲求医德是中国医学的传统美德，在孙思邈之前，《黄帝内经》里有所论述。之后，梁阳泉《物理论·论医》中，"德能仁恕博爱"作为良医的首要条件；张仲景《伤寒论》序中，对草率行医者斥之为"窥管而已"；另外，也有医家涉论类似医德内容。总体来说，只



有个别零散片言，没有系统的医德专论。孙思邈首开中国以专篇形式，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道德观和医学伦理思想。《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他论述了“大医”应具备的素质修养和道德规范。“他的医德学说为中国后世医生的奉行准则，可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相媲美。”[①]他被推崇为一代医德宗师，其医德思想在医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孙思邈认为“生者，两仪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气”，“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是至灵至贵的，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正因如此，孙思邈认为济世救人是医生最崇高的责任。医生的优劣对人类对病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掌控人的生与死。

他清晰地分析了医学、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指出：医学学问非常精深，脏腑生理又十分复杂，疾病证侯也千变万化，只有用心之人才能体会其中奥妙；如果把这样至精至微的重要责任，托付给知识浅薄或做事马虎之人，是颇有危险的，会使患者病情加重；虽希病好，但却相反，甚者死亡。从中可以反见良医重要性。对此，孙思邈提出“大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医生必须具备：

（1）“普同一等”的情感真心。

孙思邈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平等对待一切病人，医生就必须打破宗法等

---

① 赵石麟：“伟大的医药学家思想家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974 页。



级，甚至种族、贫富观念。在封建社会里，能提出“普同一等”这一有进步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医德规范，并身体力行，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一视同仁的行为和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宝贵的。

(2) “博极医源”的学术素质

孙思邈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乃得为大医”。不仅如此，还须“涉猎群书”，以扩大知识领域。因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所以，学习哲史、天文、历算等人文知识，方能明仁义之道、晓古今之事，才能培养慈悲之怀、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指出：“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孙思邈认为医生对待病人应“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医生的天职便是救死扶伤，舍己为人，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都求之必应，一心赴救。不可借故拒绝为病人治疗，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如果没有忘我的献身精神，见病不治，遇死不救，则是“含灵巨贼”。

他说，“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论对待什么病人，应该“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



凄怆”以此为医学道德的思想基础，医生要心地善良，动机纯正，怀有慈悲恻隐之同情心。医生要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想方设法为其解除痛苦。凡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遇有污秽不堪或凶险危重病人，不得患得患失，有任何退缩表现。

（3）“审谛覃思”的工作态度

孙思邈认为，医学是“医精至微”之术，“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必须具备广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能，勤奋学习。在“省病诊疾”之时，须“至意深心，详察形候”，方能“纤毫勿失”。“虽说病宜速救，更须临事不惑”，应当冷静分析，“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人命攸关，非同儿戏，不能不顾患者安危，只图自我表现,这是非常“不仁”的。

（4）“无欲无求”的高贵品格

孙思邈认为，医生行医的目的是救死扶伤，医人对待功利场和官场应无渴望，对待病人应不计荣辱得失，他轻蔑“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的庸俗士大夫。他还告诫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医生不能利用所长敛财致富。不能利欲薰心，谋取患者的钱财。这对当今医界也有警示作用。

（5）“有德有体”的个人修养

孙思邈认为：因为医生负着救死扶伤的特殊使命，在病人面前所表现的行为言语对病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人修养非常重要，良医的言谈举止必须有德有体，有医生风度和可信形



象。“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欲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安神志定，端庄无欲，谨慎认真、不卑不亢。诊治疾病时，“不可多语调笑，谈谑喧哗”，切忌轻薄和粗俗。他强调医生要举止稳重文雅，品行高尚端方。即使身处豪华富贵之中，面对“绮罗满目”，也不应失态“左右顾眄”有失风度。

(6) 作风正派的职责操守

孙思邈认为：医生不可“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他主张言行慎密，实事求是，尊重同道，虚心学习，互敬互助，不能说三道四，诋毁同行，自以为是。他认为“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是医生之大忌。他还警告要防备“愚医相嫉，贼人性命”。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下，文人相轻，医者相薄的环境中，孙思邈有如此深刻高明的见解，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

在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中，“大慈恻隐之心”与“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是其核心。

2. 医药科学的贡献

(1) 药学和方剂学的贡献

孙思邈的突出成就，是集唐以前医方学之大成著就《千金方》。“自汉迄隋数百年间，历经动乱，书籍多所散失，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医方书目有百余部之多，但到了唐代，所存无几。他着手征集整理的医方在《千金要方》中有四千多首，在《千金翼方》就有二千多首，搜罗极为丰富而又广泛。其中有历代医家流传下来的，有自民间征集的，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

包括古今中外，有复方、单方、民间草药等。如仲景麻黄汤、桂枝汤、华佗云母圆方；王乔轻身方，齐州荣姥方，常山太守与灌酒，苍梧道士陈元膏；耆婆汤，蛮夷酒，匈奴露缩丸等等。”①

《千金翼方》开首录以“药录纂要”，次之“本草”。分类新，条理明，是其显明的特点。《千金翼方》卷一至卷四是专门研究药物的文献，按《新修本草》之例，分玉石、草、木、人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9类，记载了1105种（其中附药272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他很强调采集、炮炙和地道药材，指出药物若不及时采取，与朽木不殊。开创了将药物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对药物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思邈重视外来药物，对于外来药物没有采取保守态度，而是积极地、有选择性地广泛吸收，丰富了中国的药用资源。孙思邈还重视贮藏，对药物贮藏进行了专门的总结和论述，他是系统论述药物贮藏经验并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第一人，并经临床实践不断发现许多有效药物。

孙思邈炼丹几十年，他的硫黄“伏火法”，已被一般学者公认为中国最早的“火药”配方，对发明火药有着重要贡献。

（2）对临床各科的贡献

《千金方》是综合性医学著作，“临证各科的内容以内科为主，同时旁及他科。记载了各种病证，如内科的风痹、水肿、尿血、淋闭、消渴、霍乱、咳嗽、痰饮、吐血、冷痢、热痢、肺痿、肺痈、肺痨、呕吐、呃逆；外科的痈疽、发背、丹毒、疔肿、肠

① 俞慎初：“初唐卓越的医药学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67页。



痈、疥癣、恶疾、脱肛、火疮及各种毒蛇虫咬伤症，并附有许多有效而实用的治疗方法。而且在临证上，还特别重视妇儿科疾病的诊治”。

在唐之前，有关妇产科疾病的论述虽也并不鲜见，但其内容均较简略、片断而缺乏系统。孙思邈重视妇幼保健，《千金要方》卷首即载“妇人方”三卷，其后又载“少小婴孺方”一卷，这在一般方书上是少见的。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伤带下等均有较系统的描述，给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医妇产科专科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小儿方《内经》不载，古《颅囟方》又是占卜一类的书，六朝虽有诸苏与徐王的《小儿方》，但其内容也还比较贫乏。孙思邈正确地叙述了胎儿娩出后拭口、窒息处理、断脐法，对新生儿护理、哺乳、乳母卫生等也很有实际意义。其中特别是择乳母的条件，他强调至少要没有狐臭、瘿、咳喘、疥癣、瘰和癫痫等病，即使是对现在来说，也有它现实的意义。其次，他强调对小儿不可过娇，他把时常藏在帏帐之中，重衣温暖的小儿，譬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而不堪风寒。这对钱乙作《小儿药证直诀》有很大影响。①

孙思邈对内科有很深的研究，尤其对风湿病（痹症）及高血压病（中风）、心脏病、肺病、糖尿病（消渴）、肾病、胃肠病均有很多论述及很好的治疗方法。他写的温脾汤治疗各种寒积病；

---

①李经纬：“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324 页。

小续命汤对于中风，突然人事不省，有扶正袪邪，转危为安，延续生命的作用；生脉散用于保肺复脉，挽救病危脉绝病人很有效，现已研究制成生脉注射液，治疗各种危急病症，收到良好效果。尤其是炙甘草汤及独活寄生汤，现代应用很广。①

孙思邈对杂病的认识、防治和护理等有创造性的贡献。孙思邈总结了较多的医疗技术，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创造性的应用葱叶作为导尿管，对尿闭的病人施行了导尿术；他相当正确的记载了下颌脱臼的整复手法，他还创造了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如弹丸，以线系之，吞下以取除食道或咽部的异物等。其次他对古称的考证，对我们现在研究古度量衡，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②

孙思邈对针灸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对针灸学理论和技术有许多发挥和创新。孙思邈《千金》书中除专篇论述外，各科疾病运用针灸疗法的处方约 400 余条。他创绘有彩色的明堂三人图，使医生能“依图知穴，按经识分”，且纠正了以前旧图的一些错误。为使取穴准确，孙思邈发明了多种手指比量取穴法，后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同身寸法，沿用至今。他创立的“阿是”穴名及其定位法，从此也成为重要穴位。还发现补充了许多经外奇穴，其中有命名和具体部位者就有 130 多个。孙思邈制定了简明扼要易于掌握的孔穴主对法，即针灸什么穴位，可治什么病，腧穴如何配伍。“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主张因人因病制宜

---

①廖家群：“学习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继承祖国医学遗产”，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75页。

②李经纬：“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取穴，针灸也要辨证论治，这也是孙思邈的创见。孙思邈重视灸法，提倡保健灸，他主张针药并用，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内外相扶，运用灸疗法治疗热症及急症，扩大灸疗的适应范围。发挥诸种疗法的互补作用，这是孙思邈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孙思邈指出“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尤非良医也”。①

(3) 营养和老年医学的贡献

孙思邈在继承前代医家的基础上，对治疗营养缺乏病有突出的成就。他正确地阐明了许多营养缺乏病的防治问题。如用含碘很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甲状腺肿；用动物肝（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常服谷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等。

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长寿医家，由于他德术皆超，学识渊博，有医好自己风冷、痨瘵、毒痢、中风、疮痈等重病的切身体会，本人又经历了较长的衰老期，所以对老年病的防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老年病防治和保健延寿有独特见解。在晚年撰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时，《要方》中专述“食治”和“养性”，在《翼方》中以更多篇章分论“养性”、“辟谷”、“退居”、“补益”，并首倡“养老大例”和“养老食疗”，创造了中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西方罗杰·培根（Roger Racon）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The Cure of Old Age and Preservation of Youth》）一书早约600余年。“他是我国历史上把延年益寿学说同防治老年病紧密结合起来，并

①赵石麟：“伟大的医药学家思想家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4-975页。



使之成为有理论联系实际特色的一门学科的第一人”。他提倡：起居有常顺应自然，清静养心形与神俱，节欲保精持满益寿，导引吐纳运动延年。将由老庄学说“吐故纳新”而来的“静功”，与华佗“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动功”相结合，并辅以食治食疗、讲求卫生等，推动了养生学说的进步。

3. 医文献中的崇高地位

从宋代始，历代中医著作中所记载：如《崇文总目》①、《脉望馆书目》②、《医藏书目》③、《读书敏求记校证》、《万卷堂书目》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⑤、《百宋一廛书录》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⑦、《郑堂读书记》、《古书经眼录》、《皕宋楼藏书志》⑧、《经藉访古补遗》⑨、《日本访书志》⑩、《艺风藏书续志》⑪、《善本书室藏书志》⑫、《四

---

①《崇文总目》66卷，宋·王尧臣等撰。

②《脉望馆书目》，脉望馆，是明末常熟（今江苏苏州市常熟镇）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书斋名。将藏 书编成的目录。

③《医藏书目》100 卷，明代著作，作者待考。

④《万卷堂书目》，为明代广东省东莞陈琏藏书楼“万卷堂”的书目。

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清·纪昀等编。

⑥《百宋一廛书录》1卷，清·顾广析撰，黄丕烈注。因顾氏藏有宋刻本百卷而名其书斋。

⑦《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清·瞿镛编。瞿为江苏、常熟大藏书家，且多珍本书。

⑧《皕宋楼藏书志》120卷，清陆心源撰。陆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其书分藏于“百宋楼”、“十万卷楼”、“守先楼”三处。“皕宋楼”中藏有200部宋版古书。

⑨《经藉访古补遗》106卷，清·阮元主编。

⑩《日本访书志》16卷，清·杨守敬撰。今人工重民续以《补遗》。

⑪《艺风藏书续志》待查。

⑫《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附录1卷，清·丁丙撰。



部总录医药篇》[①]……都有记述或评议，这种情况，为历代中医著作所罕见。开编于六朝（386—589）、杀青于明·万历（1573—1620）《道藏》，搜集文献 5485 条，其中，仅把《黄帝内经》与《千金要方》入编。

由此可见，孙思邈《千金要方》在医界文献的崇高地位。[②]

① 《四部总录医药编》不分卷，分八门（之瞩），近人丁福保、周云青编。
②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227-228 页。

十二、中外历代评价和海外影响

孙思邈被史家立传，受医家推崇。《旧唐书》置他于“列传一百四十一·方技”篇内；《新唐书》却归于“列传一百二十一·隐逸”篇内，评价认识各不相同。中国古代大医家（医学文献校正专家和临床医学大家）对孙思邈和《千金方》也多有代表性评价。另外，孙思邈《千金方》除了在日本和朝鲜有重大影响外，在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地区和国家也有其影响。

1. 中国历代医家之论

(1) 赞誉之说

唐代医学文献整理大师王焘，他虽指出《千金方》之不足作为自己整理之依据，然而强调：“近代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等十数家，皆有编录，并行于代，美则美矣。”

北宋·高保衡、孙奇、林亿、钱象先、赵既、欧阳修、曾公亮、韩琦在其校定《备急千金要方》之后序中赞誉：粹乎哉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共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臣今所咏叹，不能已已者，乃其书法也。“至于其为人行事。



则卢照邻尝云：道洽古今，学殚术数，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则其为人贤否，不待今之称述而可知已。世俗妄人，方区区称海上龙宫之事，以附致为奇。何所发明于孙真人哉。”

“唐世孙思邈出，诚广代之良医也”，“撰《千金方》三十卷，辨论精博，囊括众家，高出于前辈，犹虑或有所遗，又撰《千金翼方》以辅之，一家之书，可谓大备矣”。

“孙氏撰《千金方》，可谓精至……此二书者，表里相明，至织至悉，无不该备。”

北宋·林亿、高保衡、孙奇、钱象先等，在校正《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强调：《千金方》“祖述农黄之旨，发明歧挚之学，经掇扁鹊之难，方采仓公之禁，仲景黄素，元化禄帙，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叔和之脉法，皇甫谧之三部，陶隐居之百一，自余郭玉、范汪、僧坦、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苟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拯表里之变。如能兼是圣贤之蕴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时之志，当太宗治平之际，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以谓上医之道，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

郭思（1078—1085），宋元年间进士，曾研读《千金方》撰《千金宝要方》，给予孙思邈书极高评价：“况一州一县，几家能有千金方，而有者亦难于日日示人。因此孙君之仁术仁心，格而

不行处有之，郁而不广处有之。孙君此书，上本黄帝岐伯。次祖扁鹊、华佗、张仲景陈延之术、汜王叔和小品肘后。龙宫海上，而下及当时之名公方论药术，并自撰经试者。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余亦概尝阅诸家方书内，唯千金一集，号为完书。有源有证，有说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舍。关百圣而不惭，贯万精而不忒。以儒书拟之，其医师之集大成者欤。"，"思久欲阐扬此书，以广之海内。而在公牵迫，终不克遂。今休闲矣，遂取千金方中诸论，逐件条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于未然之前。又将千金方中诸单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于已病之后。其思家与知识家，经用神验者，亦附之其中，各别称说，买巨石刊之，以广其传，以救急者为先，以稍可待者为次，以寻常大病为三，以寻常次病为四。"《千金宝要·序》)

南宋·叶梦得（1077—1148）："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

赵希弁："思邈博通经传，洞明医术，著用药之方，诊脉之诀，针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导引养生之要，无不周悉，后世或能窥其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

明·乔世宁，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曾任承德郎南京户部贵州司署郎中，认为："其书为唐孙真人思邈所著。盖删辑上古以来医书。定为此编也。史称公道洽古今。学殚术数。今考其书信然：自华佗以后一人而已。世以其遗书神验。遂传为龙宫所授。以余所见《新唐书》与真人自序皆不道龙宫事：其说在道经续仙传中。是道家剽奇侈称。希异为胜耳。世俗传讹既久。而学士大夫。亦往往称焉"；"余览之。益怅然慨焉。故为校定千金方正本。余父封君。命余弟世定。自刻于家。将以示世之好孙公者"。



“余览载籍，孙公盖深隐独行之士，与玄晏所述高士类也。其云胆欲大，心欲小，智欲圆，行欲方，古今以为名言。但其论摄养事，多似老子，乃《旧唐书》遂列为方技。其后道经类说，《前定录》、《酉阳杂俎》、《湘山野录》诸书，益多附载诸怪异事。诬矣：诬矣，余尝欲列孙公事迹，稍为论次其事。俾觉者信焉。会自刻《千金方》成，因辨证其略如此，以俟浴闻者订议焉。”孙公华原人，今为余耀州地。城东三里，为五台山，其上盖有真人洞云。

张堂懋作《千金宝要补》（1620），为了订定郭思之误，在其自序中指出：“余欲访宋元道藏，订证全方，觅一有力者刊行，以广真人弘济之意，徒有其志而未逮也。倘邀真人冥枯，假以余年，庶得竟未竟之愿耶。金陵医士程初阳文格徐吕梁经洪皆笃信真人，藏有千金方，而善用之者，若栾恒所文愿范华宇应春，同力校正。得并书。”

明·马理，陕西三原人，继乔氏父子之后，也给予孙思邈很高评价，认为孙思邈：“但以方药济人，其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与，乃后道流，目之为真人。医家宗之为明医，史家列于唐书方技传中。呜呼！岂真知孙子者哉？观孙子言天必质之于人，言人必本之于天。乃以临深履薄为小心，以不为利回义疚为行方，以见几而作为智圆。方技之学，谅不及此。至论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则天地之灾可消。学者取之，以注于虞书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中庸天地位育之文之下，斯精粹不易之言。”“予见古今医方有序者，率不逮是。其间每卷有救急单方，穷乡下邑，药物鲜有之所，仓卒用之尤便。其以千金名方，盖谓一方之价抵千金焉耳，或谓未然。殊不知崇高之人，偶得危疾，得是方以全之，则

中流一壶，岂是喻邪。孙子之徒，尝刊是方于华表石上，竖立鉴山之下，漆沮合流路隅，使人鉴且抄也。今石存而方失，州人传说，为某医所毁，后其家遭雷祸，方亦不存。夫孙子著方，志在济世，仁人之心，亦天地好生之心也。欲专利之徒，乃毁之，其不仁甚矣。天谴而雷震之，岂非理邪。"

明·新安方中声指出："医宝禁方尚矣，灵素传经不及方，汉魏国工，方论堇堇，两晋五季而下，亡逸失伦。唯唐孙思邈氏，体二圣真愍恻夭枉，爰摭上古遗经，后贤法案，自妇婴壮老，将治多方。及若玄言释典之奥，摄生养性之宜，罔不旷刻。星森烂然有第。诚医门之钤键。"

明代王肯堂[①]和清代张璐[②]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只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上下。

明·王肯堂："今独张仲景方最古，其次莫如孙真人《千金

---

①王肯堂（1549—1613），字字泰，王肯堂博览明以前历代重要医籍，采集古今方论，参以个人见解与经验，经高隐记录整理，先后编撰成《杂病证治准绳》、《杂病证治类方》、《伤寒证治准绳》、《疡医证治准绳》、《幼科证治准绳》、《女科证治准绳》，诸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具有较高临床医疗价值。他的《郁冈斋笔尘》中，有十分之三四为讨论医药方剂之内容。（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第 356 页。）

②张璐（1617—1698），字路玉，号石顽老人。张璐将《伤寒论》体例重加酌定，参考喻昌《尚论篇》、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及各家对《伤寒论》之注释与论述，结合本人心得，于 1667 年编撰成《伤寒缵论》　与《伤寒绪论》各二卷。张璐对脉学很有研究，张璐的医著中影响最大者为《张氏医通》。《张氏医通》之体例与证类，主要依照王肯堂之《证治准绳》，主治方药多参考薛己的《医案》与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对前人医学论说进行荟萃综合，考古验今，结合本人心得予以润色阐发，持论平实。张璐参考《本草纲目》写作方法，于康熙乙亥（1695）撰成《本经逢原》四卷。张璐于康熙戊寅（1698）撰成刊行《千金方衍义》，对《千金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考订，并对其中方剂注释发挥。（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第 372-373 页。



方》，如是止矣。真人以应化圣贤，现神仙身，行良医事，其所著书，抉玄扁颀秘籍，宜不涉世情一字……何止只字千金而已。”“心真人之心。行真人之行。而后可以用真人之方。其为真人不难矣。此则余与廷鉴刻是书意也。”

清·张璐，著名医学家，一生研究张仲景、孙思邈，颇有心得，对《千金方》推崇备至，认为自古以来，惟《千金方》可与仲景书比拟。他在著作《千金方衍义》谓：“夫长沙为医门之圣，其立法诚为百世之师。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上下也。伏读三十卷中，法良意美，圣谟洋洋。其辨证之条分缕析，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与于斯乎。”“而此书不为之阐发，将天下后世，竟不知有是书，深可惧也。因不揣愚昧，櫜取旧刻善本，参互考订，逐一发明。其反用激用之法，贯串而昭揭之。”“俾学者开卷了然，胸无窒碍。照宋刻本，仍隶三十卷。仿赵以德衍金匮之义，又殊愧敷衍成文，爰名曰千金方衍义。后之君子，有以讨论修饰，授之剞劂，亦斯书之幸甚。”

“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上下也。”又谓“伏读三十卷中，法良意美，圣谟洋洋。其辨证之条分缕析，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于斯乎”。（《千金方衍义·自序》）《古书经眼录》①：“医家之书，不为不多，独独真人千金方，决不可缺。”《郑堂读书记》②：“千金方辨论精博，囊括众家，高出于前辈。犹虑或有所遗，又撰千金翼方，以辅一家之书，可谓大备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翼……其

① 《古书经眼录》12卷，作者佚名。
② 《郑堂读书记》71卷，补遗30卷，清·周中孚（1768—1831）撰。



用志精审，不苟如此。”《四部寓眼录》：“至其议论之佳者，则不可废也。”刘毓崧[①]：“专以拯人为急，而非以获利为心。”（《千金方考》）

清·孙星衍[②]，辑有《神农本草经》，曾给予《千金宝要》以评价：“千金宝要十七卷，附论及千金须知，为十八卷。宋宣和时，郭思学士从孙徵君思邈所撰千金方撰要，刻石华州公署。自明正统景泰间，俱有木石刻本。至隆庆六年（1572），秦王守中复刊石耀州真人洞。四库书未及收录。余游关中，得其拓本藏笈中。”“真世间秘异之书，不可不广其传，以公同志。书中谓今俗称豆疮，为小儿丹毒，又有反花疮，元人奇效良方，始谓之痘疹，可证俗人谓此疾出于近代者非也。缢死人可救，落水人经一宿犹可活。仓卒间不知其方，书备其术，尤为济人之仁术。”（《嘉庆重刊千金宝要·序》）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医界为主的各界人士的评价，如：

近代·中医学家黄竹斋说：“隋唐之际，孙思邈氏崛起关中，衍农黄之坠绪，承南阳之宗风，勤加搜讨，网罗古今，撰成《千金要方》及《翼方》各三十卷，自医经、经方，以及采药之候，针灸之术，旁及养性之道，避谷之方，靡不详记。伤寒杂病而外，妇婴、疮疡始有专科。博大精微，道全德备，蔚然为一代宗师，盖仲景后一人也。”[③]

---

①刘毓崧（1818—1867），清·仪征人，字伯山。所著《千金方考》12卷。

②孙星衍（1753—1818 ），字伯渊，号季述，清·江苏阳和人，乾隆进士。曾主持诂经精舍、钟山书院讲席。藏书丰富。

③黄竹斋：“《孙思邈传》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文献医史研究室”1981年9月重印本。苏礼：“孙思邈对仲景学说研究的贡献”，《陕西中医》1982年第5期，第1页。



清·徐大椿[1]的评语，在这些评语中，没有多少过誉之词，倒可算得上是比较客观中肯而公正的评价。他在《医学源流论·书论·千金外台论》谓：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

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一大变也。

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

徐大椿开篇“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九个字，道出孙思邈“开唐以后一代医风”之要津；结束一句“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

---

①徐大椿（1695—1771），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道人。徐大椿著作甚丰，医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贬》、《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兰台轨范》、《慎疾刍言》；评注陈实功《外科正宗》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两书；此外尚有《洄溪医案》及未刊稿《管见集》，后者以病症分类，每症之下辑各医家及作者本人诊治经验，并附药方。徐氏与尤在泾十分友善，先后为尤氏《金匮心典》及《医学读书记》作序。徐大椿保守与复古思想也较重，曾说：“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医学源流论》）；还认为“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医贯贬》）。但就其医学上及其他诸方面的成就而言，称其为一代大师还是符合实际的。（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年，第 377 页。）



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指出孙思邈和张仲景的不同，但也称孙思邈自成一家、功不可没。整篇不论是用褒或贬的口吻，都对两部《千金方》的优点客观、明察、求是、公正的下了断语。出于对古经方和张仲景一家独尊立场的维护，本意是贬斥孙思邈不按“古圣之法”编撰《千金方》，对孙思邈有所批评，但也独具慧眼地指出《千金方》不类同于《内经》等正统流派之处，不否定孙思邈的伟大贡献。徐大椿笼统地批评孙思邈兼容并蓄的治学方法，批评孙思邈“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用古方而兼取后世偏杂之法，用药本乎本草而兼取杂方单方之品。反映出徐大椿学术上的复古保守思想和主观看法。实质上正相反，从医学发展来看，这正是孙思邈优长所在，孙思邈深入民间虚心访学，并能吸取西域医学经验，打破古人的局限性，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实为“开唐以后一代医风”①。

诚然，如同其他古代伟大的医家一样，孙思邈也有不足之处，当代学者也有从现代的角度去理解、评价孙思邈《千金方》的，如陈亦人、俞慎初等人文章中，都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指出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医学水平的限制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孙思邈有些唯心迷信思想，主张知因果报应不妄杀生，带有佛教色彩。对诸家学术成就，也缺乏批判，有些兼容并蓄，前后矛盾。某些补条文无法索解，某些引用材料出处不详、欠缺甚至错误。《千金方》有神仙之说，特别是《千金翼方》卷末的《禁经篇》中，大量介绍了应用禁咒法治病。张训认为：“用咒符治病有明显的迷信色彩，这可能与《周易》中的神秘化影响有关。但是更有一

---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235-236 页。

些方剂和治法，恐怕还未能被我们所理解，有的甚至带有突破性的记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不可否认，唐代以来，佛教与道教盛行，宗教伦理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也会有所影响。

（2）瑕疵之说

对于孙思邈的不足之处，干祖望教授的观点最为准确、客观。他在《孙思邈评传》中，以“白璧之瑕　”为目，对两部《千金方》的不足之处，分五项进行了梳理。

其一，引证失实。多处引证，往往和被引者的口气不相符合，如在《序例·诊候》中谓：“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等语，根本不是张氏的口气和医学思想，明明是印度“吠陀医学净身”的说法。孙思邈这里一错，《要方》也即影响了后世，之后 1232 年的陆九芝[①]也追随而错，在他的《世补斋医书·补后汉书张机传》[②]中把《要方》从“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到“无地消散，病笃而死”一段 257 个字，一字无遗、一字不错地照录下来。使一位伤寒大家成了“吠陀医学”派的医生。

其二，过份夸张。如《要方·胆腑·万病丸散》中谓：“芫花散，治一切风冷痰饮癥癖痞，万医所不治者，皆治之。”接下去谈到疗效时，谓：“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这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不能不搬出了“神”来解释。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医古书中过份夸张“神效”、“其效如神”的，岂独孙思

①陆九芝（1815—1887　），名懋修，清·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喜谈五运六气之说。
②《世补斋医书》33 卷，分正续两集，陆九芝撰，刊于 1884 年。



邈一人。

其三，自相矛盾。《要方·膀胱腑·霍乱》中谓："原夫霍乱之为病也，皆曰食饮，非关鬼神。"讲科学；但又《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客许·小儿魁方》中谓："凡小儿所有□病者，是妇怀娠，有恶神导其腹中胎。"又如在《要方·食治·序论》中谓："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揭示出对乱进药的害处。但又在《翼方·退居·论曰》中谓："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气也。"

《要方·序》中谓："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反对处方用药太多。又在《要方·胆腑·胆虚实》中，开处方超过三十味者屡见不鲜，甚至天门冬大煎有四十六味（丸剂方不在内）。

所以孙思邈的思路是比较复杂的，既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又是"谈仙说易"的道家。尽管你想如何融合协调，终究还要龃龉枘凿。但幸而在整个思想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微小的。

其四，"房中术"问题。《要方·养性》"房中补益"，房中补益即房中术，这是古代方士、道士用运气、逆流、采战三个环节组成的节欲、保气、养生之道。它的作用，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益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孙思邈此篇，肯定是将"治病、保健、延年"作为保健养生的一个内容而搜集的。写者无心，后遗有患，毋怪乎被后人所非议指责。

其五，转载问题。有人用柳宗元语"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见《柳先生集·辩文子》，来指责《翼方·痈疽上》中三节文字有剽窃之嫌。转载在历代医学文献中屡见不解，

不能与剽窃相提并论。[①]

2. 日本书序跋之推崇

国外研究孙思邈的学者亦颇众，其中又以日本人为最。如下摘录《孙思邈研究集成》数则评语。但是丹波元坚和宫下三郎的评语则不属序跋之列。

（1）丹波元坚

丹波元坚是日本著名的医学家，世代业医，是《医心方》作者丹波康赖的后裔，据说其远祖为汉灵帝之玄孙是因避难移居日本的。元坚十分崇敬孙思邈，于书斋中录孙思邈语为座右铭："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若与常人混其波澜，则庶事堕坏，使夫物类将何仰焉。由是言之，学者必当摒弃俗情，凝心于此，则和鹊之功，因兹可得而致也。嘉永二年（1849）岁在己酉复月朔，录孙真人语于存诚药室。"

（2）后藤敏

后藤敏《刻千金方序》（1785）记述了《千金方》一书的流传与版本，认为中国在："唐中叶以后，始渐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由此观之，此书当初未有刻本，钞录以传。其上木，则盖治平之际，钱象先等奉敕刊行者为始也。今海舶所致，有数板，但正德板，雠校较精可取。万历板，则猥析篇秩，而颇多脱落。其康熙板，则一依万历板，讹谬尤甚，殆不可读。宋板绝无矣。我万治二年（1659）翻刻万历板，迄于今百有余年，板烂字

①干祖望：《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27-231 页。

刷，致不可识。予束发以来，思欲求宋板再镌之，终不得遇，盖中土亦亡之，故不舶载也。或曰：又有88元板，检订精密，卷数仍旧。予闻所言，未见其书也。偶访浪速木世肃，久藏斯书，乃出示，征其跋，则宋西蜀经进宫本，而元朝所重刊，印装果如人言，尤可信据，盖希代之珍。予既得之，几忘寝食。惜考刊者姓字，不可识也。遂议世肃，与世共之。世肃亦素有其志，乃誊写无讹，遂付梓工。又旁征群书，其可互证者，录之上方，以备讨求。窃恐遗漏纰缪，不免自误误人焉。真人自序言：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予于是举也，亦将家学人晓，以广真人之志也。”

(3) 多纪之坚

多纪之坚（1795—1857）《真本千金方序》（1832）强调古善本之价值，通过研究《医心方》引用《千金方》之内容，发现《真本千金方》是未经林亿等校正之真本，他指出：“视医心方所援千金方。与今本有大异同。而知今之千金，经宋人改订者不一矣。后数年，书估英遵，怀一古册来，以鬻余，取而阅之，乃千金方第一卷，二百年前钞本。太医和气氏（8—9世纪）所传者，卷末有其家奕世题跋。较之医心方，一一吻合。其为真人真本，无复可疑。盖古昔通使于唐时所得也。”“由是观之，则宋人订补，以失其真者，益可知也。今在千百年之后，幸有此本出，以得窥真人之书。则断璧零玑，何可不贵重耶。月瀫松本子邦（幸彦）好医方，又欲刻古医书，以利人世，余因出此以示，子邦惊奇，亟请巧手影摹，附之劂人，刊成印行。于韬者复顾，晦者复明，子邦之功，顾不鲜也。余向者与家蛭怂恿同人，雕元板《千金翼方》，今又勤刻此本，窃以为真人忠臣。虽然此实鼎一脔耳，

若更取宋以前书，翻覆校勘之，或有足见全书真面者。”

(4) 权本幸彦

权本幸彦于天保壬辰（1832）得真本《千金方》，影抄工雕作跋曰：“顷得观天正（1573—1591）中钞本千金方一册，其来历，料是真人之真物，而未经后人恶手者也。字书古雅，亦可喜。惜哉第一卷但一册而已，其余存亡不可知。因令精工影写一通，又命工雕之，以公于天下。此书本系丹波茝庭先生所藏，先生家世所集珍书数千卷，奇方亦多。有求之者辄与之，愿假者辄借而观之，未尝有难色。其为人可知而已”，“先生术精而业大行，王侯士庶，莫不恋先生焉。乞药者日塞于门，而得暇则以著书为务。其于医道，实当今巨擘也”。

(5) 多纪元坚

多纪元坚（1754—1810）等，影北宋书《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认为：“当窃考之，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若孙思邈千金方者焉。是书皇国乡传唐代真本，惜仅存第一卷，其余寂无闻焉。若今世所传，系明传刻道藏本，率意篡改，疑误宏多。强分卷帙，极失本真。世亦往往传元板，文字颇正，稍如可观，而仍不免时有疑误，则均未为精善也。独米泽大守上杉氏所藏宋椠一部，较诸元板，笔书端楷，更为清朗。检其缺讳，其为北宋刊本不疑。”“是本每卷有金泽文库印记，实系北条显时书藏。原本距今五百余年，而此一部岿然独存。真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笈矣。”“窃幸医学之日以益盛，人材之日以益长，人人循真人之津梁，究长沙之奥窔，则凡在医官，莫不钦赖，而在海内为医者，得由以各明其术，为其道为；则大府列代之深仁广泽，天下莫不沾濡，当代

绍述之功，衣被于字内者，尤将永世而无穷矣。”

(6) 汤浅兼道

汤浅兼道于1768年刻《千金翼方·序》中赞颂谓：“余当闻异方方技书，航于吾东方者，防于千金。在昔和丹（按：指日本医学权威和气家，丹波家族）之二家，专奉鼎此书以定谋云。”“原夫自有仲景以降，莫如思邈王焘者。其所撰千金外台既已上木。今辟之武，虽孙吴锋不可当。不授之兵，则奈其术何。汉唐之书，盖方之武库也。医家苟为神武之师者，能有应变之机。而将雷霆之兵以挚蚊虻之病。则二坚当卷旗退，岂不愉快也哉。”

(7) 宫下三郎

宫下三郎说：“中国医学传到日本，即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江户时代后半期虽然也获得高度评价，但若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只是昌盛一时，就其影响的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①

3. 生前逝后身份之说

孙思邈以医药学家的身份享有盛誉，驰名中外。不仅如此，孙思邈还被称为“是一位奇特、神异、智慧、博学、薄名利、鄙富贵、享高龄以及名医名儒、亦僧亦道的传奇式人物”②。干祖望还试图以鸿儒、居士、真人、神仙来论证孙思邈多重身份。对于

---

①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中华医学史杂志》第13卷，1983年第1期，第56页。

②李经纬：《孙思邈研究集成概说》，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

孙思邈的身份认定，史说丰富多彩。有“圣童”、“鸿儒”、“居士”、“处士”、“真人”、“药王”等称谓。有的已神化到“仙”的程度。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孙思邈作为伟大的医药学家，他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年来人民对他充满了敬仰之情，而孙思邈真实的信仰皈依已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淡化。人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希望和祈望，在脑海中演绎着不同身份的孙思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孙思邈是医药学家，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生前逝后都毋庸置疑。在此之外，道家之说沸沸扬扬、神仙之说也神乎其神。

（1）道家之说

孙思邈与道教有缘，但是否真是道士？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现在出版的书籍中，有直接称孙思邈为道士的。如：2000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称他为“唐代著名道士、医学家、药学家”。2006 年，由武斌主编，辽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医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唐代道士孙思邈也在医药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孙思邈自号孙真人，是隋、唐两代著名道士、大医学家。”[②]

但是，至今为止在史书中，还未曾发现有孙思邈生前通过宗教仪式，成为皈依道教道士的记载，但他确实是深受道家影响的。(本书第八章有专述，在此不赘)

孙思邈行医，著有《千金方》，两部《千金方》由精湛的医学技术、高深的道教修养和纯洁的品德思想三者结合而成，也可以

①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 2006 年，第 50 页。
②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辽海出版社 2006 年，第 58 页。



说“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再加上崇高品德。孙思邈行道，疏注《道德真经》并著有10多部道教著作。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和《千金翼方》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中，叙谈道家修炼的理念和方法。《千金翼方·退居》中，孙思邈以择地、缔创、服药、饮食、养性、种造药、杂忌为篇题，叙述有关隐居的行事作为。可以看出，他热爱向往追求道家境界。隐于终南山，与沙门道宣律师交厚，隐山深研医理，探究丹炼。并在蜀县魏家研制成有名的“太一神精丹”。炼丹炉正式名称为八卦炉。

后隐于终南山，与沙门道宣律师交厚，写了不少道家炼丹方面的著作。

孙思邈逝后，《旧唐书》谓他“弱冠善谈庄老”、《新唐书》谓他“善言老子庄周”、《独异志》谓他“居于嵩山修道”、《续仙传》谓他“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三洞群仙录》①卷十二还把他列入仙人榜。

1104年，宋徽宗敕赐发端于宋仁宗嘉佑年间的“真人祠”为“静应庙”，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在其牒文中写道：“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唯真人生于有唐，见谓隐逸，应物之通，具载史官。庙食华原，时乃乡、县祈禳，肆加褒崇，特建荣号。尚其歆择，永福此邦，可特封妙应真人。”

宋、明两代，《备急千金要方》被收入《道藏》，成为道教的典籍之一。道教的世俗性及孙思邈的亲和力，使百姓也把孙思邈与道士相联了起来。孙思邈以其在医药学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广

① 《三洞群仙录》20 卷，宋·陈葆光撰。书内集历代真仙事迹1000人。

受人们爱戴，被后人尊崇为“药王”，并把他曾经隐居过的五台山称做“药王山”。各地道观中也多有药王殿之类的殿堂。

就这样，孙思邈与道教的关系，从他行医、炼丹、著书，由皇帝加封、官方认可到道家认同、百姓认知，在宗教世俗化和世俗宗教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演义而来。或许可以说，孙思邈生前不是道士，而是逝后才被称为道士的。

（2）神仙之说

孙思邈身列仙班这一带有民间感情色彩的神仙之说，在中国史志、文学和朝鲜《东医宝鉴》等著作中，多有所见记摘，参见干祖望的整理，有下列记载：

《续仙传》：绘形绘色地描述他临终时对子孙的嘱咐“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将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这“无何之乡”是仙境；“臣于金阙”是在玉帝处为臣僚。

《太平广记》[①]把他列入“神仙”，《东医宝鉴》[②]称他为“地仙”。

《续仙传·隐化》：偶出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已伤出血。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后月余，见一白衣少年，仆马甚盛，下马迎拜思邈。谢言小弟道蒙君所救，父母欲见。……偕行如飞到一城廓……此泾阳水府也。

《独异志》：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其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音。其夕，天雨大降。

---

① 《太平广记》，宋·李昉编纂。全书分为92大类，附150余小类，内搜集从汉到宋初的小说500种。

② 《东医宝鉴》23卷，朝鲜·许浚编著，成书于1611年。



《酉阳杂俎》：时大旱……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1]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持。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逸石室求救。另《读书敏求记》[2]：孙思邈雍州之华原人。救昆明池龙，得仙方三十首，收入此书中，逐卷一方。

《旧唐书·孙思邈传》：永淳元年，卒。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入木，犹若空衣。

《续仙传·隐化·孙思邈》： 无疾而化，颜色不变，及入棺后，唯存空衣。

《本草蒙筌·历代名医图姓氏》：晨起沐浴，俨然衣冠，端坐而化。经月余而颜色不变。后举尸入棺，既葬，举棺如空。发棺视之，唯衣衾在而尸已解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3]：至唐明皇幸蜀，梦思逸乞雄黄。乃命中使赍十斤送峨嵋山顶上。

孙思邈《千金方》中，记载一“鬼”一“龙”。《要方·伤寒上·辟温》“乃有鬼王见书生”故事，实属转述汉代的民间故事。

《翼方·辟谷·服水》：“武德中，龙赍此一卷服水经授余。”此处“龙”字，其实是指姓龙或名龙的人。

《中华医史杂志》“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4]中记载：据说孙思邈山居时，他的驴出外驮药被虎吃掉，他用符召虎来代驴为他驮药，故今孙思邈塑像右前下方，伏着一只雕塑的虎。

---

①宣律和尚，为孙氏外方之交，后有详注。

②《读书敏求记》4卷，钱曾撰。

③《历世真仙体道通鉴》53卷，续篇2卷、后集6卷。明·赵道一编。

④《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4号。



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古今传说，所记录孙思邈救蛇、祈雨、拯龙、羽化、显圣、伏虎等种种神仙之说，表达得都是人们对这位“药王”、“医圣”朴素的崇敬之情。

4. 海内外之影响

孙思邈的这两部巨著，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也影响着后世的医学。《千金方》对于唐以后医学向着专科方向发展，以及各科专著的不断出现，是有直接影响的，如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等专科著作，以及张洁古的《脏腑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从《千金方》中吸取了营养。不少临床家也直接从中得到了切于实用的有效方药，以至“稍闯其藩篱，亦足以医术鸣”（虞抟《医学正传》）。如此等等，都说明《千金方》不愧为“第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宋朝林亿称颂本书“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从说之所未至”①。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唯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上下。

《千金方》在国外也有流传尤其对日本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672年《备急千金要方》手稿被日本留学生抄写带回国去，作为医药教科书。982年，日本丹波康赖氏所撰的《医心方》是以孙思邈的医学著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本书第十章《千金方》与日本医药学，已作专述，在此略）

《千金方》对朝鲜医学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朝鲜两部医学巨著《医方类聚》、《东医宝鉴》都是以《千金方》作准绳来编写

---

①林亿：《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的，并引用了《千金方》的诸多内容：

《医方类聚》这套大型医学丛书，为公元15世纪朝鲜金礼蒙等所编，不仅收载了《千金方》的医论、医方，而且在写作的编制方面也模仿其体裁。共计265卷，成书于1445年。它第一卷第一、二篇，就是把《要方》的“大医习业”、“大医 精诚”全文转载，把孙思邈思想作为中心精神。在第199卷（注：原书为365卷，后被日本丹波元坚加以整理，乃为266卷。这里用的，以原有的365卷底本计算，下同）索性把《要方》二十七卷中的“养性”、“道林养性”、“居处法”、“调气法”与“房中补益”五篇原封不动地予以转录。除此之外，全书或大段照抄，或把方剂、小论安插在全书中，共计有162节，内《要方》148 节，《翼方》14节。

《东医宝鉴》25卷，为朝鲜许浚奉敕而撰写，成书于1611年。除了把《千金方》列入“历代医方”之外，还把孙思邈思想完整地贯彻其中。卷首第一句就是“孙真人曰”。第一篇论文“身形”中的“形气之始”、“四大成形”、“形气定寿夭”、“四气调神”、“以道疗病”、“搬运眼食”、“按摩导引”、“还丹内炼法”及“养性禁忌”等句，也不折不扣地是孙思邈思想的反映。 甚至“养性延年药饵”中绝大多数的方与药，是两部《千金方》中的。

除日本和朝鲜外，孙思邈《千金方》对东南亚、欧美等国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东南亚各国中医专家，重视孙思邈德术兼备的思想修养，于临床中还使用孙氏千金苇茎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等。而新加坡大巴窑中华医院、中医学院的院训“慎勇端勤”，也是根据孙思邈“智欲圆而行欲方，心欲小而胆欲大”的治



学思想演变而成。在越南被孙思邈尊崇为药圣，并供奉有孙思邈朔像。英、美、德、法都有学者从事孙思邈著作的研究工作。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孙思邈针灸学成就给以高度评价。美国席文(Natheu Sivin)教授和德国文树德教授等在炼丹术实验、伦理学研究等方面，均有专著出版。

国外研究孙思邈《千金方》以日本最为活跃且富有成果。日本医学家多纪元坚曾说："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孙思邈《千金方》者焉。"[①]日本还成立了《千金要方》研究所，研究所顾问景嘉赞称此书是"人类的至宝"[②]。

---

①多纪元坚等：影印元《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②赵石麟："伟大的医药学家思想家孙思邈"，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3页。

十三、孙思邈手迹诗文和炼丹四言诗

书法艺术在唐代，无论是皇家贵族还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以至于平民百姓，都十分喜好且普及，出现繁荣景象。孙思邈博学多才，工于书法且造诣深厚。他的书法遒逸，刚劲奔腾而又婉丽多姿。现今，在摹刻于宋的《淳熙秘阁续帖》中，还能见到孙思邈仅存的一帖珍贵书法手迹，真是值得庆幸。唐代诗歌盛行，孙思邈又精史善文，如同他之前的医家一样，也有诗词流传于后世。《全唐诗》卷八六〇录有他的“四言诗”。

孙思邈这位古代医药科学家，自唐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民众的爱戴，被尊奉为“药王”。不仅历代文人墨客用诗文歌颂赞美，帝王官宦也都代有封谥。在孙思邈故居、耀州药王山、山西稷山、河南茱萸峰等地，也留有皇帝的褒崇和封赐以及文人学士、社会贤达歌颂医德医术等各类纪念石碑。如有皇帝褒崇封赐的“名魁大医，百代之师”之碑；有崇敬医德医术者所立“医济当时，方传万世”、“神功垂佑”之药方碑等，有史以来，历代官民为医家虔诚立碑祭祀，其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是极为罕见的。

1. 《淳熙秘阁续帖》中手迹

《淳熙秘阁续帖》是宋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宋孝宗诏命摹勒人石刻于禁中。卷首有修内司模刻上石字样，复以得到的唐人遗墨，刻为淳熙秘阁续帖，共十卷，卷首钟繇、王羲之贴；卷二王献之书，内《黄庭经》小楷后有“臣遂良临”四字；卷三欧阳询、肖璃、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等七贤书；卷四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卷五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卷六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卷七李阳冰篆，李德裕、毕诚、李商隐书；卷八怀素颠草；卷九高闲亚栖齐已书；末卷杨凝式并无名人帖。碑帖学者对《淳熙秘阁续帖》评价甚高其中收录的孙思邈书法手迹，是行草书，有字难辨。宋大仁释为“川芎不宜兹补。下白，纳少。粟米一石，资饮歠也!思邈”。宋淳熙评论说：“孙思邈一帖，于摹刻之前，必经内府不少专家考证，然后勒石的。这是真迹无疑！”从这一书帖内容上看，或许是咨询书函，或系一病案、一处方之按语。以下摘录李经纬的解释：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食治》指出：“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强调“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在用以食治的各种谷米中，列有“粟米”，指出其“味咸微寒，无毒；养肾气，去骨痹，热中益气”，“陈粟米，味苦寒，无毒，主胃中热……”。《千金翼方·本草下》也指出粟米：“去胃脾中热，益气。”同书卷一《药录纂要·用药处方第四》“补养肾气”药中列有粟米；“下部痢”药中列有仓米。在《备急千金要方·脾脏》中，孙思邈将痢分为冷、热、疳、虫四种。谓“冷则白，热则赤，疳则赤白相杂……则纯痢瘀血”。治疗热痢共 26 首药方，只有一



方用川芎，治疗冷痢31首药方中，则无一方用川芎，但有四方是分别用粳米、粟米、黍米为主，煮成粥服用。此帖所谓“下白，纳少”，似与冷痢有关，指出“川芎不宜兹补”，认为应以小米作为羹粥饮服，恰与《千金》治痢之学术思想相合。这也是此帖为孙思邈真迹之一证。

2.《全唐诗》中炼丹四言诗

唐代诗歌盛行，孙思邈精史善文，如同他之前的医家陶弘景[①]和之后的医家陆贽[②]、林亿[③]、苏颂[④]一样，也有诗词流传于后世。《全唐诗》卷八六〇收录有孙思邈“四言诗”。

《全唐诗》“四言诗”录文：

取金之精，合石之液。 列为夫妇，结为魂魄。一体混钝，两精感激。河车覆载，鼎俟无忒。洪炉烈火，烘焰翕赫。烟末及黔，焰不假碧。如蓄扶桑，若藏霹雳。姹女气索，婴儿声寂。透出两仪。丽于四极。壁立几多，马驰一驿。宛其死矣，适然从革。恶黜善迁，情回意易。紫色内达，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

①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曾在茅山隐居修道，后人尊称为贞白先生。撰有《神农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补阙肘后方》等。另有胡茄曲五绝四首（“胡笳曲”、“和约法师临友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及“题所居壁”），“告逝篇”（为五古，共10句）、“寒夜怨”（共11句）。

②陆贽（754—805），浙江嘉兴人，乃儒而精医者，著有《陆氏集验方》50篇，另有“禁中春松”、“赋得御园芳草”及“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三首。

③林亿有“题招提院静照堂”五律一首。（携李湖山外，招提烟霭中，静由诸漏尺，照觉万绿空，马祖传怀海、牛头住法融，谁来访宗旨？现定即家风。）

④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晋江，后徙居丹阳。著有《图经本草》21卷，另有“阳关图”七绝一首、“赠同事阁使”五律一首及“献文潞公”等七律三首（“即席献文潞公”、“次韵葛大卿留题寒光阁”和“和右仆射刘公莘大夜直中书省见寄之什”）。

滴。号曰中还，退藏于密。雾散五内，川流百脉。骨变金植，额驻玉泽。阳德乃敷，阴功乃积。南宫度名，北斗落籍。

诗的内容主要是论述内丹修炼的步骤和修炼过程中的感应及体会，也是其养生自修活动的真实写照。珍贵的丹术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言诗”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还被刻录于碑，碑高 0.58 米，宽 0.68 米．厚 0.12 米。碑阳刻“四言诗”，碑阴附刻《孝感神应碑》，共 15 行，38 句。原立药王山南庵，方首龟座（后补）。断裂为大小 4 块，后粘好移存于北洞。孙思邈撰，明嘉靖四十年八月朔旦，住持杨教令立石；藩掾龙桥焦应时谨书，富邑高宗枢刊。

3．耀县故里孙家塬碑刻

耀县孙家塬村的孙思邈故居是他出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之地。明朝嘉靖三十六年乔世宁所撰《耀州志》载：“孙家塬，即其人籍里，在太玄洞东北八里。士人就其宅作真人祠。”现仍存。村西南方有孙思邈祠堂，祠堂前面还有孙思邈的先人茔地。孙思邈祠堂前殿有孙思邈镀金塑像，高约 3.33 米。像两旁各有一捧着药包和捧着药钵的侍童，像右前下方伏一虎。祠中有殿宇三大间，有孙思邈、敬德、龙君像三尊；东西两墙上绘制有关孙思邈的民间传说。祠后殿叫做“圣母殿”，供孙思邈父母塑像，高约 2.67 米。

孙家塬的碑刻如下：

（1）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

碑高 1.4 米，宽 0.65 米、厚 0.18 米。圆首龟座，碑体完整。碑首、身、座各列在真人祠的南侧。清同治十一年（1872）立。碑

首为螭首，并有“大唐”二字同碑身正中大字“敕封妙应真人圣神之先茔碑”相对。碑文题是“孙真人先茔碑记”。这座碑四周用砖砌着，虽然有的地方已遭到破坏，但石碑尚完整，字迹也还清楚可认。两旁刻着碑文：

碑文：

“真人生于周宣帝时，而此坟乃宣帝以前所有。千百年之高琢古墓，其宗派源流荒远难稽，而要皆孙真人之先鳖也。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遂隐于蜀之峨嵋山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之复至，又隐于秦之太白山十二载，著书立方，医说又极其神妙。退居五台，治龙治虎，救苦救难，终于太元，享年百余岁，以永淳二年二月十五日羽化。”

孙思邈生于周宣帝时，但这块墓地在周宣帝以前就有了，历经千百年的这座规模宏大、精雕细刻的古墓，显示了他的宗族脉络、家世源流实远难溯，其重要原因都是因为孙思邈的前身是乌龟。北周宣帝宇文赟在位的时候，王朝内乱不稳，于是孙思邈藏进四川的峨嵋山四十年。隋朝文帝杨坚征召孙思邈为国子博士，而孙思邈却托疾不就。孙思邈怕征召他的文书再来，又在陕西的太白山隐居了十二年，写书研究设计药方，医学理论也极其高深神奇。辞官之后，居住在北五台山，给龙治病，治服老虎，救苦救难。享年百余岁，于永淳二年二月十五日在太元逝世。

(2) 重修孙真人祠记碑

清顺治十八年（1661）重修药王孙思邈故居之“重修孙真人祠记”碑，书有“功在生民，则民祀之”八字，碑文说“唐太宗召诣京师，授谏议大夫而弗受也。嘉其高尚不仕，赐号真人，遂封拜于五台静明宫也。自是之后，芳声伟论，流布海宇，庙祠处

处皆然。孙家塬士人建立祠宇仙茔之后，肖其像而香火之者，将以本其所自出也”。坟地占地十七亩多，古柏环抱着三座大墓。又“历宋、元、明以及我朝，庙之圮而修复者已经数四”，说明宋代至清初已复修三四次，此次重修当是第五次。

清同治十一年所立墓碑文说：“真人生于周宣帝时，而此茔乃宣帝以前所有。千百年之高冢古墓，其宗派源流荒远难稽，而是皆孙真人之先茔也。夫真人……终于太元，享年百余岁，以永淳二年二月十五日羽化。”碑文对研究孙思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重修真人祠圣母殿碑记

孙思邈故居真人祠后面，建有孙思邈祠堂，祠堂后殿有“圣母殿”，是供奉孙思邈父母的殿。圣母殿院中，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石碑，称“重修真人祠圣母殿碑记”。碑文大意说：耀州东 15 里孙家塬村是孙思邈的故里，从唐朝起，一直闻名四方。村西南方的真人祠，不知是什么时候修建的，祠内有圣母殿，祠南一百多步是真人的祖茔，嘉庆七年（1802）曾经重修过，四周建有围墙。

4. 药王山隐地南庵北洞碑刻

(1) 纪念碑刻

耀州华原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南庵）

此碑是现存纪念孙思邈最早之碑刻。碑高 1.95 米，宽 0.71 米，厚 0.17 米，方首龟座。碑刻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由王漱撰写碑文，万俟祐立石。王漱《耀州华原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文，记载孙思邈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此皆自古及今乡里耆众所共传也”。



碑文："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而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环耀多山水，其城之东有水曰漆，漆水之东二三里有山曰五台，其峰回环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间翘楚卓立，是出诸峰至绝顶者有之，庙曰崇福观。尝闻耆老传之曰，今之观在昔孙真人旧隐之地，其后经五代之乱，隐间荒毁，后人崇之，流而为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降，或回或直，或细而几绝，或平而复缓，怪石凌峭，松桧夹密者山间之径也。及其至也，老木参天，枯枝屈地，门庭潇洒，殿宇峥嵘，以至就高而为阁，依龛而为洞房，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台崇福也……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或上则山势耸然而特立，崭崖险阻，迳几不通。其回旋数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测。其宏广也，则如宇之斯大者，真人旧隐之所也。然旧隐之所去百余步，今尚存者，残碑坏碣，或湮或灭，不复究矣。幸而近足以取乡里之详传，远足以有新旧二史之可验……案唐史……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阴阳盈虚之理，下达万物性命消息之微……故今数百年之后高尚之士与夫大医名药所以争相塑绘，以钦事之而尚未息也。

郡人万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养性为务。常慕至人，好逑古迹，因访孙真人故乡，乃至华原，因以居焉。故事后子孙，或以医药名医于一时，或以肆意不显于当世。至景之时，盖数世矣。然尚不忘祖宗之业，每游真人故宅，观其遗迹旧基，慨然有感，乃备私钱，基构堂宇，塑绘像貌，经之营之，仅费十余万而规摹方备，孜孜勉勉，为力勤矣。时嘉佑己亥（1059）四月毕工。景之弟祐，亦铭祖风，而得真人方术，秘录及治心养性之术，最为多矣，后二十三年（1082），忽一日访谳曰："有道者



非称则不显，有德者非彰则不明，真人可谓之道德者也，堂既修而严奉之，诚则至矣。然无文以记之，则不足以显扬至道美德，非所谓仰慕之至者也。……强谳忝与……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四月初一乡贡进士王谳记。"

碑中记述了当时南庵、北洞的建筑情况，又记叙了唐书本传及有关孙思邈的一些神话，最后是关于宋代鲜卑人复姓万俟家祖对孙思邈的崇敬，特从渤海迁耀定居，崇尚治心养性为民医疗，说明前代之纪念建筑经五代之乱而荒毁，“遗迹旧基”令万俟景兄弟“慨然有感”，于嘉佑己亥（1059）私资“基构堂宇、塑绘象貌”的经过，“经之营之”的盛况。

碑文下面有跋，说明这座碑是在金大定九年（1169）重刻碑。原因是万俟祐之孙万俟善，认为原碑石狭小，字画纤细，恐怕年久泯灭，90 年后，令善工按照原来的碑文重刻在巨石上，孙思邈像仍刻在碑头。

金大定九年（1169）重刻碑，米孝思跋文并书，金代著名画家杜穆画像。碑分上下栏，上栏为《孙真人新堂图》又称“龙王献海上方图”，是杜穆德留世孤品。下栏为文，碑文中详述了药王山沿革、地貌，新旧唐史及道家所记所载神话传说故事，以及真人祠修建等内容。

碑首绘有“孙真人新堂图”，画像在碑额“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十个篆字之下，画幅高 0.42 米，宽 0.65 米，背景为古松秀竹岩洞白云，孙思邈端坐洞前平地之石座上，身着唐士衣冠，面呈方圆，端庄慈祥，须垂胸腹，左侧为书童手捧书匣，右侧为孙思邈坐虎伏卧，前为老翁，乃龙王之化身，双手捧《海上方》赠送孙思邈，旁为龙王所在之昆明池。画面栩栩如生，十分引人视

线。画作源于神话，也是现存最早的孙思邈像。现药王山收藏之明代孙思邈铜像、太玄洞塑像以及民间木雕，绘画像，纪念邮票像等几乎无不源于此。碑文叙述了有关孙思邈的三则神话传说故事，即“救昆明池龙难”、“求玄宗赐雄黄”、“白水院赐童子药”。存药王山南侧碑廊。

跋文：

真人生于华原，以硕德隐操显于隋唐间。其功厚利，拯济群生者，于今六百年矣。虽飞升之久，而一方有雨赐之求，则照应也如响，病者有药饵之请，则对证而受赐。其异迹显状，炮耀后世。若此故，崇宁间，赐庙额曰：“静应”，封为“妙应真人”。其后改为“静明观”。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风焉！

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其人之乡县者，已数世矣。至景而自办财力，特为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钦。事意其后景之弟曰祜，乃求文于里人，王先生以为记。其言典实详，瞻口诵于乡里者，垂几十年。然碑石狭小，字画纤细，而祜之孙善深又恐岁月之久，或致漫灭，乃别砻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记，仍刻真人之像于其碑首，使采者瞻像读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龛于真人旧隐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余叙其本末，其清信向善，兼能不坠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岂不可书之。

里人米孝思谨跋

大定九年岁次己丑七月乙卯初八日

壬戌万俟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进士宋九龄。

同于校人：赵润、刘勉，进士易椿年、王演，进士杨砺。

画像人：杜穆

孙真人祀殿记碑（北洞）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的刻石。左思撰文，辛珊书丹。此碑撰文为华原人左思，左思时为乡进士，承德郎凤阳府通判。书丹者辛珊为华原河东门人，乡进士承德郎顺天府通判。碑中说本洞道士因“洞前地狭隘，享祀莫避风雨，人甚艰之”而“募缘鸠材缮工为祀殿”。此殿即俗称的“药王殿”，又称“药王庙”。“药王”之称史书无考，碑石不记，故起于何时，不能认定。

碑文：孙处士讳思邈。贯籍华原县，盖唐时建置名也，今为耀州。郡之东北有孙家塬，父老相传，为公之生长处也。公生而神灵，长而岐嶷，善医药，怀才抱德，隐而不仕，特以医药济人。古所谓：不为三公，必为明医，亦以其能济斯民也。此公之志愿。后误以为神仙者流。盖五儒辈隐君子也。今之洞，即檀隐处。

唐太宗尝视，访于其第，徵之仕，公不出，后赠为“真人”云。历代相传，神以祀之。《祀典》云：“凡有功于民则祀之”。公医济当时，方传万世，可谓有功于民者矣！其祀也。夫奚疑。愿洞前地狭隘，岁时享祀，莫蔽风雨，人甚艰之。本洞道士赵演斌、董演济，传公之术，而守道行者，乃募缘、鸠材、缮功，为祀殿一大楹，宏敞黝恶，足以设牲醴列乐舞、展兴拜，庶可妥神灵而安人心矣！工完，斌、济乃丐预言，夫公之行实功业，著在当时，载在唐史。其外传，传其练丹修养，与夫降龙伏虎多庄事又奚俟。预言，虽然予窃以为使公仕唐，縻高官重禄，殁而无闻

焉，何如垂此医药著《千金》，方行于世，以惠万代，延祀典于无穷，则声名为不朽矣。其视仕当时，为公为相，爵位因隆赫矣，然湮没而无闻焉；甘等与草木同朽。岂可同年语哉？况公主神灵至今，往往有病者吁祷则梦寐见之，施以药饵而病即愈者，不可胜纪。于是四方辐辏，不远千里，每岁二月悉集焉。则此祀殿奚客已哉，乃为作祀神曲凡五阕，使道士歌以祀之！

“孙真人祀殿记”碑文，可以看出修建这座庙的原因、经过等。

碑文后，撰立者又以“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等礼仪举行祀殿之礼，且每礼也有颂词，甚为虔诚。

迎神：坎坎兮击鼓，仙仙兮屡舞，陈瑶席兮湛清酤，柏森森兮洞古，神之来兮使我心不口！

初献：性陈兮肥厢，帛献兮精纯，奠桂酒兮醪醇，奏雅乐兮天韵，云霭霭兮良辰，香氤氲兮见神！

亚献：竭诚桎兮方来馨，仰圣泽兮神必临，铡缥缈兮云中，俨灵觋兮中庭，礼既行兮不停，敬莫伸兮心不宁。

终献：殂芬豆芳兮神已惠，礼俏乐和兮馔将痤，思我成兮绥而谛，礼事毕兮掩其缚。

送神：纷进拜兮洞前，心缱绻兮琼筵，临不语兮去不传，俨其光兮瞻太玄。驾云车兮与造化周旋，佐我邦兮祀典绵延。

由此可见，此碑记把祀记孙思邈的礼仪制度化了。

孙真人洞奉和碑（北洞）

李自成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式称王于西安，改官制府为尹，州为牧，县为令。杨鼎瑞为李自成政权的耀州牧，短暂任职中，杨鼎瑞拜谒药王山并立杨鼎瑞题诗《孙真人洞奉和碑》。碑长

1.06 米，宽 0.52 米，长方形小诗碑两块，碑文内容相似，两面均有碑文。此碑历经清代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实为难得。存药王山北洞药王大殿西侧偏房东墙壁。

碑文“孙真人洞奉和大宗伯姜老师致祝韵：山头老柏叶香满，古洞花明积翠赊，天子绿章春降露，使臣彤笔夜生花，仙人已去空芝草，王气方回遍海霞，小嗤漫言依北斗，银绳金印佐黄华，耀州牧门人杨鼎瑞”。

碑文竖行排列，上款左上方为长方形书款印章，长 0.06 厘米，宽 0.02 厘米，刻“斗酒诗百篇”五个篆字，下款后下方为上下两颗方形名款印章，也为篆刻，上 0.36 厘米见方，为“鼎瑞”二字，下 0.35 厘米见方，为“定同印”三字。上款“大”字抬高并另起一行。诗文对仗工稳，排列多为七字一行，仅末句为六字，将最后一个“华”字另起独占一行，而第三句“天”字则突出抬高一字。

诗碑的另一面于同一墙壁的屋内面显露，诗句虽与前者一致，但上下款有所不同，上款仅为“太玄洞次韵”五字，下款只为“金明杨鼎瑞”五字；前后印章与前者类同，仅下款后方两颗印章上下换置。

诗句排列多为六字一行，仅第三行为两个字，第四行亦将“天”字突出抬高，为七字一行，全诗末行仅五字。

诗碑两面文字布局均匀，皆为行书，但书法风格不尽相同，但前者于规矩中不掩豪爽，流畅奔放，后者则严谨间蕴然刚劲，尚难判定是否出于一人手笔。

诗碑所刻篆书印章，文字屈曲较多，似属明清之际广为流行之九叠篆，唯刻工嫌粗，当为急就而成。重要的是诗文全然一致，

作者署名相同，尤其是内容颇堪思味。

杨鼎瑞“孙真人洞奉和”传世诗碑，是当时农民起义的将士推崇医学，敬重爱戴孙思邈的罕见文物，尤为珍贵。

《唐太玄妙应孙真人叹世吟》碑

明·正统十二年（1447），耀州和州李芳、同知丘纯重刊刻立。碑分两部分：碑首上部分仿宋、金时《孙真人初记碑》的杜穆画像“龙王敬献海上方图”，更为生动，富于情趣；碑身部为碑题和碑文，含有佛、道两家思想，碑存药王山北洞药王大殿内。

（2）赐号封谥碑刻

唐太宗李世民赐孙思邈“真人”称号。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敕赐庙额“静应庙”，第二年又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

唐太宗赐真人颂碑（南庵）

唐太宗李世民赐孙思邈“真人”称号时所立。碑文颂词为：“凿开经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刻碑名为《唐太宗赐真人颂碑》，是否真出唐太宗尚乏确凿依据，有疑为道士伪作，有说为“金太宗之误”，也有人认为：今药王山尚有“唐太宗拜真台”、“唐太宗御道”等遗址遗物，且唐太宗敬佩孙思邈史书有载为据，颂言何为不可，似乎推断是真。

碑高 2.04 米，厚 0.7 米，厚 0.25 米。螭首龟座，现存碑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由丞相完颜宗壁始刻，因火焚断裂，重刻于元代蒙古宪宗蒙哥汗五年（1255），又由著名道士李济道依照原碑文复刻。行书，五泉客杨聪书，邳邦同跋，观主李素舟立石。其颂字大若拳头，共 4 行。颂后附有跋文。楷书，共 10 行，行 46 字。现存《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艺文堂金石文字

目》都有著录，《关中金石记》、《陕西金石志》存目、《金石录》录有全文。此碑金代由宰相所刻确实可靠。

碑后跋文：

方外友华中道济，好古，有为之土也。以先师居有唐孙真人旧隐殿堂岁久损坏，完复一新，凡碑刻缺裂不完者，必移之他石。在现有大定癸卯间县宰完颜宗壁所书，《太宗赐真人颂》碣，火裂而损甚，将移之，未暇。癸卯岁，郡人骆志全礼山主李公，入道山君。忽以数力掊口而来，告曰："不幸双目暴尔央明，又反胃，饮食不纳，苦楚不禁，唯自尽可免。"济道止之曰："人之疾病，必以药饵救料，又有祈清之事。况真人医术冠绝唐代，所留方论，后人用之，无不获救。今遗像在堂，若诚心祈之，岂无不验!"志全敬受教，置水一钵于真人前，铭心致祷。以水煮粥，食之，不反吐粥，食渐进。不两旬，疾乎。志全愈加诚敬。一日，卧北窗下，告之道伴曰："我见窗根上白四指许，所见日加。"一月后，眼复明。一方惊叹。四月初，济道过告而请曰："将遗《颂》石，敢告数字以识岁月，备道前事。"于叹曰："有事哉，异闻也。其可隐乎，因记移《颂》入表而序之，以吉来者，庶平共知真人灵验，唐皇所赐之《颂》，非虚美也。"古乙卯四月上旬，谷口遗老邳邦同谨述。宣受耀州太守李鲁孙，同知赵彦，华原县令王样。

丙辰年重九日，观主质真老人李素舟立石，宣差京兆府路副总管刘尚，前耀州大守王浩，清安老人杨素一



助缘，南阳逸士张志和刊。现仍存药王山南庵。

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碑（南庵）

碑高1.55米，宽0.96米。厚0.2米。立于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三年（1104），王毖撰文并书，公巽同、王允中立石，刘源刊。碑额经过尚书省牒文礼部奏请，敕赐“耀州静应庙”，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行书体，额书“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20字。敕并告词分上下两栏，上栏19行，行9字；下栏18行，行18字。

碑文上栏：尚书省碟。耀州静应庙。礼部近承都省付下。陕府西路转运司奏：据耀州申契，勘孙思邈本华原人，祈稼靡有不应，乞赐一庙额。保明是实。寻下太常寺看详，据本寺收捡准令节文诸神洞应旌封者，先赐额。今依条欲拟“静应庙”为额。本部依太常寺拟到前项事理施行使候指挥碟奉，敕宜赐“静应庙”为额碟至准。

敕故碟。

崇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碟。

右正议大夫守右远吴。

左银青光禄大夫守左仆射。

碑文下栏：敕耀州华原县五台孙真人：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生于有唐，见谓隐逸。应物之迹，具载史官。庙食华原，时□乡县，祈禳休脫。美利在民，肆加褒崇。持建荣号，尚其歆怿，水临此邦，可特封“妙应真人”。

中书令（阙），中书侍郎臣赵挺之宣奉，中书舍人臣幕容额逢

行，奉敕如左（上），牒到奉行。侍中（阙），尚书左仆兼门下侍郎京，门下侍郎将，给事中时中。崇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戌时都事康继隆受。左司员外郎方会，付吏部尚书令（阙），尚书左仆射京，尚书右仆射（阙），尚书左丞（阙），尚书右亟居厚，支部尚书执中，吏部侍郎洵仁。告“妙应真人”奉敕如右（下），符到奉行。

主事李孝恭，郎中矜，令史李遘书，令史张应。三月五日下。十月八日将仕郎美原县尉兼主薄臣王毖书。朝奉郎通判军州事赐绯色袋臣故于巽同立石。朝奉郎知军州事飞骑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臣刘源刊。

宋徽宗赵佶在历代皇帝中，最为关心医药卫生保健，他颁旨“五台山静应庙额”与加号“妙应真人告词”以倡导尊重医药先贤。年年祭祀或定时“必秩而祀之”的规矩，或许始于赵佶此次之诏敕[①]。号召天下祭祀，其影响深远。

碑文中叙述了1103年知州王允中因真人祠“祈禳脱有不应”，而奏请朝廷敕额“静应庙”，加号“妙应真人”的经过。以此推之，则似孙思邈所谓“真人”作为皇封加号实自宋始。

皇太子阔端祝文碑

元定宗贵由元年（1246）。皇太子阔端撰文，静明观主李素舟立石。

碑文曰：……贴没钦依恭诣耀州五台山静明观妙应真人殿前熏香致奠，宣告皇太子祝文。其词曰：阔端窃闻，有功则祀，惟

---

①李经纬：“孙思邈生平事迹研究”，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第81页。

典之。公济物以道，乃神之功，信而有徵，享之无穷。洪惟妙应真人，里系华原，幼称圣童，医药推步，术数淹通，方著《千金》，论会三教，在隋引退，至唐应召，愈疾明验，历代褒封，真人之号，妙应惟崇，人之所欲，感而必从，敬致恳辞，尚鉴微衷，永延寿等，安保身官，万斯年兮，皇祚弥隆。尚飨！时丙午岁二月初五日按：立此碑时，纪年在南宋，但元代已经太祖太宗定宗三皇帝，因未正式建号，纪年中未载，此时耀州华原已为元朝所管辖。阔端为太宗的三太子，定宗贵由汗之弟。

圣旨加封孙真人碑（碑阴）

元·至治元年（1321），太皇太后懿旨（摘录）：“……缘本宫（指静明宫）古迹五台山即系隋唐太玄孙真人仙居故宅，经今七百余年节续道人住持专一，为国焚修告天廷圣寿祈福之所，累次褒封真人之号，加赐院额。……”

(3) 医药医德碑刻

北宋与医药有关碑石颇多，大都是明、清时代所立。《千金宝要》、《海上方》、《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历代名医神碑》等医药碑石最为名贵。

千金宝要碑

《千金宝要》首次碑刻，始于宋·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郭思，宣和六年（1124）。当时苦于《千金方》流传不广，“一州一县，几家能有《千金方》，而有者亦难于日日示人”，下层百姓就医困难，“贫下细民，因此不获治疗，枉坏驱命者，可胜言哉”，他认为：“唯千金一集，号为完书……其医师之集大成者欤。”故而“遂取千金方中诸论”，“急于救人，推行孙君之妙法本意，谨敢以《千金宝要》命篇”，郭思本人是医家，喜好医药之术，在公

众之暇，尝阅诸家方书。尤对孙思邈《千金方》极为赞赏、评价颇高，他认为是“天百圣而渐，贯万精而忒”，为唐前医书之集大成者。又因书卷帙浩繁，每病急求，难据以治，他便把《千金方》中重要而宝贵、实用而简便的医方、针灸等内容，系统整理、精选摘录编纂成八卷。集其精华之宝，选其贵重之要，命名曰《千金宝要》。郭思官任华州时，购置巨石，刻碑于书，立于华州公署。内容包括妇人、小儿、中毒、急救等十七篇。后附“千金须知”一篇，为该书部分名词术语、剂量换算法之解释。山野民众医病求方、传抄拓印络绎不绝，深受百姓欢迎。之后，明代《千金宝要》于正统、景泰、正德、嘉靖、隆庆都有木刊石刻。

明正统八年（1443），华州知州刘整重刻石碑；仍立碑于华州公署，有明张楷序。据隆庆《华州志·艺文志》载，此时“孙思邈千金方碑（应为《千金宝要》碑）”尚在“州台内”。景泰六年（1455）知州杨胜贤因刻石冬月摹印不便，易刊木版。这是《千金宝要》首次木刻，其中有宋·宣和六年郭思序和明·正统甲子张楷序。

特别是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秦王朱守中，为了让孙思邈的医术济世救民，更广流传，故又重刻石碑，立于孙思邈隐居之五台山真人洞前。这样，人们到药王山朝拜纪念，瞻仰药王的同时，又可以寻方问病、抄录拓印。药王山游人纷纷众至，影响更为深远。

序文：

千金宝要者，宋徽宗猷阁直学士郭思按唐孙真人先生所集千金方中纂要者也。宣和六年思曾刻石于华州公



署。我明正统八年华州知州刘整重刻。景泰六年知州杨胜贤以石刻各月不便摹印，易刊木板。往年春，予得之，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不烦而效速信，有切于人之实用。乃珍如拱璧，不容自秘，已命付之梓矣。窃惟宝要纂自真人千金方中，天下之游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顾独吉立石于真人洞前，非所以广其传也。因刻于洞前云。隆庆六年岁在壬申春三月上吉秦王守中识。

序中可以看出，当年药王庙朝拜盛况，足见北宋时孙思邈及其著作已普遍为人所珍视。

《千金宝要》碑，共四通八面刻文，每通高 2.27 米，宽 0.97 米，厚 0.22 米，圆头方座。每面各为七行线方格，每行为三框方格，计 21 框，小楷密书。其碑按元、亨、利、贞编次。四通八面全书碑共计六卷，分三部分：《千金宝要序》、《千金宝要》、《千金宝要跋》。并有序、跋，总计 965 方，卷一为妇人、小儿、中毒、饮食中毒方；卷二为解百毒、蛇蝎毒、喉痹金疮、疮痈疽肿方；卷三为霍乱、吐泻、虎犬马伤、舌耳心目及大小便浦、中风、大风水气病方；卷四为疟痢症、头风吐逆病方；卷五为疫瘴渴淋、头面手足瘰、疠、疮、漏等病方；卷六为论述耆苦婆万病方、仙人玉壶丸等。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十分重视简单行效方药、简便易行的疗法以及急救技术之普及推广。

《千金宝要》作为《千金方》的择要编本，刻石立碑，拓印本广为流传，各代屡有翻刻，明清最多。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载明刊本至少在五种以上。《千金宝要》碑石是世界现存最早

最完整的医书石碑，方简便而药易得，法易行切实用，便于急救，其医药价值和文献文物价值，甚为珍贵，堪称医药学瑰宝。和《千金宝要》碑同时树立的还有《海上方》碑。

海上方碑

“海上方”石碑，方123首，刻立于隆庆六年（1572）壬申春三月上吉，与《千金宝要》同时立起。一通两面。每面皆与《千金宝要碑》相同，分层分框，框块分界，皆编序码，拓印成肠。

碑上面刻的是“孙真人养生铭”以及各种药方。“孙真人养生铭”现被认为是后人伪冒孙思邈之名而作。立于“千金宝要”碑亭右侧。

药方碑

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石，现存碑阴面，存药方诗六十三首，药方后有跋。

跋曰：孙真人者，讳思邈。盖隋唐间隐君子也。口称其精儒医，善推步，有脱而口，岂古之谓有道者哉。而世不察，谓口口焉。道家者流误矣。或曰：真人活昆明池之龙，龙以海上方百二十三首报之。此其说诞漫无足信。顾其方，药简而应速，有起死回生之功，则神矣！余守耀，数游太玄洞，则真人归隐之地也。且其地多美石，因录其方而勒焉！至于龙传鬼怪之迹，因无所问云。嘉靖庚子之春，中谷山人温秀跋。

清·顺治十年（1653年）磨“药方碑”正面而刻，“东山辑修殿宇碑”。是耀州吏目吴恩所立，记载吴三桂率军北上镇压起义军，顺治八年（1651）南归过耀，曾登药王山拜谒孙真人祠庙并馈金修茸殿宇之事。

碑文节录：“……知孙真人善古之隐君子云，夫当隋末鼎沸



瞻乌靡定。真人嘉遁不出。自后李唐受命，又辞不赴召，抗节高归东山，可称令终有佃矣。而真人尤有异焉者，彼福方人市，诡语特见，几保身之哲也。即靖节酒隐，亦不遇借此以见志，全厥身名耳。若真人医隐拯世，立苏疲癃，即有峻节，复有惠施于天下，山中良相。岂不漫然，出梅薛诸君子之上哉。士人于每岁二月二日，远近祷祠字同龛者，无虑万亿。丹炉度厄。如响应声。迩因兵燹道路梗塞，而士女祈报者，络绎不绝。则神功普济，与其节名同万世不朽矣。”叙述孙思邈不赴召而隐居，医拯世惠天下，以及李自成起义兵败陕西，吴三桂入陕的事件。“因兵燹道路梗塞”但祈敬群众仍“络绎不绝”等内容。

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碑

碑高 1.65 米，宽 0.74 米，厚 0.17 米，团首龟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立，葛大宾、大臣兄易施立，王垂绅书，赵应祥刊。碑额首为“龙王敬献海上方图”，是明代无名氏仿金代大定九年重刻宋·元丰四年的“孙真人祠记碑”的杜穆画像，风药论为其碑的中上栏内，共 26 行，行 25 字。碑两面刻写，正面的上半部刻的是“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下半部是“孙真人九转灵丹”和“神仙鸡鸣丸”。背面是“历代名医神碑”。

“历代名医神碑”刻于“三方”碑之阴面，碑头为“历代名医神碑，六个大字，下分十三栏，从三皇到元朝按照朝代记载了 198 名名医。碑文本身就是刻就的中国医药学发展史，极其罕见，颇有价值，但也存有错误。经张世英考证，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药王山医碑录释——海上方》一书中，有对此进行分析归类和修改。他认为：其一，人名错误。如南北朝北钱少主元恪（宣武帝），碑误为“少主元徽”。又唐代医家元珠先生，碑误为“王珠

（先生）”。其二，朝代错误。如慎徽应为宋代人，碑误列入三国蜀人。顾欢是南北朝南齐人，碑误列入北齐人。其三，人物混淆。如南北朝宋医家徐秋夫是晋医家徐熙（字仲融）之子，碑误为“徐熙（秋夫）为一人，又将徐仲融，当作另一个人列入南北朝宋人。其四，书名错误。《淮南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与门客等人共著，碑误“淮南子”为东汉时医家，但仅此一处。此碑现立于“千金宝要”碑亭左侧。

灵佑碑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石，郡人庠生李蔚敬刊。

碑记：李蔚次子惟心偶左肘患异疮，状类剥皮石榴，鲜红高起，大如盆口，缠绵半载，医数十辈，咸莫辨为何症。蔚忧惶，计无所之，乃竭敬积诚，仰叩孙真人祖师处。得千金宝要，首揭疮科，忆其形状，当即取方书谛睹，云：用牛筋根捣如泥，以腊月猪脂和贴。遂依方调治，一日夜红子尽消，收敛大半，不数日痊疴。呜呼！其指示方药，宛若耳提面命，神功垂楠，安敢泯没，蔚感佩无崖，敬术颠卞，俾四方香客知之，如遇异疾，即便祷神明，乞签医治，罔有不应者。遂以木板纪其事。至四十年，长男李惟性患时疾，蔚往气签，亦著灵应。见前板书为风雨模糊，今易以石刊，使永垂于不朽矣！

“灵佑记”记述了李蔚次子李惟心于1606年患“反花疮”及其孙1612年患时疾用孙思邈方治愈的经过，遂立碑记曰灵估。虽属附会神明之语，但确为千金宝要方治愈之功。此前明·万历壬寅三十年（1602），郡人翰林文肃公王图就题“灵枯门”三个大字刻石悬钳太玄洞一天门之上。

重修十大名医神殿等碑记



清初沿明制，太医院祭祀唐以前名医。雍正中，命太医院官致斋、陪祀，遂在药王山塑造“十大名医”像，以此“群祀先医”。十大名医为：雷公、岐伯、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1782 年竣工。立重修十大名医神殿过峰楼暨诸工碑记，焦司农撰，郑伯典书。

碑文曰：世之矫言祸福者，每以修葺庙宇为作福地，不知庙宇之修，实出于人心之不能已也。盖神之所穰不妥，人心有所难安。太玄洞旧有十大名医殿五间，不知肪自何代，历年久远，栋桴倾圯，金光尘封。而诸神普著方书，利济无穷，赞化参天地之心，杏林之春常暖尽性，立民物之命橘井之泉永馨，固所称功高百代，惠施万古者也。

“十大名医”塑像精细，像后有壁画，画工生动细致，极为罕见。孙思邈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十大名医殿位孙真人殿于左，颇有崇敬先贤之用意。

孙思邈医德纪念碑

碑刻石 11 通，碑高 2 米，宽 0.8 米，厚 0.26 米。1989 年 5 月由铜川市政协与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发起，社会贤达人士集资。

计有：《大医精诚》碑，《大医习业》碑，《备急千金要方序》碑，《千金翼方序》碑，宋·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碑，《校正千金翼方表》碑，《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碑，《日本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碑，黄竹斋《医仙妙应孙真人传》碑，黄竹斋《评赞孙思邈医德文》碑，以及米伯让《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医德纪念碑序》碑。弘扬孙思邈的医药学术与高尚医德。立于药王山北洞。



5. 山西稷山蔡村药方碑记

药王庙孙真人药方碑记

碑高 1.26 米，宽 0.58 米，碑文正书，一石两面。为清道光十七年（1837）岁次丁酉三月上旬谷旦，稷邑东蒲里，宁殿恢敬刊。碑记前后刻有孙真人《海上仙方》药方共 180 个，包括内、外、妇产、小儿、五官等科。还有孙真人《枕上记》和《养生铭》。

《碑记·序言》："且凡书有益于世者，皆当公诸人，而不可私诸己也，况医书为性命所攸关，顾可不公诸同好乎。"表明宁殿恢将所获的《海上仙方秘录》抄刻于石，公诸于世，敬仰孙真人济世活人之意。

6. 河南茱萸峰石像记碑

孙真人石像记碑

高 0.70 米，宽 0.30 米，厚 0.15 米。石碑左上角及额缘残缺，碑文正书，一面经与《修武县志》核对，将缺字补入碑中。碑的正面，全文如下：

（大金国河东南路怀州）修武县七贤乡西冯营村修孙真人石像记李天祐撰。

孙思邈者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言，弱冠，尤好庄老及诸子百家之说，深晓医术。在世经籍，无不读览。后注《老子》、撰《千金方》、《千金翼》、《福禄论》、《撰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流行于世，普济群生。由是观之，则思邈者非特杰于当时，亦垂光于后世矣。天祐于泰和四年清明日（同里人）王世真等登玩于山，一洞灵迹差异，雾绕云遮，又有石



丸之药。因询其故，皆曰：古老相传，乃孙真人之洞。于是岁（旱），民心忧惶。天祐因想真人神圣，曾三处救龙，必能动于龙（也），（故）美其德，乃焚香祈请，祷雨三日，果获感应。遂纠率居，特起诚心，各舍己资，命工镌造，成其石真像，置于洞中，（俾后）游山之人有所归依矣。

时泰和七年（1207）清明日立石。

药王洞位于河南省修武县太行山茱萸峰上。清乾隆《怀庆府志》：“孙真人洞，在太行山中，相传孙思邈尝居洞中，有五色石丸，人取服之。”据张金鼎等考证，孙思邈生前在茱萸峰，向卢太翼道教请教，洞内有金·泰和七年（1207）塑的孙真人石像等。

7. 历代诗词颂扬碑刻

药王山除了立有纪念碑刻、敕赐封谥碑刻、医药医德碑刻之外，还存有历代记载和歌颂孙思邈与药王山的诗词佳作。明、清游人题诗碑较多，这里各选宋代至今作品摘录如下：

（1）宋代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碑

宋·崇宁四年（1105）于巽、王允中、王需、高钧、张舫、张介夫、何贲七人，唱和。

于巽（朝散郎通判军州事、累官兵部侍郎）：

千骑骖骠出禁城，真祠疑谒罄虔诚。裤棉载路歌仁政，箫鼓喧天乐太平。

残雪未消山下落，和风先赐马前旌。为民祈祷多灵应，末岁丰穰定有成。

王需（左侍禁监仓）：

真人庙食占前城，欲乞丰年在至诚。五马二车恭款谒，丰秀



烈火报登平。

犬鸡光去遗丹灶，鸾鹤飞来认翠旌。既就金方留世了，终闻帝王缘功成。

高钧（将士郎富平县主溥）一首：

二公祠事出重城，宜有休祥答至诚。林壑静深经雪后，楼台高下与云平。

丰年箫鼓来仙宅，晴日烟露上使旌。黎庶欢声自偕乐，但闻高廪颂周城。

王允中（耀州知州）：

缥缈仙台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诚。天边雾卷山峰出，涧下风轻水面平。

不为寻春驰五马，聊因劝课驻双旌。风流别乘多才调，彩笔先挥秀句成。

物外高风不可评，五台山势共峥嵘。永传秘术千斤重，笑指浮荣一羽轻。

鼎冷已无丹药在，洞闲空有碧苔生。欲知旧里蒙余泽，紫诏新颖静应名。

张鲂（华原知县）：

仙翁旧隐寄岩扃，千里蒙休合荐诚。菽粟有余民暇逸，雨踢无爽气和平。

箫笙缓缓陈觞豆，耆艾纷纷迎旗旌。灵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制刻初成。

张介夫（累官太常博士）：

瞳瞳晓日照重城，车骑翩翩布德诚。绰约仙姿随世远，依稀楼观与云平。

神灵响答散香火，民庶欢呼拥旗旌。瑞雪呈祥和气洽，行看阖境报嘉成。

何贲（宋代作家）：

清晨雪霁出东城，躬款灵祠致克诚。百晶果蔬供荐献，万人箫鼓贺升平。

晖晖晓日明台殿，猎猎霜风满旗旌。碧瓦修廊画宏丽，亦从民欲落新成。

（2）金代明改观《文昌阁告成即事奉和原韵》

五台佳气自霏微，杰阁巍然四辟扉。夭矫朱虬拔地起，蹒跹青雀破空飞。

云开夜见群星人，雨歇朝看积翠围。幸际休明饶鼓吹，乘时眺望敢相违。

明改观，为金代医家。

（3）元代周夔舜《游妙应真人栖息岩穴诗》

探求岩穴来高卧，不管人间是与非。济世处方通要妙，引年得法达玄微。

存天守机难循迹，御患康屯思露机。千古真风徒仰慕，恨天羽翼一同飞。

周夔舜，京畿任官，元统三年巡耀州。

（4）明代乔世宁《春日陪赵参政游五台山山有唐孙真人隐居石洞》

不到仙台久，花朝更此行。偶隋轩盖后，兼有薜萝情。迢递穷琳宇，苍茫问玉京。

太玄犹洞迹，显化系台各。穴指蟠龙处，岩传聚虎坪。倚天豁四望，人殿扣三清。



坛树皆松柏，山风落磬笙。仙游无胜地，物候况春明。宫似披玄圃，霞疑对赤诚。

君常谈海岳，吾岂峦簪缨。白发愁难变，丹砂讵可成。临池还洗药，登阁待搏鹏。

心赏今应惬，尘缘忽已轻。真诠倘有悟，同此学长生。

乔世宁，编纂《耀州志》。

(5) 清代郭泌《太玄古洞》

太玄玄妙何处寻，隋唐高风照古今。世远山中遗迹在，洞门常锁白云深。

郭泌，清举人，此作是耀州八景之一。

(6) 民国于右任《药王山除夕杂感》

伏虎降龙事渺茫，洞门香火岁除忙。疮痍遍地神知否，儿女痴心祈药王。

于右任，三原人。国民党革命元老，曾任监察院长等职。

(7) 当代田汉《游五台山》

岩上宫墙下戏场，山南山北柏枝香，千金方使万人话，箫鼓年年拜药王。

元人采笔写高贤，破壁摩挲意惘然，何时药园桃李遍，瘟神送尽舞延年。

田汉，湖南人，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十四、孙思邈研究机构和成果

1. 国内外研究机构

其一，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1985 年 3 月在陕西耀县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 140 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社内创办《孙思邈研究》杂志，1990 年 3 月创刊。不定期的内部发行社刊，于 1999 年更名为《药王孙思邈研究》，基本上每年出版一期。

其二，耀县孙思邈研究所：1988 年成立，其前身为耀县孙思邈医院孙思邈研究室，研究所先后聘任省内外 30 余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研究员，发表研究孙思邈学术论文多篇，完成了“孙思邈研究文献索引”等科研课题，编纂了《孙思邈研究文选》等学术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三，陕西省中医学会文献医史专业委员会：陕西省第一家中医文献医史研究学术团体，孙思邈学术思想研究是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其四，医德宗师孙思邈学说研究会：1990 年 10 月在铜川市成立。

其五，陕西孙思邈研究会：我国第一所研究药王孙思邈学术

的法人团体。1999 年成立，创刊《孙思邈研究杂志》。

其六，陕西孙思邈研究会传统医学分会：2001 年成立，分会办公室设在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其七，台湾中华孙思邈医术思想研究会：前身是成立于 1992 年的“(台湾) 中华药王孙思邈研究室”，1996 年 10 月正式更名为“(台湾) 孙思邈医学思想医术研究会”，成员达百余人。1997 年，又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台湾) 中华药王孙思邈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台湾基隆，下设 6 个研究所，分别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有关日本的内容，第十章已有表述，在此就不累述。

2. 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学者孙思邈的专题研究。20 世纪初，《三三医报》1924 年的第七期，刊登了徐伯英的《孙思邈记》研究论文，论文着重讨论孙思邈生涯中有益的经验，现在看来，其学术研究水平一般。1936 年《光华医药杂志》第三至九期，连载了黄竹斋的《孙真人思邈传》调研论文，黄竹斋是孙思邈的崇拜者，其学术研究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界迎来了春天，中医学研究、医学史研究、纪念卓越医学家活动空前活跃。1979—1986 年间，全国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多达 140 余篇。1999 年，第二届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近百篇。20 世纪末，百万字的《千金方研究》出版，内容丰富，由专家执笔，研究深入，其学术研究水平达到了新的高潮。

整体而言，到 20 世纪末，孙思邈研究已被中医药学、医学、社会医学和哲学、史学各界学者所重视，孙思邈学术研究具有相

当规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内容涉及到生平、思想、哲学、文献和药理、病理、方剂、临床、预防等多种学科，几乎是涵盖了人物研究的全部内容。李经纬对已经发表的有关孙思邈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有过统计，转引如下：生平事迹 160 余篇，哲学与社会医学思想 260 多篇，文化交流、文献研究 120 余篇，还有药物方剂 160 余篇，临床各科 300 余篇，预防医学与养生保健 120 余篇，合计近 1200 篇。此外，研究孙思邈的学术专著以及科普著作等也已达到 50 余种。

一、专著

[1] 黄竹斋著：《孙真人思邈传》，坊间石印本 1948 年。

[2] 干祖望著：《孙思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3] 邓剑著：《邈学管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1999 年版。

二、编著选注

[1] 吕超如编著：《药王考与郑州药王庙》，宝学书局 1948 年出版。

[2] 王明皋、方志编著：《唐代名医孙思邈》，耀县文教局 1979 年印。

[3] 黄竹斋校：《孙思邈传》点校本，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陕西省中医学会 1981 年印。

[4] 孙溥泉、王明皋、李经纬编著：《药王孙思邈》，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5]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编：《博极医源的孙思

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6] 元树郡、任春荣编著：《孙思邈健身法》，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7] 吕选民编著：《药王孙思邈养生长寿术》，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8] 周一谋编：《寿星孙思邈摄生精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

[9] 张伟、张瑞贤等整理：《药王全书》，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10] 雷自申等主编：《孙思邈千金方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11] 刘学锋主编：《孙思邈千金方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12] 王三虎主编：《120 首千金方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13] 陈大舜、周德生编著：《中国历代医论选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版。

[14] 郑隆炎等编著：《孙思邈医学思想与方技在台湾发展状况》，中国医药出版社 1999 年版。

[15] 苏礼主编：《实用千金方医方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年版。

[16] 夏翔、王庆其主编：《历代名医医案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三、论文集

[1] 陕西中医学院中国医学史研究室等主编：《孙思邈研



究》，陕西中医学院发行，1982 年。

[2] 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医史学会编印：《纪念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逝世 1300 周年论文汇编》，1982 年。

[3] 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编印：《孙思邈药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986 年。

[4] 《医学交叉学科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医学》杂志增刊，1987 年。

[5] 米伯让、张史杰主编：《孙思邈医德纪念碑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版，1989 年。

[6] 大会编审委员编辑：《孙思邈医德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9 年。

四、外国研究孙思邈的主要著作

[1] 美·席文著：《中国炼丹术的初步研究》，美国 1968 年版。

[2] 德·文树德著：《中华帝国的医学伦理学》，德国 1988 年版。

[3] 德·文树德著：《中国的药王孙思邈历史传奇一肖像学》，德国慕尼黑出版社 1994 年版。

[4] 德·文树德著：《〈银海精微〉的西面观》，德国慕尼黑 1994 年版。

此外，还有许多通俗读本、图册、剧本、VCD 光盘等。以上研究成果成果摘选自《孙思邈研究集成》一书。

有关日本的内容，第十章已有表述，在此就不累述。



十五、孙思邈后人与医学

孙思邈因精湛医术、高尚医德而医名遐迩，流传百世，晚于他三百多年的后世也曾煊赫于世。据《唐书》载，孙思邈有儿子孙行在天授年间（约 691 年）任凤阁侍郎；孙子名溥，曾任徐州萧县丞。宋代名医孙用和之子孙兆自称为孙思邈后代。

生于北宋中期的孙用和及其子孙奇、孙兆兄弟就是著名医生。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有载："《孙思邈传家秘宝方》三卷，尚药奉御太医令孙用和集，其子殿中丞兆，父子皆以医名。自昭陵（仁宗庙号）时，迄于熙丰（熙宁、元丰、神宗年号），无能出其右者。元丰八年，兆弟宰为河东漕属，吕惠卿帅，并从宰得其书，序而刻之。兆自言为思邈之后。"[①]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孙用和自布衣至尚药奉御"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名闻天下，二子奇、兆，皆登进士第，为朝官，亦善医"。

①赵璞珊："孙思邈后代孙用和父子医学"，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05 页。



1. 孙用和编撰传家秘方

孙用和本是民间医生，因仁宗皇帝有疾，御医无奈，被帝召用，服其药辄效而后官至太医令。另据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五记载：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太医署每年比试，孙用和曾经讲授医经十几年，一二百医生都曾受过他的教授。

史书中对孙用和的医学著作多有记载：《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孙用和著作《孙思邈传家秘宝方》三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记述，称：《孙尚秘宝》十卷。并称："右皇朝孙尚撰，吕惠卿帅边日，尚之子在属部，因取此书刻板传于世。"郑樵《通志·艺文略》，称《孙用和传家秘宝方》三卷，另有《孙尚药方》三卷。宋·唐慎微《经史证类本草》和金·杨用道《广肘后方》中，引用"孙用和"、"孙用和方"、"孙尚药"方多例，可见孙用和在当时的声誉极大。

《孙用和传家秘宝方》及《孙尚药方》在宋以后佚失难见。几百年后，1842 年又在日本重现，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编撰的《经籍访古志补遗》记载"《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三卷，钞本缺上卷及下治杂病方，京师伊良子光通千之堂藏。"清末藏书家钱塘丁丙（松生）所著《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六记载："《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三卷，东洋影宋本，并题宣德郎宋殿中省尚药奉御权太医令充医师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孙用和集。"日本发现的孙用和著作，清末已回流到中国。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为日本影宋抄本。[1]

---

①赵璞珊："孙思邈后代孙用和父子医学"，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06 页。

2. 孙奇、孙兆校正医书

孙用和有子孙奇、孙兆、孙宰。除孙宰未知其是否精通医学外，孙奇、孙兆都是北宋仁宗时期校正医书局的主要成员，孙奇、孙兆是较后参与校正医书的，孙奇官朝奉郎，孙兆职殿中丞，兼理校正医书。他们也都是出色的临床医生。

孙奇参与校正医书，主要有重修《黄帝内经素问》一函十册，二十四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校定《伤寒论》十卷；《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方》；《脉经》；《黄帝针灸甲乙经》；《千金方》；《千金冀方》校正表等，这些书均为宋校正医书局负责校正，孙奇是第二负责人。孙奇还对《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方》进行了具体校勘。孙奇手校三书，是继晋王叔和之后，对张仲景书的贡献和影响最大之人，不仅对北宋中期以后及金的一些著作有影响，而且还促进了元、明、清各代及日本等国对仲景学说的研究，至今，医界使用的仍是孙奇的校正本，孙奇校正之功实不可没。

孙兆，是校正者也是“改误”者。孙兆费时十数年，亲手校正约七十万字《外台秘要》，《外台秘要》引证古医书最多，每方均注出处。孙兆是《黄帝内经素问》的主要“改误”者。《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就题署“林亿、孙奇、高保衔等奉校正”、“孙兆重改误”。孙兆改误“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孙兆保留了前人隋太医全元起、杨上善和王冰的原注论说观点，同时，附有新校正注释，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古籍整理方法，堪为榜样。《明史·艺文志》还曾载孙兆著《素问注释考误》一书。



孙兆不仅是一位古医籍整理者，还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同时也是我国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孙兆精通医术，甚至得到仁宗信任。苏轼《志林》“孙兆”条记有“仁宗单骧入侍，有间赏赉不赀”。张杲《医说》卷二引《鸡峰替济方》记载了孙兆治愈“有显宫权府尹之事”宋·唐慎微《经史证类本草》多处引用《孙兆方》、《孙兆口诀》；金·杨用道《广肘后方》数处引用《孙兆口诀》；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还载有孙兆《伤寒方》二卷。《宋以前医籍考》引《医学源流》记载孙兆著有《伤寒脉诀》。可见，孙兆当时有不少著作①。

唐代孙思邈和北宋孙用和及其子孙奇、孙兆，以他们高尚医德、高超医术、严谨治学态度和认真临床作风而一脉相承，这也许或多或少与“世传”或“家学”的某些影响有关吧。

另外，《耀州志》和《韩城志·方技传》记载屈原逝，其三子俱入秦，“一处耀州更姓孙，隋唐征士孙思邈其后裔也……”，此为有关孙思邈为屈原后裔之传说。

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永垂不朽！

---

①赵璞珊：“孙思邈后代孙用和父子医学”，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09 页。

附 录

附 1 《备急千金要方·序》全文

(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疴瘵萌起，大圣神农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伦，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泰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阙摄养所致耳。

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绐，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乎！深乖圣贤之



本意。

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吾见诸方部秩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

张仲景曰，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进不能爱人知物，退不能爱躬知己。卒然遇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后震慄，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戆若游魂。降志屈 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诸庸医，恣其所措。咄嗟喑呜，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此之谓也。

附 2 《千金翼方·序》全文：

(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

知关仑玄牝，驻历之效已深。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嵇炎农于纪纂，资太一而反营魂；镜轩后于遗编，事岐伯而宣药力。故能尝味之绩，郁腾天壤；诊体之教，播在神寰；医道由是滥觞，时义肇基于此。亦有志其大者，高密问紫文之术；先其远者，伯阳流玉册之经。拟斯寿于乾坤，岂伊难老，侍厥龄于龟鹤，讵可蠲疴。兹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谓也。

若其业济含灵，命悬兹乎，则有越人视于腑脏，奏和洞达于膏肓，仲景候色而验眉，元化刳肠而湔胃。斯皆方轨叠迹，思韫入神之妙；极变探幽，精超绝代之巧。晋宋方技既其无继，齐梁医术曾何是云。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然则三部九候，乃经络之枢机；气少神余，亦针刺之钧轴。况乎良医则贵察声色，神工则深究萌芽。心考锱铢，安假悬衡之验；敏同机骇，曾无挂发之淹。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是故先王之于玉版，往圣藏之以金匮，岂不以营叠至道括囊真颐者欤。

余幼智蔑闻，老成无已。才非公干，夙婴沉疾；德异士安，早缠疴瘵。所以志学之岁，驰百金而询经方；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酌华公之录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每以为生者两仪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气。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而存；德合则生成，是生曰德而立。既知生不再于我，人处物为灵，可幸蕴灵心阙，颐我性源者，由检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号曰千金。可以济物摄生，可以穷微尽性。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学，譬锐轨之相济，运转无涯；等羽翼之交飞，

博摇不测。蚓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徹斯义，述此方名矣。贻厥子孙，永为家训。虽未能譬言中庶，比润上池；亦足以慕远测深，稽门叩键者哉。傥经目于君子，庶知余之所志焉。

附 3 《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全文

（根据《药王山医碑录释——海上方》）

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而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环耀多山水，其城之东，有水曰“漆”，漆水之东二三里，有山曰“五台”。峰回环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间翘楚卓立，最出诸峰至绝顶者有庙曰“崇福观”。当闻耆老传之曰：今之观，在昔孙真人旧隐之地。其后经五代之乱隐间荒毁，后人崇之流而为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降，或回或直，或细而几绝，或平而复缓，怪石凌峭，松桧密者，山间之径也。及其至也，老木参天，枯枝层地，门庭潇洒，殿宇峥嵘。以至就高而为危阁，依龛而为洞房，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台崇福也。阴森院落，清楚庭芜，像貌颂秀，精神温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或上则山势耸然而特立。崭崖险阻，径几不通，其回旋数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测，其宏广也。则如宇之斯大者，真人旧隐之所也。然旧隐之所，去百有余步，今尚存者残碑坏碣，或湮或灭，不复究矣！幸而近足以取乡里之详传；远足以有新旧二史之可验。参之，以考其所为，稽之以质其行事。庶几为可纪焉。故案唐史云：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始，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而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



难为用尔。”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诏，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诏旨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照邻有恶疾，不可为，感而问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彰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则蒸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之，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勃慧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瀑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樵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疾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有之君，君尚钦，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欲动天之象，故欲园。《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园之谓也。”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坠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贷下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功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优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

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诲于远。知此，则人事尽矣。”初，魏徵等修齐、梁、周、隋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中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有若空衣，时人异之。时东台侍郎孙处约，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侑佑晚贵，俭祸在执兵。”后皆验。太子詹事庐齐卿之少也。思邈曰：“五十年位方伯，吾孙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徐州刺史。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皆新旧二史之文也。至于耆志之所传，道家之所纪载尤详。云自开元中复隐于终南山，与僧者邻谷而稽。一日，有志叟老妪诣僧藏所隐之处，仓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龙也。有胡僧者，利龙宫宝货，乘以天旱，就池祈雨，诬罔国家以法，欲涸其也。一日，池乾水涸，其宝货郎为胡僧所有。某等当受谪于上帝，愿师邻之。”藏曰：“此事非吾能为也！邻谷处士，有神仙变化之术，可以御焉。汝速叩之。”龙如其言，以其事白于先生。答曰：“此诚末事，但归无若，僧当自遁矣!”龙既归，昆明之水复旧，而胡僧窜伏而它。明日，忽有人携仙方而至。曰：“此非人间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为答。某不免冒禁以献之，所酬报之厚尔。”其后交游往来，莫非有道达理之士。忽谓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济物之功亦广矣。然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后功满目，必为尸解。不得白日轻举矣。”于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药代昆虫鸟兽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仙方论，以行于世。天宝初，玄宗晏处别殿，先生乘御云鹤而降，白于上曰：“臣于峨



嵋山南峰修炼丹石。所阙者，武都山雄黄。愿少赐之以助炉鼎之用。”敕遣中使陈忠诚，赍雄黄就山以赐之。使至山下，求访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黄于盘石之上，焚香宣诏。俄而见形，谓使者曰：“但留雄黄，当自取之。石上有谢表，请谨录以奏主上。”视之，果有朱书。录仅毕，字亦随化，不复见矣。自是之后，或隐或见，人莫能测。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才十余岁。不饮酒，不茹荤。父母怜其性善，遂遣于白水院为僧童子。忽一日，有游山者，自云孙处士，趋步周游，既而就座，袖中出药以授童子，命而煎之。既至微饮，饮者以赠小童。既饮之，便觉神爽。须臾处士以归，小童亦乘空而去。复视煎药之器，已成金矣。时人异之。此皆古及今，乡里耆艾，众所共传也。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阴阳盈虚之理，下达万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机逆教，知来藏往，则有凡于神，或隐或见，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六极之外，则有达于仙。惟神也，与道为一而无方，准仙也，与天地同久而不死。无方，故其道莫能测；无死，故其神莫能灭。故世以为神仙。而后世之士，无贤愚贵贱，莫不闻其风而爱戴之。又况夫处性澹泊，而不为利役；操心寂寞，而不为名累者乎！故今数百年之后，高尚有道之士，与夫大医名药所以争相塑绘，以钦事之，而尚未息也。

郡人万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养性为务。常慕至人，好逑古迹，因访孙真人故乡，乃至华原，因以居焉！故事后子孙，或以医药名医于一时，或以肆意不显于当世。至景之时，盖数世矣。然尚不忘祖宗之业，每游真人故宅，观其遗迹旧基，慨然有感。乃备私钱，基构堂宇，塑绘像貌，经之营之，仅费十余万而规摹方备。孜孜勉勉，为力勤矣！时嘉佑己亥四月毕工。

景之弟祐，亦铭祖风，而得真人方术、秘录及治心养性之术，最为多矣。后二十三年，忽一日访谳曰："有道者非称则不显，有德者非彰则不明。真人可谓有道德者也。堂既修而严奉之，诚则至矣。然无文以纪之，则不足以显扬至道美德，非所谓仰慕之至者也。"强谳忝与。其子完为友，故不获已而书之。虽然道不可以言传，非言则无以见道，德不可以文显，非文则无以彰德。至于一语默一行止，岂加损哉！本诸二史之记，质诸好事之传，始志其实而已。

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四月初一日。乡贡进士王谳记。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六月初一，渤海万俟祐立石，男进士完检校宁实同立石。

年谱



年 谱

出 生

岁次辛酉，公元 541 年，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当时中国并列着三个偏安的政权：西魏：文帝、元宝炬。建都长安。梁：武帝·萧衍。建都金陵，年号大同，当年为七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建都邺，年号兴和，当年为三年。）

孙思邈出生于西魏境内，距长安不太远的北方铜川市、耀县东北 15 里的孙家源村。孙思邈出生月、日及家庭状况，以无记载可稽，待考。唯家境偏于贫寒，可从《要方·序》中“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一言可以反映出来。

当年为陶弘景卒后第五年。 甄权也出生于许州扶沟，今为河南省、许昌、扶沟县。

1 岁

壬戌。公元 542 年，西魏·大统八年。名医高僧昙鸾，逝世于汾州石壁谷云玄中寺，享年 68 岁。



4 岁

乙丑、公元545年，西魏·大统十一年。南齐·姚僧垣[①]，于梁·大同十一年，从领殿中医师转领大医正。

5 岁

丙寅、公元58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梁·中大同元年。三月，梁武帝讲《三慧经》于同泰寺。四月，同泰寺塔失慎焚毁，武帝认为“此魔也”。遂拟重建十二级浮图。后以侯景之乱而罢。

6 岁

丁卯、公元547年，西魏·大统十三年。旱疫，以扬、徐、充、豫几州尤为严重。

7 岁

戊辰、公元548年，西魏·大统十四年。旱灾加瘟疫。孙思邈开始识字读书。“七岁就学，诵千余言。”七岁，也指儿童时代。

9 岁

庚午、公元550年，西魏·大统十六年。针灸术传人日本国。江南连年大旱及蝗灾，尤以江[②]、扬两处更为严重。百姓流亡，草

① 姚僧垣(499—583年),字法卫,吴兴武康人。
② 江,泛指长江以南一带地区。

根树叶食之皆尽，途中白骨成堆。巢元方[1]出生。

11 岁

壬申，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当时各地天灾人祸，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但西魏尚能偏安无事，所以孙思邈的童年并未达到流离失所而能安于求学。江东大疫大饥，死者达十之七八。是年梁·元帝·萧绎患心腹疾，乃诏诸医，议治疗方药。咸谓至尊之体，宜用平药，独姚僧垣认为“脉洪而大，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搓理”。元帝从之，进药后，果下宿食而愈。以《针经》赠日本钦明天皇。

14 岁

乙亥·公元555年，西魏·恭帝二年。“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旧唐书·本传》）。

15 岁

丙子。公元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北齐·天保七年，蝗灾。

16 岁

丁丑。公元557年，北周·明帝元年。正月，西魏宇文觉废恭帝，灭西魏，自立为天王，改国号为周，即史书上称为北周。北齐·天保八年，自夏至9月，大蝗灾。

---

① 巢元方(550—630年)，随·京兆华阳人，大业间授太医博士，与吴景贤等奉诏撰《诸病源候论》50卷。

17 岁

戊寅·公元558年，北周·明帝二年。攘那拔陀罗同阇那邪舍，共译印度的《五明经》[1]成中文，其中一部份为医学。北齐·天保九年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灾。

18 岁

已卯·公元559年，北周·明帝三年。孙思邈开始习医。"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

20 岁

辛巳·公元561年，北周·保定元年。北齐·太宁元年，皇太后病，徐之才一药而痊，赐采帛千匹，锦四百匹。此时孙思邈已很博学，大有"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文选·左思咏史诗》）的气概。故《旧唐书·本传》谓之："弱冠善谈庄老"。因之也知道在那时已开始研究道教了。也是这个时期，孙思邈自谓："青之岁，高尚兹典。"（《要方·序》）

21 岁

壬午·公元562年，北周。保定二年。吴人知聪，携药书及《明堂图》等160 卷，至日本交流。

---

① 《五明经》，为专事讨论明相、明心、明念、明思、明意五明的经书。

23 岁

甲申·公元564年，北周·保定四年。山东大水成灾，民多饥死。

24 岁

乙酉·公元565年，北周·保定五年。北齐，河清三年3月，兖、梁、沧、赵等州大水成灾。12月，北齐阳南大疫。

25 岁

丙戌·公元566年，北周·天和元年。姚最写成《本草音义》。

26 岁

丁亥·公元567年，北周·天和二年。北齐·天统三年，山东大饥荒。

27 岁

戊子·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北齐。天统四年，太上皇高湛病，徐之才为之治疗而痊。

33 岁

甲午、公元574年，北周·建德三年。五月，政府下令，诏毁禁佛、道两教，斥为佛教不净。于十五日起，尽毁境内寺庙佛像。文宣太后病，召姚憎垣诊治，姚谓："窃以忧惧"，故即逝世。



34 岁

丙申·公元575年，北周·建德四年。徐之才卒，享年 79岁。

36 岁

丁酉·公元577年，北周·建德六年。正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举兵攻北齐，大破齐军。周军入邺，北齐亡。周武帝下令废止北齐境内佛教、寺庙四万所，尽赐王公为第宅。沙门300万皆勒令解散还俗。

37 岁

戊戌，公元578年，北周·宣政元年。6月，武帝卒。当病初时，召姚僧垣诊治，姚谓："万无一全"，不久固死。《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自山"，正是这个时期。《旧唐书·本传》："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赴误为起）"。这个辅政时间，大约为宣政元年（578年）至大象二年（580年）止的跨越三年间。考这里的隋文帝，应该称杨坚。

38 岁

已亥，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根据"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所以证实孙思邈在这个时期里，正在修道炼丹。《续仙传·隐化，孙思邈》的"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也就是此时。

39 岁

庚子·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姚僧垣《集验方》脱稿。

40 岁

辛丑·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二月，杨坚废静帝，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把太医署归属于太常寺管辖。

42 岁

癸卯，公元583年，隋·开皇三年。姚僧垣，卒，享年84 岁。

44 岁

乙巳，公元585年，隋。开皇五年。七月，河南诸州水灾。

45 岁

丙午·公元586年，隋·开皇六年。《要方·肝脏·坚症积聚》报导了本年3月8日发现蛟龙病。

48 岁

已酉，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刘祐写成《产乳书》。释·那连提黎耶舍，卒。他生前曾设病人坊，收容男女患有麻风者。这是中国第一个麻风病防治机构。

辛公义为岷州[1]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则合家逃避，病人多

---

① 岷州，今甘肃省南部。

妄死。公义乃设置“署月厅”，专收疫病患者，并予治疗，甚至廊房皆满。这是中国第一个急性传染病医院。

49 岁

庚戌，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长安大疫。

52 岁

癸丑·公元593年，隋·开皇十三年。春，政府下诏禁绝谶纬学说，凡收藏谶纬及涉及谶纬的书籍者，治罪。

从此谶纬学说即敛迹而式微。

57 岁

戊午·公元598年，隋·开皇十八年。5月，禁畜猫。理由是“猫鬼蛊毒魇鬼。”可能猫得了狂犬病。卫生行政方面又一英明措施。9月，东征军在征途中传染疫疠，不得已班师而归，死者十之八九。

64 岁

乙丑，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要方·胆腑·万病丸散》：“太乙神丹，余以大业中，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乌、玄武①大获曾青。”由此可知孙思邈在605年到617年之间，尚在修道炼丹。同时更悉孙思邈此时还作一次西北之游，到过四川。

---

① 飞乌、玄武，这两地俱在今四川省中江县东南。

巢元方在大业间，授以太医博士。杨上善[①]在大业间，授以太医待御。

66 岁

丁卯·公元 607 年，隋·大业三年。日本遣小野妹子来，中国医学由此即大量传入日本。

67 岁

戊辰·公元 608 年，隋·大业四年。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等来华学医。

68 岁

已巳·公元 609 年，隋·大业五年。吐谷浑一带地区，多瘴气，樊子盖献青木香，用以预防和治疗。

诸葛颖《淮南玉食经》及《目》165 卷，约写成于此时。可惜此书，不久即佚。

69 岁

庚午·公元 610 年，隋·大业六年。政府命太医博士巢元方编撰、吴景贤监修的《诸病源候论》脱稿。

71 岁

壬申，公元 612 年，隋·大业八年。大旱疫，山东尤甚，人多

① 杨上善，生殁待考，仅知为隋代人。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 卷，但已佚散 7 卷，仅存 23 卷。

死。

《宋高僧传》及《佛祖历代通载》的“南山律师道宣传”中俱谓：“处士孙思邈，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酉阳杂俎》也谓“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恐为道宣律师之误）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

74 岁

乙亥·公元 615 年，隋·大业十一年。正月，增添秘书省官 120 员，王府学士 500 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驿道乃至蒲博鹰狗[①]，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书 1 万 7 千余卷。内医学方面的《四海 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也在这批工作中写成，故《旧唐书》谓“隋炀 帝作”。崔知悌[②]，诞生。

75 岁

丙子·公元 616 年，隋·大业十二年。杨上善，卒。

76 岁

丁丑，公元 617 年，隋·大业十三年。洛阳，出现传尸病。

77 岁

戊寅·公元 618 年，隋·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自称高祖皇帝，建都长安。隋朝亡。唐皇政府机构调整

① 蒲博鹰狗，为各种赌博的名称与种类。

② 崔知悌（615—685 年），唐·鄢陵（今河南省、鄢陵）人，他是宦而医者。

建设，置尚药局及太医署。署下属有四科，为：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焚师。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甄立言在武德年间（618—626年），升任太常丞。

80 岁

辛巳·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孟诜诞生。

81 岁

壬午·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孙思邈曾被蠼螋刺伤。“凡蠼螋虫屎人影处，便令人病疮。余以武德中六月得此疾”（《要方·备急·蛇毒》）。

82 岁

癸未·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日本僧惠济、惠光，来中国留学。在中国留学15年之久的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等回国。

《要方》在此时开写。

85 岁

丙戌·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

8月，高祖禅位于太子李世民，即太宗，改年号为贞观。李渊称太上皇。太医署中增置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杨玄操写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

86 岁

丁亥·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太医署置司医、医佐，分掌疗众疾。太医署减置医博助教一人。又置医师、医工佐之，掌医生《本草》、《甲乙》、《脉经》。减置按摩博士一人，又置按摩师，按摩工助之。教按摩生　以消息导引之法，除人八疾。甄立言，卒。　夏，山东诸州，大旱。“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旧唐书》。从此孙思邈即脱离隐　居生涯而居住长安。寓长安光德坊的鄱阳公主官邸。

贞观间，孙思邈与马德逸、谢季卿奉旨校完《明堂经图》。贞观间，孙思邈的病例，两部《千金方》者，有六、七例。京畿蝗灾。

87 岁

戊子·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8月，河南、河北大霜。年荒。88岁已丑·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9月，诏诸州治，置医学博士及学生。

《旧唐书·本传》：“（唐）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传授，有如目睹。”考本年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中，又诏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隋书》，至贞观十年（636年）书成。在这8年撰写期间，孙思邈发挥了顾问的作用。

89 岁

庚辰，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孙思邈患唇痈。《要方·

丁肿痈疽》：“余以贞观四年，勿口角上生丁肿”。

11月，诏废鞭背刑。因太宗读《明堂图》后，知人五脏皆系于背之故。巢元方，卒，享年80岁。

90　岁

辛卯·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秋，孙思邈患左中指指疔，见《要方·备急·被打》：“余以贞观五年7月15日夜，左手中指，触着庭树，至晚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色如小豆色，”

91　岁

壬辰·公元632年，唐·贞观六年3月。太宗至九成宫避暑，10月回宫，孙思邈伴随。

92　岁

癸巳·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3月，孙思邈面部丹毒。《要方·丁肿·丹毒》：“余以正观七年三月　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内疼痛。比至晓，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痈，不得手近，几致殒毙。”5月，太宗又幸九成宫避暑，孙思邈伴随以往。8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9月，山东四十余州大水。在鄱阳公主官邸，遇卢照邻。《旧唐书·本传》：“癸酉（应为癸巳）之岁，思邈自云，开皇（应为文帝）辛酉（为文帝大统七年（541年））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以实足年龄计，则为92岁，但古人都以虚龄计算）（参阅第一章生死之谜。）

93 岁

甲午·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3月，太宗至九成宫，10月回宫，孙思邈伴随。7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

94 岁

乙未·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5月，太上皇李渊卒。

95 岁

丙申·公元636年，唐·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灾荒，大疫。

96 岁

丁酉·公元637年，唐·贞观十一年。7月，京师大雨，水浸入洛阳宫。9月，黄河泛滥，溢坏陕西、河北，毁河阳、中潭。

97 岁

戊戌·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正月，松[①]、郸二州地震，坏人庐舍，压死者众。

98 岁

已亥·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从高昌[②]传入酿葡萄酒方法。为中国酿酒中，又添增了一个新品种与技术。

---

① 松州，今上海市、松江县。

② 高昌，今在新疆吐鲁番县。

100 岁

辛酉·公元 641 年，唐·贞观十五年。正月，文成公主（？—680 年）由李道忠（600—653 年）送到吐番，出嫁于吐番弄赞。奁赠中有医药书籍多种，由哈祥马哈德娃和德日马廊吉两人 译成藏文。3 月，泽州大疫。

101 岁

壬寅·公元 642 年，唐·贞观十六年。夏，谷州、泾州、徐州、戴州及貌州五处大疫，死者无数。达摩乌长国，遣使献龙脑香。道宣律师回终南山，卓锡丰德寺。

102 岁

癸卯·公元 643 年，唐·贞观十六年。夏，泽、濠、庐三州，大疫。

103 岁

甲辰·公元 644 年，唐·贞观十八年。庐、濠、巴、普、彬五州，大瘟疫。

106 岁

丁未·公元 647 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政府遣使至天竺，学习熬糖新法。

107　岁

戊申，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卿州大疫。使方士那罗迩波寐[①]于金飙门造延年丹。

108　岁

已酉，公元649年，唐·贞观二十三年。5月，太宗李世民卒，享年50岁。6月，李治即位，即高宗，改年号为永徽。8月，晋州[②]大地震，死伤5000余人。

109　岁

庚戌，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
雍[③]、绛[④]、同[⑤]等九个州，大旱、蝗灾。齐、定[⑥]等16州，大水灾。

4月，晋州大地震，余震至6月方息。"贞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脂上，矢人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内，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永徽元年秋，令余诊看，"(《翼方·奇病下·金疮》)。这是两部《千金方》中最后记载的一个病例。

---

① 那罗迩婆寐，无考。
② 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
③ 雍州，今陕西、甘肃二省及青海交壤处。
④ 绛州，今山西省、绛县西南20里。
⑤ 同州，今陕西省，大荔、澄城、合阳一带地区。
⑥ 定州，今河北省，满城以南，安国、饶阳以西。

110 岁

辛亥，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10月，晋州又地震。

111 岁

壬子·公元652年，唐·永徽三年孙思邈《千金要方》脱稿。12月，山西绛州僧，死后解剖，有遍体内鳞蛊虫。

112 岁

癸丑，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唐律》于医学，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造畜蛊毒以毒药药人，医违方诈疗病，医合药不如方，妇人怀孕犯死罪，拷决孕妇等刑法，及禁止道士、女冠、僧侣、比丘尼等人，不得为人疗疾。天花从西东流，遍于海内。《要方·序》："白首之年，未曾释卷"，孙思邈正是指这个阶段的求学情况。

《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这是孙思邈在《要方》脱稿之后，再读《伤寒杂病论》的记载。从现在起，他酝酿或开始撰写《翼方》。

113 岁

甲寅。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闰5月，麟游大雨，漂溺死者3000人。6月，恒州大水，滹沱泛滥，漂溺5000余家。河北诸州，也大雨成灾。12月，倭国献琥珀、玛脑。

114 岁

乙卯，公元655年，唐·永徽六年。3月，楚州大疫。6月，日本药师惠日，三度来华。

115 岁

丙辰，公元656年，唐·显庆元年。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诸国，采取木香、益智仁等名贵药品，可惜未至而返。9月，括州[1]暴风雨，海溢。

116 岁

丁巳，公元657年，唐·显庆二年。5月，逐天竺方士娑婆归国，但未及行而死于途中。前者天竺道士娑婆寐，自言有长生术，太宗信之，使人四出采药，但无法炼成，太宗一怒而逐之。

118 岁

己未，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诏监门左长吏苏敬、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太子洗马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太医令季瑰、太常丞吕才、太史令李淳风、礼部主事颜仁楚等23人编纂的后人称为《唐本草》的《新修本草》脱稿书成。这是世界第一部药典，计正文20卷、目录一卷、连同图、图经等共54卷。《旧唐书·本传》："显庆四年，高宗召见孙思邈，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这是见之于传史有记录的唐高

① 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东南。



宗李治第二次召见。

121 岁

壬戌，公元 662 年，唐·龙朔二年。正月，政府在调整体制时，改尚药局为奉医局。

126 岁

丁卯，公元 667 年，唐，乾封二年。 拂菻国，遣使献底也迦。为含有鸦片的药物。

127 岁

戊辰，公元 668 年，唐·总章元年。京师、山东、江、淮大旱且饥。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

128 岁

己巳，公元 669 年，唐·总章二年。7 月，冀州[1]大雨，毁屋 14390 间，毁田 4496 顷。李勣卒，享年 75 岁。生前著有《脉经》，但已失佚。9 月，永嘉[2]、安固[3]诸县，大风海溢，漂没 6000 余家。《新修本草》约在此时（669—677 年）间传入日本。

129 岁

庚午，公元 670 年，唐·咸亨元年。40 余州，旱及霜虫，百姓

---

① 冀州，今在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辽河以西一带地区。
② 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
③ 安固，在四川省境内。

饥乏。

132　岁

癸酉，公元673年，唐·咸亨四年。7月，婺州暴雨，水泛为灾，漂溺居民600家，诏令赈济。

133　岁

甲戌，公元674年，唐·上元元年。孙思邈以老病，请退休。高宗召见，并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见《旧唐书·本传》：“上元元年，辞病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

135　岁

丙子，公元676年，唐·仪凤元年。8月，青[1]、齐等州，海水泛溢，漂溺居民5000家。

136　岁

丁丑，公元677年，唐·仪凤二年。4月，河南、河北大旱，诏赈济。

138　岁

己卯，公元679年，唐·调露元年。2月，东都大饥。

139　岁

庚辰，公元680年，唐·永隆元年。9月，遣使赈济河南、河

① 青州，今山东省、潍坊市一带。

北诸州大水灾。

140　岁

辛巳，公元681年，唐·开耀元年。8月，河南、河北大水。诏许灾民可往江、淮以南就民。《千金翼方》脱稿。

141　岁

壬午，公元682年，唐·永淳元年。孙思邈2月15日，晨起，沐浴。衣带整齐，端坐而羽化。颜色不变。《续仙传·隐化·孙思邈》的描写是“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严其衣冠，端然而坐。谓子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得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来往。俄气绝”。

遗有一子，名行。天受中（690—691　年），官凤阁侍郎[①]。孙，名溥，官萧县丞。

此年谱，参阅干祖望所制年谱而成。

① 唐代中书省称为凤阁，统领管理主书、主吏等事宜。侍郎为一般高级官员的副职。